

北 大 論 叢

第 1 卷

第 4 期
合 刊



南
言
藏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以研究學術，介紹思想，并討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爲主旨。除特約稿件外，凡與上列主旨相合者，一律歡迎投稿。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

三、譯稿請附原作，或註明出處。

四、文字不刊白話文言，每篇暫定以五千字爲限。

五、稿尾請註明姓名住址及加蓋圖章，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編輯人得就來稿酌量增刪，不願受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七、來稿概不退還，如欲退還者，請預先聲明并附足郵資。

八、來稿一經刊登，即由本社每千字酌酬現金一元至三元，惟特別稿件，得另

行商訂。

九、採登之稿，版權仍由作者保留，惟本社得有選編叢書之優先權。

十、來稿登載後，如發現該稿又在別處發表者，本社恕不致酬。

十一、稿費規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內結算，如過一月不來領取者，作却酬論。

目 錄

社 論

五九感言……………孤 俠

時 評

李維諾夫之去職與英蘇談判……………蔡慎一
德義締結政治軍事同盟……………蔡慎一

論 著

中日兩國政策固宜一定不變乎……………金玉律

政略與戰略……………沈昌華

英美蘇遠東外交政策之演進及其變化……………方服真女士

中日婦女地位的演進研究……………王治平

中日教育的比較……………陳仁傑

中華民族反英運動史的回顧……………

研 究

東亞的第三陣線……………吳信中

中日和戰問題的總檢討……………方崇儒

從中日民族性上的異同來推測兩國的前途……………李仲鈞

文 藝

旅日印象記……………東西南北人

恭等最後勝利降臨……………周 文

編後記



五九爲我國國恥紀念日，亦可稱爲日本國恥紀念日，蓋所謂二十一條，無論提出者或接受者，皆係破國際間空前之紀錄，而使世界歷史上永遠殘留一最大之污點。竊思中日兩大民族，既屬同文同種，則宜平等平權，其間所有條約，應本國家自主，民族自決之精神，而謀中日兩邦之真正獨立與自由，互相提攜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此中斷不能有彼尊我卑，我主彼奴之觀念存焉。今兩國當局，授受之間，竟有如此遲疑者在，不自知止知足，猶復美其名曰是乃中日親善，嗚呼！世道日下，人心日非一至於此，彼淺見者流，尙侈談其國際間之正義，世界上的公理，豈非自

時評

李維諾夫之去職與英蘇談判

國際政局之變幻，實有令人不可測者。此次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之忽爾去職，尤爲事出兀突，舉世莫不爲之驚訝。世人咸知歐洲情勢之險惡，日甚一日，各國政治局，深傷大禍之將臨，思欲挽狂瀾於未倒。急急謀安全之策。英相張伯倫於綏靖政策之後，知力猶所未逮，乃謀拉籠蘇聯，進一步作集體保障之藩籬，以防意大利之南下北上，德意志之東推西進。乃談判幾近匝月，雙方正在此推彼就之際，蘇聯負責折衝之主腦，忽爾去職。雖各國觀察家，以爲蘇聯此舉，並不變更外交政策，然

欺欺人之詞乎！雖然，西諺有云：「Let bygones be bygones。」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猶可追，如今而後，本相親相愛之外交，建共存共榮之國策，爲黃種造幸福，爲東亞謀和平，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所謂「雨降フテ地固ル」，「不打不成相親」，其斯之謂歟。吾輩目視孤島上盎格魯沙克遜族之通力合作以謀我遠東也，念及「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一語，實不勝其感慨之至！「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當此五九之重臨也，深願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其三復斯言！

謂爲與英蘇談判毫無關係，其誰信之？

當英蘇談判伊始，識者早知以兩國立場之不同，主義之不同，過去意見之不愜，談判勢難順利。證之李氏之去職以及去職後兼旬來談判之滯延，更可信矣。今者，兩國所提對案，距離頗遠，將來成功與否，尙不可知。然一察兩國之國策，前途如何，當不難推測其一二。蓋個中癥結，乃爲雙方互不信任有以致之。蘇聯對英國之外交總覺圓滑而欠誠意，既欲綏靖於歐洲，又不願負其全責；以保障全歐之安全，且復思強蘇聯步武其後塵。既一面

有所期待蘇聯，又一面仍有所戒懼於蘇聯。如此不能推誠相與，欲求兩國訂立協定，不亦夏夏乎其難矣。况蘇聯國策，但求充實國力，不願捲入世界混亂局面之漩渦，自史太林秉政以來，其國策始終未稍變更。李氏掌握外交十餘年，其間雖與歐洲各國發生

德義締結政治軍事同盟

國際外交之縱橫捭闔，雖足令人撲朔迷離，然苟能明瞭各國情勢與錯綜複雜之關係，不難有線索可尋。况一事之來蹤去跡，必有其刺激與背景，決非空谷而能來風者也。然則德義同盟之簽訂，豈偶然哉？兩月以來，英蘇談判使者，往來頻繁，此國際上之刺激一也。英法蘇民治國家陣線之連合，甚囂塵上，此國際上之刺激二也。誰爲獨裁國，誰爲民治國？孰爲侵略者，孰爲和平者？世界輿論不能使國與國之間相融和，反離間挑撥以割深其鴻溝，此國際上之刺激三也。德意兩國，受同樣之刺激，風雨同舟，焉能不警惕以互勵，此則兩國同盟之所以締結也。抑德意兩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早已心心相印，今日之訂約，僅爲公開表示決心而已，本不足驚異。所可異者，世人劃國際壁壘者，輒將德日意三國成爲一軸心，而今日德意同盟，日本未與焉。此無他，日本所處之地位不同使然耳。德意在歐洲，日本在遠東；英法蘇連合可以包圍德意於歐洲，但不能包圍日本於遠東。德意之目的，在打破歐洲所受之包圍而建設歐洲之新秩序；日本之目的，在反對蘇聯之赤化，而建設東亞新秩序。故德意不能與英法相容，而日本猶可與英法相處。觀於本月二十日日日本五相緊急會議之決定，願修正防共協定，精神上予德意以援助，不願參加同盟

許多密切關係，如加入國際聯盟，與多國締結協定。然皆非如此次與英談判性質之嚴重，稍一不慎，即能捲入歐局混亂局面之漩渦而不可拔。毋怪當李氏與英談判正酣之時而使之去職也。

以期避免引起民治國家之仇視，日本之外交政策，概可見矣。有見於重光大使與哈里法克斯之周旋，大島大使與里賓特洛甫齊亞諾之往來，即識日本乃患得患失，無一定之國策，是誠不知日本之外交者也。日本之外交，洵如申報社論有云：「彼（指日本）當前之惟一問題，惟一國策，即在尋求如何始能有利於彼之對華。謂對德意，乃至對英對蘇，要無不以彼所謂對華問題爲之中心。挾德意以要英國，要英國以疎蘇聯，豈問鼎歐洲之謂哉！」（見五月十日申報社論）

於此，吾不覺有深威焉。日本以對華問題爲中心，故與英聯絡，獨我國人猶時時希冀英法助我以抗日，何所見若是其短淺耶！須知國際間之與國，決不爲我所獨用，我可以利誘與國，他人亦可爲之。况今日國際外交之手腕，只見痲強，未聞扶弱。或曰：英日在遠東利益衝突頗多，英決不助日以對華，是亦淺見之論。蓋不聞日本外交聲明，願在中國維護第三國家之利益。英國雖不深信，然亦不致全然不信，英國處此情形，固不致助日對華，但亦不致助華對日，其理彰彰甚明。國人明此，可以與語外交矣。

中日兩國政策固宜一定不變乎

按本文係某某先生一年前之手寫稿，茲轉輾商得本人同意，在本誌發表。暫姑隱作姓名，讀者諒之。 編者誌

回憶三四十年前吾國儒林，有兩種分派，其一曰守舊又曰維新。凡尊重舊法舊制，不肯隨時代而變遷者，統名之曰守舊，甚且詆之為頑固，反之名為維新。時代趨勢究不容守舊者之不變，於是每經一次國難，即醞釀成一種新的變化，此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亦然，不過中國之國難，先後接踵而來，加以新起變化，在日本非常順利，在中國每多頓挫，故中國經過若干次之新變化，而國難仍未能已，然今茲中日之大衝突，實一東亞大局共同之大難，亦即中日兩國共同之大難，依據窮則變變則通之理，中日兩國豈容再蹈頑固守舊之例，緊緊抱定互自毀滅之政策，而不一變乎？

今再從另一方面，以研究中國兩方政策，應否根本改革之理由。

第一政治家之最大義務，最高信條，固何物乎，曰為人民謀最大多數最大幸福而已。（以下簡稱大多數幸福）故在賢明之政治家，心目中所謂正義，即此大多數幸福，所謂人格，即此大多數幸福，所謂成功，亦即此大多數幸福之實現，離大多數幸福，即無所謂正義人格，無所謂成功，故一二人之權利名譽乃至普通所謂主義，可以犧牲，而惟大多數幸福，則絕對的不能犧牲，其有顧全一二人之名譽與權利，乃至守平時信奉之主張與政策，

而不顧惜大多數幸福者，絕非政治家所應為，此種事例，在西方諸國之政治史上不知凡幾，去年英國首相張伯倫亦犧牲英國昔年祖護阿比西尼亞以制裁意大利之原有立場，犧牲英政府近年來依國際聯盟謀集體安全之傳統政策，一變而伸手以聯意德之款，此在東方人之着重個人道德立場上觀察，着重信義立場上觀察，張伯倫氏之此種行為，可謂無人格，英國會議員中之擁護張伯倫政策，英國會議員可謂無人格，然不知張伯倫心目中所謂人格，決不能離開大多數英國人幸福而獨立存在，倘為表現張伯倫個人人格，而至危及英國人大多數幸福者，在張伯倫計之，決不能為政治家的人格，此正我東方人所謂不易理解，而最應藉此以樹立政治上最大義務的最高信念者也。

其次與最大義務的最高信念，相因而至之連帶條件曰為「力」的認識。蓋以保障大多數幸福之最大要點，無過國際關係。國際間能保持和平，始有一切幸福可圖，否則國人將傾其所有以貢獻於戰爭，一切人生幸福將為剝奪淨盡，不幸而敗，小之將賠款失地，大之更將滅亡其國家。故現代國家一方縱為國家民族之獨立與生存，盡量充實其國防力，而一方却以萬分審慎之政策，竭力迴避戰禍之發生，一旦不幸而國際間有重大衝突發生，有非訴諸武力不可，即戰爭不易避免之時，則一國政治家之下其最後的決定，必以「力」的比較，為先決問題。不獨政治家如此，一國國民之言動，隨在與國家政策，有重大影響，國民當此之時，應

如何督促政府下最後適當的決定，亦必以「力」的比較爲先決問題，必國民澈底了解「力」的比較，所謂知己知彼，而後可使保障大多數幸福之方法，不致錯誤，否則其心縱在保障大多數幸福，其效果或致相反，然提到此點，我國人以左列關係，不免有缺憾。

(一) 徵兵制未實行，坐而討論國家戰計者，以縱在戰時，亦能超然於戰事以外，於戰時恐怖情況不感嚴重。

(二) 科學未普及，尤其科學與兵器之關係，以及現代科學殺人之慘烈不免忽視。

(三) 超越利害之正義觀念，已成歷史上的遺傳，對於戰亦亡，不戰亦亡之正義論，以及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等之英雄論，幾幾奉爲不必懷疑不必研究之經典，而不求萬全。

然此種「力」的認識，負責之當局，究勝於民間，九一八以前，政府何以不隨民間，取收復失地之軍事行動，何以請汪精衛黃膺白諸氏出而採取緩和政策，何以汪精衛黃膺白諸氏直任不辭，犯親日之責難而行其所是。一語蔽之曰「力」的認識而已。即在作者，九一八事變後，凡所爲文，何以贊許此次抗戰前政府之對日外交，何以未能追隨時論，以作快心正論。凡所言談，何以常與當世學人，相扞格而不合時宜，豈真愛國後人，或別有先見，亦不過對於「力」的一點，特別重視而已。

不過所謂「力」者，原有精神力與物質力兩種，我國人向以精神力之注重，而輕視物質力，固與大多數幸福之私計上，或爲不智，然而如果有過於重視物質力，以爲在槍砲炸彈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亦豈計之宜，此則我東方人對於力的關係上，應各自反省，是否有認識不足之錯誤者也。

在「大多數幸福」與「力的關係」兩前提之下，不能不要求

政治家具有極大之「彈力」。彈力者伸縮力也。猶之金銀鋼鐵，一方爲硬度至高之物質，一方却具有柔性作用，可以爲圓，可以爲方，可以爲至細之絲，可以彎曲成種種之形狀，是謂極大的彈力。昔聞人言，我中華民族所以歷四五千年而未亡，其間全賴有此種彈力，故一國家之政治機構，縱爲外來暴力所破壞，如史上之金元清各期，然我民族仍能憑藉其勤儉奮鬥之美德，以生存於惡劣環境之下，一旦有奮然而起之機會，即有若干豪傑之士振臂一呼，仍能恢復其民族自決之精神。

故晚近日本文學博士加藤虎亮之著者中國民族性一書，特別柔韌性一項，蓋此雖爲文明人求生存之天賦本能，所謂適者生存之理，而亦中國孔老之學說思想處處有柔克之精神深入人心也。顧此種彈力，雖在一民族中，各人亦必不相同，大抵重要原因，在於環境與教育上的啓導，例如張子房懷五世報韓之夙志，本已有堅忍不拔（即彈力）之精神，而蘇子瞻論留侯一文，尙盛稱黃石老人之故意挫折之，以試其忍力如何，以爲培養忍力的啓導，可見彈力之養成，亦須由於教育，猶之生鐵（彈力甚小）之製成鋼鐵，必須幾經鍛鍊而然也。然晚近十餘年來，我國政治上之所指導，教育上之所提倡，曰爲一般的民衆運動，曰爲發奮的集體運動，而於各個的內心修養，獨特的人格鍛鍊，則忽略而不加注意，於是對於七八十年來種種國恥之反應，造成一種羣衆打倒帝國主義之正直呼聲，而不反省自身弱點所在。時代潮流既已如此，於是當局亦往往影響於憤激之舉情，歷史所謂苦心謀國委曲求全種種行徑，遂葬送於不知不覺中。然「力」的關係，決非可以自羣衆呼喊中得來，如果我本身的力本極充足，羣衆對外的感情尙應加以節制，何況我本身的力，破綻萬端。夫有力者之不可濫用其力，與無力不足者之不可輕與人角力，均爲在此科學鬥爭時代

當局與國民應具有共同之省覺，非此將無以保障大多數幸福，而由此種省覺以見諸行動，必須濟之以強大之彈力，即極大之伸縮力，老子道德經之言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此不獨爲宇宙間之真理，亦爲政治上之神術，凡爲政治家者，必須神而明之，以盡運用之妙者也。

今綜上所述，以論國家政策，則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其政策之本身，理論上如何正大，若以國力的關係，不能推行此種政策，強欲推行之，必致其國民大多數幸福，受有更大犧牲時，必須運用強大之伸縮力，以改變一種舊政策，以選擇一種新政策，此從正面言也，若從反面言，無論其政策之性質，理論上如何不合，苟以國力的關係，採行此種政策，爲可減少國民大多數幸福之重大犧牲時，亦必須運行極強大之伸縮力，以忍痛行之，總括言之，國家政策，必不容許根據主觀，以循一定不變之路。換言之，變是政治家必要的覺悟。故因時制宜，在中國古代政治家闡明此義者，不知凡幾，而排斥堅持不變之論，在西洋哲人中，尤不知凡幾，今試引美國愛馬孫氏之言以作一證，愛氏之言曰「愚拙的堅持，僅爲幼稚思想之畸形發展，僅爲幼稚政治家與幼稚哲學家所奉行。若此之堅持不變，雖濟以極大魄力亦無能爲，故今日之思想，明日變之可也，兩者雖爲矛盾，亦不足爲非，雖被人誤解，亦不介意，蓋誤解非即本身之錯誤，若蘇格拉底若耶穌若羅德，若牛頓種種偉大成功者，無一不經世人之誤解而來也。」因此賢明之政治家，決無膠着與拘執一種定見以謀國者，歷史上足以證明此種變遷之舉例，更不知凡幾，今以希望我東方中日兩國政治家各反省前此所採政策，其理論如何，姑置不論，而在事實上已至於大可毀滅東亞，小而毀滅自身之絕境，在此絕境中，應尋求一種變化之新設計，特舉出中日兩方近代史中之二三事

例於左：

第一先言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將軍秉政時期，非堅守鎖國政策者乎，然迨將軍或覺鎖國政策之終不可行，一變而爲傾向開國也，因此而激動國人義憤，竟由反對開國而揭尊王攘夷之旗。尊王者倒幕（即將軍家）之別名也。攘夷者反對開國之口號也。結果將軍奉還政權，而明治維新之局開，論理攘夷鎖國之政策，應從此實行矣，然不意以反對開國（即攘夷）倒幕者，竟由倒幕諸人繼將軍而踵行其開國政策，此中變化，表面觀之，幾莫名其妙，然實際並不甚奇也，蓋在倒幕以前，鎖國政策之不能再行，惟將軍比較國力，熟權利害而始知之。迨倒幕以後，國家責任，落於倒幕之有力者之手，而倒幕有力者，（如薩長諸藩）亦以熟權利害審察國力之故，感覺鎖國政策，將貽日本以莫大之危機，故不能放棄其攘夷之主張也。由反對開國而尊王攘夷，由尊王攘夷而倒幕，由倒幕而仍行開國，是爲日本近代史上一大奇觀，而不知日本國運，從此如旭日東昇，其初步實得力於此，至其對朝鮮政策，在明治維新初年，何等謹慎，積二十餘年，而始放胆行之，完全爲依國力以定政策之同一心胸也。

第二試言前清，庚子以前，清廷非以反對康梁之維新變法，甚至於激成庚子年之排外乎，論庚子義和團所採方法，毫不明世界大勢，本不足道，然其所標扶清滅洋口號，不能謂非一種國民思想之畸形發展，其情狀較之日本反對開國時，一面大倡其反基督之氣勢，一面有所謂武士階級者，以戕殺外人爲快意，彼此恰相似也。然以主張此種守舊排外政策之清廷，經八國聯軍之禍，加以其時封疆大吏，審度國力，熟權利害之故，紛持異議，終不能放棄其排外守舊之主張，而至於媾和維新，就政策言政策，此不能謂非一大轉變，惜當時我國不幸有民族問題介乎其間耳，

情後來清廷政治又入腐化狀態耳。不然，經此一大轉變，全局得免於惡化，未始不可以漸入於剝極而復之佳境。一如日本明治維新之局也。以上兩例意在說明國家政策，無一定不變之理，中日兩國之當局與國民如能念此先例，各就精神物質兩方面力的關係以熟權將來大多數幸福所在乎，則昨日之是，今日未始不能以爲非，昨日之所以爲非，今日未始不可以爲是，各各放棄從前自殺自殘之舊路，以開拓今後共存共榮之新路，只在轉念間耳。

理論上實際上，中日兩方政策之必須轉變彰彰如是，然所以迄今猶咬緊牙關各走絕路，毫無轉變之朕兆者，其原因果安在乎，雖曰兩方各有欲罷不能之事勢乎，雖曰有貫徹主張之希望乎，然所以感覺欲罷不能所以必欲於無可貫徹之中，求其實貫徹者，其癥結仍在兩方之心理中焉，此心理上之癥結爲何，曰爲東方之武士精神。

所謂武士精神者何也，曰爲「可殺不可辱」曰爲「名譽重於生命」曰爲「甯死不屈」曰爲「雖敗猶榮」曰爲「大義凜然」曰爲「正氣不死」，此種精神，通與前述彈力，完全相反，溯其源流，本發達於吾國春秋戰國時代。太史公遊俠列傳，不過舉若干特殊人物，實則當時士大夫間充滿此種精神，梁任公時特選錄數十人名曰中國之武士道，可以見也，此種精神，後經專制帝王之摧殘，式微不振，至宋明未造，以遭受外侮，始經一部份士大夫提倡，由式微而發皇，同時日本人士之吸收外來文明，專融化其特長，我春秋戰國時代之任俠精神，遂不期然而形成日本之武士道。今茲中日兩方之主體與負責者，在日本指中國，則曰爲國民黨，在中國指日本，則爲一部軍人，無論兩方所指，均涉一偏，不足以蔽全體，即日本除一部軍人外，明明有思想家經濟家之所謂東亞協同政策，在中國除國民黨外，明明有各黨各派之一致合

作，共同致力於全民抗戰，然所謂國民黨與軍人，實爲兩方負責任者之主角，則固事實也，而國民黨之由來與宋明末造士大夫間所標榜之正氣論，即武士精神者有密切淵源，加以當此全面抗戰之時，發皇光大此武士精神，尤爲得計，故今日中國國民間，無論各個人之行爲，縱不一致，而感覺此種精神之爲正大，加以與國民精神交流之故，幾成全國風氣潮流也。其在日本，則軍人間形成之武士道，與全國國民所形成之國民性幾幾於大和魂三字之美名下，無由分別也，曰中國之武士道，曰日本之武士道，其物本出於二千年前之一源，然不期然而此種同源之武士道，憑藉於兩個形式的國民，以演成一決門，兩方各集數十百萬之精壯，以共赴寧可死不可辱之旗幟下，而所謂榮辱者，結果萬難兩全，此則今日中日兩方，已屆政策轉變之期，而實際上絕無轉變朕兆之一大動源，並可謂此次戰局之內在的主要動機也。雖然，我至可寶貴之武士道乎，無論在中國在日本，第一應認清在大多數幸福之前，無所謂屈，無所謂辱，在政治上之所謂政道，絕不能注重於若干少數人之榮辱，而應注重於大多數人之存亡。

第二須覺悟犧牲一己，以救大多數民衆，以救億萬民族所託命之國家，即爲武士道之最大本領，中日兩方之表面負責者，其誠愛護武士道乎，則犧牲自己之所信，與體面，以救自己國家，以救東亞大局，以救黃色人種之時機到矣。

政略與戰略 (二續)

金玉律

四 政略與戰略的意義

「古之所謂志學有爲者，非苟焉以虛聲譎衆也；將求肆考夫國家興亡治亂之故，民生休戚安危之理，仁賢英傑之所以立，奸雄寇賊之所以起。執者得，執者失；執者智，執者愚；執者正，執者奇；執者宜，執者倖；執者可師，執者當戒；執者互古而不變，執者勢異而事殊。如是上下古今，深鉤隱索，其必有資於史，史又必專注於兵，兵又必殫舉夫形勢家也。」

——陳朝爵：讀史方輿紀要京省序注序——

陳朝爵君在上文中所說的「形勢家」，實際上就是指我們前面提出的「縱橫家」而言；換句話說，也就是指那些政略或戰略的決定者。漢書藝文志謂：「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書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設而乘其信。」近人蔡元培亦謂：「周季，貴族失職，侯王競招游士，士亦以游說爲進身之階，故游士甚盛，其所主張並不止合縱連橫之兩策，徒以蘇秦張儀爲游士翹楚，而其所主張，適爲縱橫問題，故劉向班固等，輒以縱橫代表之。實際「縱橫」二字，有種種說法：

「縱者，合衆強以攻一弱；而橫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

——韓非子——

「天下未嘗無事也，非縱即橫也；橫成則秦帝，縱成則

楚王。」

「夫縱人（主張合縱的人）者，飭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不言其害。……夫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爲秦成。」

國策

國策

以上所說，大概均謂「縱橫」兩字各包括一種政策，一種戰略。南北叫做「縱」，所以聯六國以拒秦叫做「合縱」；東西稱爲「橫」，所以以擊破六國的聯合戰線，引誘六國互相水火，俾使秦國可得逐個併吞的戰略叫做「連橫」。主張前者的稱爲「縱人」，以蘇秦爲代表。主張後者的稱爲「橫人」，以張儀爲代表。所以「縱橫」二字是「合縱」「連橫」的意思；而主張這種策略的人，就叫做「縱橫家」。這種解釋，固然因爲簡捷明瞭的關係，頗爲一般人所引用，但假如深刻的加以研究，即可知是不盡然的。如章學誠在其所著校讎通義上即認「縱橫」二字爲「詞說之總名」，並非專指「合縱」「連橫」而言，因爲這不過是戰國時特殊情形下爲適應環境打開環境而定的兩種策略，倘若「縱橫」的內容係此兩策，那末「就無戰國，則無縱橫矣！」（語見校讎通義）而江山淵氏亦謂：「……況縱橫者，一縱一橫，迥不相侔蓋蘇張之術不同，宗旨各別，明爲二家，安可納爲一家耶？」這樣看來，「縱橫」二字似乎尙不能直截了當的把它解釋成「合縱連橫」的縮語，必定尙有其他意義，茲節錄數家如下：

「……此飛箝之綴也，用之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

面，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鬼谷子——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之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爻。」

——莊子：徐無鬼篇——

「……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容，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鬼谷子：忤合篇——

「縱橫家之得名，因於縱人橫人；六國抗秦為縱，以秦制六國為橫。其名實不通於異時異處。漢志所錄，漢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蒯通勸韓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鄒陽仕梁，值吳楚猖狂之世，其書入於縱橫家，亦其所也。其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著一篇，身仕王朝，復何縱橫之有？然則縱橫者，遊說之異名，非獨外交顛對之事也。」

——章太炎：太炎文集——

章學誠認「縱橫」二字為「詞說之總名」，章太炎則以「縱橫」二字為「遊說之異名」。這樣一來，範圍似乎廣得多了。但是我們仔細揣摩「縱橫家」的集大成者之鬼谷子的著作，覺得待他所说的「縱橫」，似乎比章學誠章太炎的解釋更進一步，範疇更來得廣汎，不僅包含「縱橫掉圖」的遊說之術，而且冀圖求得宇宙的法則、社會的法則、歷史演變因果維繫的法則、人類心理常態或變態時之法則，企劃運用根據此種種法則以推測一切人事之演變，執簡馭繁，匪特想貫串繁複的政治形態，而且想插入政治變態情況下的戰爭範疇。換句話說，不僅想藉此種種法則來決

定政略，而且想用此種種法則來決定戰略。譬如前面所引鬼谷子忤合篇的一段：「……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容，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這與下列談戰略諸書的理論實如出一轍：

「知彼知己者，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孫子：謀攻篇——

「凡戰之要，必先古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吳起：吳子——

「凡審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與師伐亂，必能入之。」

——尉繚子——

「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而起，不勝則止。故日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足以發兵如疾雷之不及掩耳，迅電之不及瞑目。赴之不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

——張子房：張子——

「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

——張子房：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

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足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踐踏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張子房：張子——

「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者是音。齊過進退，參之天地，出實出虛，據將破軍，發如緘矢，如雷震。暴疾擣虛假若墮牆，執急節短，用不纒纒，避吾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

——歐冠子——

以上所引完全是兵家言，但在鬼谷子十三篇中，除掉上面已述的一段外，尚有許多理論是與兵家符合的。例如：——

「觀陽陰之開闔，以命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皆已先定，爲之法則。」

「己審先定，以牧人策。」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摩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

「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

「何謂量權？曰：「皮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執利執害？謀慮孰長孰短？按君臣之親疏，執賢孰不肖？與賓客

之智慧，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量權。」

「掉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掉者，或掉而出之，或掉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自天地之合離始終，必有隙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掉闔，能用此道者，聖人也。」

「聖人見萌芽蠱蟻，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覆之。……世無可抵，則深隨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

「聖人不朽，時變自守。」

「智用于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這些理論，實熔冶政略戰略於一爐，所以，江山潤氏認爲縱橫家與兵家實在有很密切的關係，他說：——

「……若縱橫家者，亦堅忍而陰鷲者也。縱橫家以蘇張爲最著；蘇秦受妻嫂之辱，張儀受館人之賤，而忍辱負恥，志不少衰，蓋其學亦出於陰符經。考蘇張皆師鬼谷子，鬼谷子善陰謀，其書有陰符七術，及揣摩諸篇。戰國策亦言：「蘇秦發書，陳箴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是則縱橫家之學，出於陰符經無疑。史記又曰：「鬼谷子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學。其後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常而坐，巖頭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是即老子明哲保身之道也。蘇張既得鬼谷之學，出而縱橫掉闔，鼓其如簧之舌，而發爲違心之論，取功名富貴如

拾芥，是亦老子翕張與奪之術也。縱橫家又有蒯子五篇，考漢書劇通傳謂：「論戰國時說士權變」。按所謂權變者，即權謀之謂；是可知縱橫家之學，以權謀爲宗旨，與兵家同。

姜太公是周文王的軍師。曾在孟津會合八百諸侯伐紂，是與周八百載的最大功臣，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偉大政治家與戰略家。

普通流行的小說封神榜，除掉那些想入非非的戰術戰具外，大都是描寫他的政略與戰略。而六韜是否爲他所作，固然是大問題，但其中完全記載他與文王武王討論政略戰略則係鐵一樣的事實，所以，他之被一般人稱爲兵家始祖，是不無理由的。蘇秦所得的太公陰符之篇，也許確是他遺留下來的理論的片光隻羽。至於老子雖然一般都認爲是道家的始祖，而道家的理論的精微處既然在於「清靜無爲」，那末好像與縱橫家的「好大喜功」迥不相侔了。但實際上是不盡然的，老子的道德經裏面就有着下列的一段：

「用兵有言，吾不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這與孫子「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昔之喜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等理論實相彷彿，所以縱橫家與道家不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也不能說根本沒有聯繫，至少在談兵方面是有一致的地方的。

蘇秦，一般人都只知道他不過是一個「搖唇鼓舌」的辯士，實際上他對於當時戰國時對峙的形勢，確下過一番苦功夫研究的

他對於任何國的內政外交情勢均頗熟悉，假如現在國策上所載的辯詞都是真實的話，他真不愧是一個眼光敏銳的戰略家，他真不愧是鬼谷子門下專攻政略的高足弟子；他雖然專攻政略，但他對戰略也有相當認識。譬如，他在未曾得意前對秦王說說過這樣的話：

「……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紂，齊王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擄，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成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這是他煽動秦王的話，當時秦國在地理上確已占了很大的便宜。在蘇秦的原意固然是打他個人「功名富貴」的算盤，但這算盤是打得很準確的。他在鬼谷子那邊學成後，就跑回家變換產業，備足旅費，不惜千金的重價購狐裘一襲，裝成一個闖政客的樣子，對於其他諸國絲毫沒有留戀，一直就到秦國，原想望秦王能夠重用他，使他得積極的用世，輔秦王鞭撻天下，如果那時候能夠如願以償，那末，張儀李斯的大功也許是他的了！却不料「書十上而秦王不用」。不得不垂頭喪氣的回秦，假如回家而所受父母妻嫂的刺激不過凶，也許他仍能「靜以待時」，過了相當時候他仍會到秦國去求用世。却不料回家來竟受了這許多家庭間的冤氣，於是他就改換大計，只求速成了！將過去已決定了的政略與戰略完全放棄，在一年中用「懸樑刺股」的苦工夫再準備好新的政略戰略，這時候，他的目的只在想早日出這口冤氣，早日揚眉

吐氣，一方面想使不用他的秦國看看顏色，一方面想快一點施施然驕於妻嫂的面前。及到六國初步的聯合陣線成功，他這兩方面的目的總算都達到了。於是乎就說出：「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功名富貴，豈可以忽乎哉！」這樣洋洋得意的話來，不過雖然是洋洋得意，他究竟是聰明的，他何嘗不知道六國的聯合陣線只不過是暫時的曇花！在同床異夢的情形下，是決難用武力來打倒秦國的，所以，他在這時候的措辭，就與前對秦王時根本不同了：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

顯然，他在這裏的措辭是偏重政略了，想運用政略的精誠團結來克服困難了！但這是枉然的，因爲六國的內情他已經看清楚了，想損除私見來同舟共濟是困難萬分的。所以，他也就消極了，不願爲六國謀長治久安的大計，而只求他自己一生不失敗也就算了。於是，他對於同學的張儀玩一套他自己親受過的刺激手段，同時又暗地派人資送保護儀到秦國去，而不在他生前搗蛋爲唯一的條件。可見秦國的終能吞併六國，六國的終不免先後覆亡這一點，蘇秦是始終看得很清楚的。他所以要使六國勉強結合起來，對六國君主說那麼許多的「違心之論」，都無非爲了他個人精神上的快意——揚眉吐氣——及物質上的享受——位尊多金——而已！因此，使得縱橫家蒙受不潔的惡名，好像縱橫家就是自私自利的別稱！而鬼谷子一書有人說是蘇秦僞托的，所以對鬼谷子的內容，也不免有種種的惡評。最劇烈的如下：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

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佯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盜奇，而道益愜，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冀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柳子厚——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掉圖鉤符之術，祇可施於闇君耳！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於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閉合，未必皆見此書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於窮，亦何苦而爲此耳！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人者，如遺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唯恐臥，必將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術不更疏乎？」

——盧文弨——

他們雖然攻擊鬼谷子這樣利害，但也不缺乏讚揚這本縱橫家的最重要文獻的：

「鬼谷子書，其智謀，其術數，其變譎，其辯說，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開一閉，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學術，往往有得於閉關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子嘗賭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賂略之不可該者，而谷鬼盡得而泄之，其亦不代之雄乎？」

「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高似孫——
——曾子固——

實際，谷鬼子及其他一切縱橫家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價值，絕對不會因爲受他人毀斥而減損，也絕對不會受他人頌揚而成爲沒有絲毫實處的「萬應靈符」。這只是一種的手段，一種的工具。在亂世的時候，需要「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因而，揣摩鬼谷子及其他縱橫家兵家的著作的人也就多起來，運用這種手段工具的人也就不致缺乏「風雲際會」「得時則駕」的機緣。但，這當中有一種很重大的差別，即在「爲公乎？爲私乎？」這一個分水嶺上。假如他用這種手段工具爲的是國家民族，換句話說：即企圖把陷於危亡命運的國族挽救出來，則成功固然是民族英雄，國家的中流砥柱；即失敗亦不失爲蓋臣志士！假如他用這種手段工具的目的是同蘇秦一樣，爲的只是個人精神上的快意——揚眉吐氣——與物質上的享受——位尊多金，則成功亦無補于國族，失敗更加是咎由自取！所以，蘇洵所說的「用其術，而不取其心。」實在是比較中肯的批評。因爲縱橫家「權謀術數」的本身，並不是壞的，譬如：魯仲連的排難解紛，毛遂的脅楚救趙，唐雎的「轉危爲安，運亡爲存。」都不失爲純正政略的運用。至於在戰爭方面，尤其是「兵不厭詐」，馮猶龍所謂：「道取其平，兵不厭詐，實處虛實，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無窮，莫知所以。」岳忠武論兵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愚以爲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嚴也；爲將者患不知耳。誠知差之累骨，不如踐之問孤；楚之抗降，不如晉之釋原；偃之遷延，不如楚之斬髮；季之負載，不如孟之焚舟；雖欲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不可得矣！

又況夫泓水之襄敗於仁，鄆陵之共敗於信，閔中之飛敗於嚴，邲河之穀敗於勇。越公委千人以嘗敵，馬服須後念以濟功；李廣能刁斗之警，淮陰忍跨下之羞。以仁、信、勇、嚴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勇、不嚴而若此，其故何哉？智與不智之異耳！愚遇智，智勝；智遇尤智，尤智勝。故或不戰而勝，或百戰百勝，或正勝，或謫勝，或出新意而勝，或仿古兵法而勝。天異時，地異利，敵異情，我亦異勢，用勢者因之以取勝焉。……岳忠武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儒者亦有時言兵，然儒者正不可與言兵；儒者之言兵惡詐，智者之言兵惟恐不能詐。夫惟能詐者能戰，能戰者所能爲不戰者乎？近人張志鈺在其所著現代戰爭論中也說：「現代戰爭，是國家互相競爭生存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無論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抑或是帝國主義國家間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它們爲求戰爭獲得勝利起見，只要有有利，是什麼方法都要採用的。」因爲戰爭正如孫子所謂「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始計篇）誰都知道曉得「兵凶戰危」，所以用兵不可以不知道生死亡亡的幾微；有戰而死，有不戰而死；有戰而生，有不戰而生；有戰而存，有不戰而存；有戰而亡，有不戰而亡。其間消息盈虛，繁蹟萬分；有時候本來是準備得好好的，但只要相差一着，就必致全盤俱錯；有時候表面看去雖好像螳臂當車，必敗無疑，但敗棋亦未始沒有勝着，只要平心靜氣，運用一切的政略與戰略，亦未嘗不可以收功桑榆。我國古代典型的戰將如李牧、周亞夫、李靖、曹彬等，對於戰爭的態度都非常慎重，抱着「不萬全不戰」主義，這就是因爲他們不僅深通戰略，而且對於政略也有深刻認識的緣故，所以往往一戰功成。反之，如春秋戰國時趙括以輕戰而敗，夫差以累戰而敗；楚莊王雖知道子玉剛愎自用，不堪爲帥，但不加阻止而聽其蠻幹，卒致兵敗自刎。李光

弼、楊無敵等雖不乏自知之明，知道不好輕舉妄動，徒以朝廷詔書切囑，督戰過急，遂倉皇應戰，草率交鋒，以致損兵折將，使國家元氣大虧。這正如呂氏春秋中所說的一樣：「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但，怎麼樣才能稱爲善用呢？這就是最精微最艱深的難題了！

其實，一切的事情，都可以作如是觀，也不僅是兵事如此，譬如就普通人人都用的金錢而言，也何嘗不是「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呢！而「禍福」兩事，也還是相對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及其失馬，焉知非福？」世界上沒有千年強盛的國家，任憑你怎樣的禱告，希臘「武運長久」，終免不了天演的循環，人事的興衰？所以，戰敗的國家不必垂頭喪氣！戰勝的國家也不應恃勢凌人！沒有兵敗會稽的奇恥大辱，越王勾踐未必肯生聚教訓、嘗胆臥薪，信任范蠡文種，毅然抱定沼吳的決心！沒有巴黎重困的城下之盟，民族英雄智業 (Adolphe Thiers) 亦未必甘受艱辛毀謗，任勞任怨，給國家恢復元氣。而奢逸惡勞的法國民族，也不見得即能勤儉力

英美蘇遠東外交政策之演進及其變化

沈昌華

行，以收歐戰千載一時的雪恥良機！春秋時鄭國子耳侵略蔡地，把蔡司馬公子雙生擒回來，所有的人民都歡天喜地，以爲這真是所謂「武運長久」的事實表現，很可以繼續鄭莊公的霸業。只有明眼的政略家子產（那時還很年輕）却不但不順衆而喜，且面呈憂色，人家問他爲什麼？他很坦白的說：「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令鄭國不四五年弗得事矣！」他父親子國聽了，很討厭他煞風景，所以疾言厲色的教訓他：「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却不料沒隔多少時候，就應在這「童子」的口裏，晉楚果然輪流加兵於鄭，而耀兵蔡郊過的鄭國幾至滅亡。普魯士在打勝法國後，兵驕將忿，倘使沒有俾斯麥 (Bismarck) 運用政略，懸崖勒馬，不爲己甚，則德國的武運也許不待歐戰結束就早已終結，而使得今日希特勒在耀武揚威時也不免增加許多障礙。所以，收拾戰敗後的殘局固然是吃力不討好的難事，而如何的「持盈保泰」，在萬金的保障獲得勝利的戰果，也同樣是一件需要眼光魄力的艱難大業！

一 美國遠東外交政策之剖視

讀過美國外交史的人，誰都知道她的動向，素以三個傳統觀念爲基礎：對歐洲是孤立主義 (Isolation)，對美洲是自決主義 (Self-determination)，對遠東是合作主義 (Cooperation)。第一個是民族自決的領袖華盛頓所倡導的不捲入歐洲戰爭濶海主義，第二個是孟羅氏 (P. James Monroe) 的門羅主義，第三個是海約翰氏 (John Hay) 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合作主義。當華盛頓

宣佈 (Alliance With none, friendship with everyone) 不捲入歐洲政潮政策時，美係一農業國家，自給自足，誠屬世外桃源，後以繼續的墾植，造成農產過剩之情境，乃逐漸的趨于工業之蕃，不得不以過剩的農產品，換取歐洲工業品及生產機器。講她的經濟環境，實屬與世無爭，故對於保護海外市場建築大量海軍，保護關稅政策等問題，當然不感興趣。因爲她知道歐洲各國之劫送秋波，都是不懷好意，真正的國利所在，惟富是賴，富

能利國，亦能利民，富能強國，亦能安民，惟利是視，惟富是圖，因而孤立的政策，得到全美人民之擁戴，差不多有數千年之久，在國家的利益方面，確乎貢獻不少。觀乎前次美國雖參加歐洲大戰，始終未與任何國家締結盟約，威爾遜總統的計劃率為國會所否決，至今還是一個非國聯會員國，可見孤立的政策，至今還盤旋著在全美人民的腦海中。美國一方面雖向著不捲入歐洲戰爭旋渦之主義邁進，在歐洲祇謀經濟方面的發展，同時他定「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他的」的宿願，因而在孤立政策之外，加上了「一個「門羅」的假面具，希冀掩飾她自己的野心。

到了一八四一年戴樂爾總統 (John Tyler) 任內，韋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為國務卿時，國內工商業，膨脹邁進，生產過剩，有向外覓市場之必要，於是促進海外航業，實行保護關稅制度，遂逐漸的放棄孤立主義與門羅主義的精神，著手開拓中國的市場，打破日本緊關著的門戶，（在一八五二年，美國容納艦隊司令伯利 (C. Perry) 的建議，便佔領了日本的博多羣島 (Bosha Island) 作為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自此以後，美之向外發展，以遠東為其虎視眈眈之目的物的企圖，益形露骨，奈不久以後，南北戰爭事發，不得不稍稍劍跡，移其注視力于國內經濟之建設與復興。到了迪爾費德總統 (James A. Garfield) 與阿孚總統 (Chester A. Arthur) 時代，美國國內經濟，又呈活躍狀態，遂又放態復萌，乃先後擴張海軍，為開發國外市場之後盾。

到了一八九七年麥金萊總統登台後，對於遠東侵略的動向，更趨急進，擴大海軍，佔據垂涎已久的南太平洋的良好海軍根據地如菲律賓，關島，薩摩亞 (Samoa) 及夏威夷羣島。從此美國對遠東的興趣由商業的轉入政治的階段了。同時英法日德俄諸國正計劃著瓜分中國，而美又以美西的戰爭的關係，未能與之明比為

好，國務總理海約翰，為圖將來之染指，乃向各國提出維持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策略。所謂門戶開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即各國不可以已得的權利阻止他國的自由貿易，亦即反對各國勢力範圍內對別國的歧視。但是猶恐未安。更進一步的要求諸國保障中國領土的完整與共同合作以維持列強在華的利益。這便是海約翰的合作主義，在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的九國公約中，更為具體的規定。

二 美國在遠東與俄日關係之演化

一八九五年以前，美國在遠東的勁敵，不是日本，而是帝俄。此時帝俄野心勃勃，步步向滿洲，朝鮮及日本北部諸島擴展勢力，日本為了平等安全二大目的，與帝俄發生利益上的衝突。美國此時，洞悉若任俄國勢力，繼續伸展，則美前途利益，勢必被之摒拒于遠東門戶之外，因而往往站在帝俄的對方祖護日本的利益。到了羅斯福第一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上台後，對於祖日的態度，益形露骨了，因為他覺得目前的局勢，非拘守孤立主義與門羅主義的時代，扶日抑俄，造成遠東的均勢，方可伸其魔手，希冀分得中國利益的一杯羹。故於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後，美國不僅在財政上援助日本，而且羅總統曾對德法兩國表示，如果法德助俄拒日，英美就要聯合助日作戰，等到日俄戰爭結束了後，羅總統又不辭勞瘁，在撲資茅斯 (Poughkeepsie) 召集和平會議，日本在美國祖護之下，獲得極大的利益。觀於上述美國外交的動向，察知海約翰門戶開放政策，是針對俄國而非針對日本，並且慷他人之慨，把中國當做俎上的肥肉，共同宰割，以飽私慾，以償野心而已。

日俄戰後，日本代替俄國，作為遠東的主人翁，遠東的形勢，驟然大變，加之塔虎脫總統 (William H. Taft) 繼羅總統中選

登台後，任用諾克斯 (Knox) 爲國務卿，其對於海外商業之發展，更爲積極，且以「金元外交」爲旗幟，以「現代外交是商業的」爲口號。諾克斯總理並云「現政府的外交政策，應以近代商務交通爲依歸，有人已經誇大其辭的說，以金元來代替子彈——這是很明顯的，我們努力方向在擴張美國在海外的市場，我們對於美國人民在海外合法的有利的企業，都以全力援助和保護。」他又說「美國的繁榮，完全依賴外國的市場，所以美國政府希望自己的人民保存貨物在國外自由暢銷，且保有優越的地位，那末政府就非集中全力注意海外市場的安全不可；否則美國的商人製造家雖然明知美國應居於首要的地位，但已爲別國捷足先登了。」此爲美國不肯放棄遠東市場的明顯的表示。不肯放棄遠東的市場，當然與日本發生利益上的衝突，由衝突而尖銳化，由尖銳化而改變其以前祖日的態度轉而趨於祖俄，泊乎今日，更予中國以財政上之援助，俾冀加強抗戰之能力與時間之持久，加速日本經濟之崩潰，重復的造成遠東的均勢。嗟夫！昔日美國之祖日態度轉而施之於俄，何爲乎！今而施之與中國，又何爲乎！祇爲自身的利益，並無真正的友誼存乎其間。是一種口蜜腹劍之策劃而已！願國人其三思之。

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後，日本便趁此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慘酷條件，於是美國着急了，因而產生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不承認任何國家有損害中國主權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的條約。凡有損害美國權利的條件，便在被廢之列，決不承認其存在。此日本的對中國二十一條的要求，在美人心目中看起來，是日本欲獨吞中國之決心的表現，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看起來，美國無往而不阻撓日本在華利益之發展。到了一九二〇年美國司克萊煤油公司 (Sinclair Oil Company) 與所謂

遠東共和國 (Far Eastern Republic) 商訂庫頁島北部煤油開採權，(哈定總統爲煤油公司之背景) 在日本人看來，實爲美國對日本一種不友好的行爲，且足以威脅日本國防之生命線。雖此問題，終告和平解決，然自此以後，日美間的芥蒂，不無益深。

歐戰告終，交戰各國，俱感精疲力盡，而以法意英等國，受災尤烈，瘡痍未愈，均無餘力顧及遠東，美日雖均爲參戰份子，美國祇在協約國財政方面，盡其助力，戰鬥人員，並未蒙受多大損失，至於日本，損失更微，反因大戰的結果，繼承德國許多遠東利益與德屬遠東島嶼之代管，其經濟勢力之進展，大有一日千里，有囊括全華，完成其東亞門羅主義，摒除美國利益於遠東門戶之外之局勢。美國於感受威脅之餘，因而大規模造艦築港，日圖伸張遠東的勢力，以冀挽回既倒之狂瀾，制止日本在中國經濟利益之繼續增高。並利用戰後債權國之優勢與餘威，乃於一九二一年召集華盛頓會議 (Washington Conference) 主要的議題，雖可分爲遠東問題與海軍裁減問題，先後成立四強公約 (Four Power Pact)，九國公約 (Nine Power Pact)，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維持門戶開放的政策，並訂立華府海軍條約，規定英美日主力艦五五三的比率。如美國的用意，無非是針對着日本東亞門羅主義而發，備用國際協調的力量，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維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政策。限制軍備，即暗示日本非美之對敵，宜稍斂其凶焰，坦白的，公開的瓜分中國的用意。

華盛頓會議之目的，乃美國借國際的力量來壓迫日本，使日本在遠東不得再橫行無忌，爲所欲爲。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名詞針對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無奈經濟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趨勢，非以五五三艦隊的比例，所能阻阻或威脅其進程。到了一九三八年，聽了四一七日本天羽的聲明，更使美國當局，心中跳

動如雷，坐臥不安，因此對與中國有利政策，贊助與推行，可謂不遺餘力，自表面觀之，誠屬中國國際之至友，拔劍相助，有義俠之風，但究其實際並非以中國的利益爲利益，而以自己的利益爲利益，亦非以中國的利益遭受損害而代抱不平，實恐自己在中國的利益遭遇排斥的危機，借刀殺人，美國外交人才，其殆劊子手中之傑出者歟。

三 中國廣大市場之誘惑與美國遠東政策之演化

現時美國國內經濟的發展情形與華僑時代的美國，迥乎不同，華盛頓時代，國內經濟組織，係一個完全的農業經濟的機構，自給自足，無求於人，洎乎近代，國內工商業，已高度發達，盈必溢，非向外尋覓市場，不足以供挹注，環顧曠及之區域中，或已爲他人捷足先登，或地瘠民貧，即得涉足其間，亦不能滿足其榨取之慾望，祇推中國，幅員遼闊，物產豐富，且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口，無疑的實爲美之理想的殖民地，故其開始經濟侵略中國的時候，即大量的投資，其所抱一貫的政策（一）國內大量的生產，是需要海外供給大量原料的，每年大量過剩的生產，更需要海外市場傾銷的，且商品之輸出與原料之輸入，是要不受別國的阻止的。上述各項條件，中國咸備。故須中國之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始能達到其榨取之目的；（二）美國欲達到產品輸出與原料輸入之通行無阻。那國際航路上萬不能容許別國障礙之存在；（三）要維持中國之大好市場與投資上之優越地位，非有優越海陸空軍，不足以抗拒利益衝突的強敵；（四）中國爲生產落後的國家，投資利潤高，借款利率亦高。按各國利率，最高不過五六厘，但在中國，至少總在一分以上，是穩妥的紅利與高厚的利潤產生地；（五）中國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利用國內遊資，穩得高厚的利潤。因爲上述的種種有利的原因，使塔虎脫總統不得不

道及美國的繁榮基礎已建築在海外市場上，他的命運與海外市場，早已結了不解之緣！其一種弦外之音，殆給予日本以威脅之暗示。日本洞燭美國之隱，乃倡導中日親善論調，隨以中國政府特使王寵惠在日本外務省與廣田外相談話，與土肥原僕僕風塵在中國由北平而南京而香港廣州之行蹤，使美國國務卿費立普（Philip）與英國駐美大使林特賽氏（Ronald Lindsay）大吃一驚，乍舌不下，主張英美共同的借款給中國，以冀挽回頹勢，使中國脫離日本之懷抱而投入英美之肘腋。英國李頓爵士跑到美國去，鼓吹英美聯合對日。結果，英美各懷鬼胎，造成投鼠忌器之局面。其爲各的利益著想，毫無國際互助精神與誠意，于此可見一斑。英美之間，尙且齟齬不入，豈有誠意援助中國耶！總之，中日和戰問題，須自決自擇，萬不可信賴英美太深；自貽伊戚。須知中國爲獨立的國家，和戰自有其決擇之權，萬弗以他國之意志爲依歸，乃可。

自此以後，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地位，日益衰退，而日本則反邁進有取美之經濟地位而代之之趨勢，乃不得不窮思極想，作亡羊補牢計，遂有白銀派之抬頭。當羅斯福總統執政之初，經濟恐慌，蔓延全國，一日之間，全國銀行之倒閉者，竟達千五百家以上，况恐慌產生之因素，並非由於生產之不足，係由於生產之過剩，解決過剩問題，尤須賴乎國外市場之開闢，因之羅氏亦成此項政策之必要，推行更急，以冀當前之經濟恐慌，得以迅速的救濟。其用意蓋欲以提高銀價之手段，使貨物得向用銀國家輸出。中國爲用銀國，人口衆多，購買力強，且生產落後，可供美國過剩的生產消洩的尾閘。揆其初行的宗旨，無非準對中國，圖奪中國人民的鮮血以挽救美國人民的貧血症，其用心之毒辣，昭然若揭。美國採用購銀政策後，不數月間，使中國金融上發生極度之

紊亂，不得不放棄銀本位，改革幣制以圖自存。由此觀之，美之所謂援助中國者，殆何所指而云然哉！

大戰前夕，全世界各國，無不繁榮興盛，及至戰事發生，頓使一帆風順之經濟發展，遭受嚴重打擊。兼之近代工業之特點，係利用科學的管理與器械之製造力，得以大量生產，而使成本減低。然其必要條件，必需有廣大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為之供給原料銷受精製品，而後工業之企圖始得健全發展。自大戰後，原來工業生產甚屬薄弱，每年須大量輸入精製品之美國，一轉而為巨大生產國，反須以其製品輸出。考其所以突飛猛進之原因，係因大戰期間，交戰國之工業皆轉化為軍需工業，故美國得乘機而起，以補其不足。戰後各國工業復員，對與美貨之需要銳減，故美國所受之打擊，亦不亞於英法意國等，故美國固救當前之危急，惟有二途可循：一為嫁禍與他國，二為公共工程之實施。前者如通貨貶值，購金購銀皆屬之。毫無經濟防禦力之中國，遂為此種政策之受禍最深者。後者乃為公共工程，農業救濟，社會保險等皆屬之。上所謂示美國之外交政策與外強中乾之情形，可謂畢露無遺，自顧不暇，侵略無厭，安有餘力為中國仗義執言，拔刀相助乎！華三尺豎子亦知其欺人也。

四 結論

讀了上述種種美國對於遠東外交史實，莫不對她的政策，抱着充分的懷疑，尤其在二三年來中日的戰爭發生後，初期她不但表示絕不相干，且有不利用於中國的傾向，繼而出人意表，與英國共同領導九國公約簽字國舉行北京會議，忽而袖手旁觀，忽而態度非常嚴正，毫釐的利益，亦不肯交臂失之，完全以利己為宗旨，既無所謂國際間的公理，也無所謂國際間的正義，惟機會主義是崇而已。假使美國真誠援助中國的話，何以八一三事變發生後

，美國仍供日本以大量的國防工業所需的一切原料與軍火，豈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一方面獲得許多不義之財，一方面竟如代抱不平，屢向日本抗議，此種互相矛盾之外交政策，實不過美國主義者戴一副假面具，與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唱唱雙黃而已。可憐中日蕪漢，為她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自知，還在進行著互相殘殺的勾當。然彼猶恐中日戰事不能延長，以遂其趁火打劫的私慾，乃供給中國以啼笑皆非，杯水車薪的小額借款，俾增加中華之抗戰能力，待到雙方兩敗俱傷的時候，冀得一些漁翁的利益。美國心目中，早把全世界區分為三大部，一為歐洲，二為美洲，三為遠東。所以在篇首有美國三大傳統政策之敘述。更縮影的講起來，對歐洲以貿易為主，採取經濟合作，保持超然地位，不捲入歐戰漩渦為骨幹的孤立主義；對於美洲，以排外性質的閉關政策，不許歐洲勢力侵入的美洲門羅主義；對於遠東的中國，表面雖藉口為維持中國之獨立自主，其實為揭發「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合作主義。觀於上述美國的三個傳統政策，知道她的趨向，非相和，也非相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義而已。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者寫至此處，不得不大聲疾呼曰：

犯着近視眼病的日本軍閥，其速醒你們的迷夢，須知美之供給大量軍火和軍需原料，無非思加速日本經濟之崩潰，使其自趨滅亡之途，又須知中國有一千餘萬方里的土地，和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且有四千餘年的歷史，今蕞爾三島的日本，竟希冀把中國吞下肚去，豈非緣木而求魚耶！退一萬步着想，縱使能夠暫時吞下去，在不久的將來，亦要患消化不良症，引起內部的潰爛，况英美列強，也決不會任其獨占，等到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一定要聯合起來共籌對付之策。那時日本一定精疲力盡，無法

應付，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意志，惟有受英美等國之宰割而已。日本軍閥們，更須知中日兩國，既同文，又同種，何故自相屠殺，而給予自種人以隔岸觀火之機，苟明乎現在的國際大勢，則宜速停戰息兵，本平等原則，與中華進行和平談判，以謀共存共榮，所謂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抑猶有進者，譬如中國猶如大鯽，日本猶如螳螂，即使螳螂捕得大鯽如中國，豈能忘如黃雀之舞聯在其背後耶！毫不瞻前顧後，徒然一意橫行，將來後患，誠

中日婦女地位的演進研究

中國和日本的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一般的說起來，在幾千年以內，就都是比男子相差太遠，直到現在從事實上說，若要和西洋的婦女比較，也仍然是相形見绌，不能像她們那樣的「揚眉吐氣」，這樣看來，是不是東方女子生來就有重大缺失，所以纔成爲天生的「賤種」呢？我說「不然！不然！」這不得不歸咎於我們東方人的歷史背景了。

中國在上古時代有所謂「母系制度」，如「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話，便是一個顯例，所以神話裏流傳着的「聖人無父，感天而生」。又如「華胥履人跡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龍而生神農，女節感流星而生少昊，女媧感虹光而生顓頊」等語如此類的記載，實不勝一一枚舉。在日本的情形又怎麼樣呢？按日本歷史上所謂的制度，在他們開國第一代的天照大神，即屬於女性，教民耕作養蠶紡織等事，即到了神武時代的何彥何姬，亦並稱男女酋長，景行天皇時，也還有筑紫的女王家卑彌子，以上這許多的例子都可以證明遠古時代中國和日本的女子在當時的社會上都是

有不堪設想之日。

反觀中國，亦須從早覺悟美國的遠東政策，並非助我也，實圖我也，非拔刀相助也，實借刀殺人之陰謀也。不然，何以中國處今日之危機下，而美國尚對日本軍閥予以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乎！此所以中日兩國有識之士，發起中日和平運動，殆有所感而云然乎！（未完）

× × × × × × ×

方服真

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方面，女子不惟在政治經濟上可以和男子並駕齊驅，甚至於軍事方面如神武東征時軍中就有女軍，景行天皇筑紫征伐的時候，也有女軍隨行。這些歷史的例子，都足以證明在古代社會一切崇尚單純，而且夫婦制度尚未發達確定，女子的地位，就是在東方的中日兩國也是很高，絕不像普通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低下卑弱」。

到了母系制度衰滅，父系制度起而代之，女子地位就「一落千丈」，據社會學者說在男子憑恃其蠻橫的臂力，掠奪公有的女子而獨據爲己有的時候，即爲父系制度的開始。梁任公先生曾舉易爻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匪寇婚媾」的幾句話來解釋，所謂掠奪婚姻的狀況，從此以後，女子大概就沒有「重見天日」的一日！如禮教的束縛，離婚僅爲男子的特權，所有婦女均以極端的柔和服從爲生活的標準。戰國時代以後大概已經演進而成爲所謂的「婦道」，秦朝更增重禮法，兩漢復古反動，對褒獎貞節尤不遺餘力，於是中國婦女就被拘束得一點不能動了。返觀我國隣邦日本的婦女又怎麼樣呢？

在奈良朝時代，婦女的地位還不算低下，一夫一婦制形式的確立，大概在文化的改新（紀元二三〇六年）以後，這時中國制度已開始傳入，到了武家時代妻在生子之後，便留守家中，對丈夫絕對服從，因注重血統的原故所以對於片面的貞操也就特別的加以重視，形式上雖是一夫一婦，但正妻一人，必得生男，故無子納妾，亦為必要。妻的地位，這時雖然確立，惟所謂選擇配偶的權利等均付闕如，當時婦女頗富於犧牲的精神，故產生不少「可歌可泣」的勇婦烈女的故事。到德川幕府時代，儒學盛行，舉國上下極端的提倡男性中心主義與戶主專制的封建道德，婦女們就只能專務家事，對家長丈夫絕對服從，以忍苦柔順為美德，這樣的狀態又繼續了好幾百年，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歐美的自由平等的人權思想未輸入以前，婦女的地位，雖不能說完全相同，但大體的情形，確是非常的相似，非常的接近。

二

但「盛衰無常」，「物極必返」，宇宙間的事物都難逃此公例，久受男性愚弄壓迫的婦女，自然也有覺醒解放，獨立自尊的時候。

回溯我國自甲午（光緒二十年）戰後因海陸軍給日本打得一敗塗地，李鴻章忍辱含恨和日本簽訂條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發生很大的動搖，當時發憤圖強的聲浪瀰漫全國，於是方有人想到西洋文化的好處和婦女生活有改變的必要而傾向，到了辛亥革命，婦女從事運動的隨處均有，甚至如婦女從軍的踴躍和參政運動的激烈，都打破幾千年來歷史上的記錄！誰料袁世凱以腐敗官僚出而執政，提倡禮教，處處摧殘女性，於是一時甚囂塵上的新氣象，漸漸就「匿迹銷聲」。

民國五年一月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雜誌上曾發表一篇「一九

一六年」，他正式主張青年女子要從被征服的地位起來居於征服地位，他又正式倡言儒者三綱說的應當打破，於是真正的女性革命的燎原運動，纔有了點星星之火，後來新青年雜誌上就接二連三的討論女子問題，火勢越燒越烈，直到民國八年發生五四運動，彷彿像開花彈一樣，轟的一聲炸遍了全國，婦女解放運動，就在這當兒傳遍各地，從那時起經過了多少的研究，多少的實驗，加以生活的壓迫，日盛一日，婦女們再也不能養尊處優的度其寄生生活，這樣就不能不到社會上去尋求相當的職業，於是社會上的風氣：凡是眼光稍遠的人，或是家庭比較富裕一點的，都從速的讓他們的子女去受相當的教育，以為將來獨立謀生的準備，這些事實，都是促成中國婦女得到解放的重要因素。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並沒有自己辦的女子高等學校，教會所辦的也只有兩三處，（如北平協和女大，南京的金陵女大，福州的華南學校等），五四運動以後各公私立大學都風起雲湧的大開女禁，於是女子在教育上已得享受同等的待遇，就是邊僻省份的中學卒業的女子，也因受到新思潮的洗禮而都願意冒着危險，跋涉山川負笈平瀝各大學，以謀一技之長，熱烈的情形，自可想見，教育機會的均等，算是達到目的了。

至今在法律上所享受的權利，向來男女就是不平等的，如舊日的民律草案第九條即規定「達於成年兼有識別力者有行為能力，但妻子不在此限」；又同律第六第七條「不屬於日常家事之行為，須經夫允許」；從這些條文看來，妻在法律上是不能獨立的，至於所謂財產承繼權，女子更是沒有希望。到了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為新民法親屬編施行有效的時期，從此婦女也都獲得了「遺產承繼權」和「婚姻自主權」，於是中國女子在法律上又已獲得同等的待遇。

在日本方面，從明治維新（一八六七年）以後，日本因為積極吸收西洋文化的緣故，於是就受歐風美雨的薰陶，把許多傳統的舊習慣舊道德都通通打破，所謂歐化主義頗風靡一時，自由民權的思想。男女平權的呼聲都激動了一切婦女界的思想情感，尤其是如土居光華氏的譯本「近世女大學」最值得注意，氏誠不愧為當時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氏將舊日「女大學」一書內二十項裏的十一項，一一加以指責批評，氏並闡明穆勒的主張，認為婦女亦屬國民，故應尊重其戀愛及感情，婦人與兒童之關係並不應如舊日那樣的疏忽漠視，離婚與再嫁亦均任其自由，借此書出版後的影響，還不大。

繼之而起者，有湯目補高氏所著的「歐美的女權」一書將海外的女權運動分別介紹其國人，接着有深間內基氏將穆勒「婦女服從論」全部翻譯刊行，福澤諭吉氏在時事新報繼續發表「日本婦女論」「男女交際論」等；同時井上直女史發表「日本婦女三論」，這本書在當時為婦女最初女權論的作品，還有辰己小次郎的「西洋日本女權沿革史」，依田孝氏的「一夫一婦論」，中山整爾氏的「日本將來的婦女」，以上這些書都是極力提倡女權，尤以福澤諭吉的日本婦女論等書即在今日仍不夫其為名著，可以與穆勒的「婦女服從論」媲美，故影響極大，一般婦女也漸漸認識自己的地位，非如過去僅為男子之奴隸而已，一方面除了覺悟到自身雖為家庭的一份子，但同時也還是國家社會的一員。

明治五年日本政府又派遣津田海子女史等五名留學美國，當時的昭憲皇太后還頒賜獎勵的諭旨，其原文如下「諸生此次抱出洋留學之志，實堪嘉善，深望將來學成歸國，為歸女之模範，諸生其各日夜奮勵攻讀，俾不負所望。」可見日本朝野上下對女子教育注意的一斑。而上述的福澤諭吉氏在當時對婦女運動的熱忱

尤可欽佩，依他的主張，舊時儒教思想支配下的教育，決不足以解決現代所發生的婦女問題，氏認為日本婦女今日地位的低下，實由於社會歷來的壓制，故根據過去的研究，今後實應給與婦女以自由戀愛的權利，同時並提倡性的解放，使其經濟能夠獨立，結婚的法律手續及關於財產方面的權利都能夠平等，按一般的道理而論，人生共有快樂只許一方面的人專門享受，實在說不過去，故應該不分男女，彼此都得共同享受。

在事實上說，最初被新思潮激盪而要求參加國會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岸田俊子及影山英子二氏，他們都是主張「男女平權」為自由與民權而奮鬥的人物，岸田俊子在她年青的時候曾在皇宮裏教過書，又還在兒童時代「才女」的名就已震動了全國，她在各地開會演說，因宣傳攻擊政府，打倒藩閥等事而被逮捕多次，這樣屢仆屢起。影響自然不小，而同時也培養了不少有用的婦女。影山英子在十七歲時就加入政治活動，二十一歲時被捕入獄，釋放後又從事社會主義的活動，鞠躬盡瘁，至死方休。

日本婦女經過這許多大風大浪的激盪，到了明治十八年以後，因修改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及澈底歐化起見，於是所謂「鹿鳴館時代」便即出現，當時的文部大臣（即教育部部長）森有禮氏會令女子學校須以外國語為必修科，並增設洋樂舞蹈等等的課程，女學生改穿洋服，學校寄宿舍以洋式建築為原則，男女間的交際，並皆在提倡之列。

此外還有人以男女欲求平權，當自教育機會均等起始，所以當時華族（即貴族）女學校長下田歌子和中川幸子等都非常熱心的要求帝國大學許可女子入學選課。終因種種困難，未能「如願以償」，不過女學校在當時實有特別驚人的進展。到了明治二十年那個有名的保安條例發表之後，一切極端嚴重的運動就都被取

已入正軌。新婦女協會原爲青踏社的盟主平塚明子氏所主辦，由市川房枝和奧女士等參加贊助，該會在大正九年成立於東京，其宗旨爲使婦女界能夠相互聯絡，以求增進福利，獲得權益，其組織有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衣食住諸部，實爲一種社會的運動，該會的工作成績頗爲佳良，如在神戶，大阪，名古屋，靜岡等處都分設支部，又在公共場所舉行坐談演說的集會，辦理女子政治法律講習所，請願國會修改治安警察法及對花柳病男子結婚加以限制，實行男女平等普通選舉，發行女性同盟雜誌等，

惟後以內部意見紛歧，自行解散，良可惋惜，但新婦女協會在當時社會上給與婦女界的影響，確實不小。其餘如奧村五百子氏在明治三十八年就創設愛國婦人會，其目的在爲國家在非常時之際，婦人亦須盡忠報國，至於平時則爲社會負擔種種義務。其實効直到現在，還是「有目共觀」。大正十年名流婦人們又組織平和協會，基督教婦女矯風會等，宗旨都不外是在提高男女道德標準，提倡禁酒和廢止娼妓。同年婦女矯風會會員幹特別極子參加日內瓦第八次國際婦女政權同盟大會受大會囑託，回國後即設立日本婦女政權協會，自是該會與國際婦女團體聯絡，儼然成一支部，東京大地震時，該會爲救護孤兒求各婦女團體援助，結果糾合四十餘團體成立東京聯合婦女會，從事政治勞働，教育，社會，各方面的活動。大正十三年，因男子普通選舉法案，有列入於五十屆議會的議事日程的形勢，婦女界大爲興奮，乃於十二月由日本婦女參政權協會與東京聯合婦女會相互提攜在東京丸之內保險會創立一新團體，名婦女參政權獲得期成同盟會，包含從來存在的既成團體，並另徵求個人會員，這樣就成爲最有力之一大組織。其議會運動部，提出改正治安警察法與要求婦女參政權及公民權的兩個建議案，經奔走疏通的結果，於十四年三月十日送交於

第五十次議會，因此日本婦女稱此日爲「婦女解放日」，這次請願的成績頗爲良好，如治安警察法修正案下議院都一致可決，而對於女子參政權，亦博得形式上的贊成，後雖經貴族院的否決，然在日本婦女運動史上，仍不失爲光榮的一頁。

接着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農民勞動黨開始組織，無產黨相繼簇出，勞動婦人及信仰社會主義的婦女對於政治實已發生深厚的興趣，惟她們的主張忽然大變。從此不和男子挑戰，而要與勞動階級的男子攜手，以此爲改造婦女的工資，保護母性和家族制度等的手段。昭和二年，關東婦人同盟，（爲日本勞動農民黨所主持），勞動婦人聯盟，（爲社會民衆黨所主持），全國婦人同盟，（爲日本勞動黨所主持），社會婦人同盟，（爲社會民衆黨所主持）等會，先後成立。其時所謂社會主義的評論家都以執筆批評無政府主義者爲事，又有高華逸枝氏出來主張婦人的非政黨同盟，於是婦女運動的理論的鬥爭時代就算開始。昭和三年六月在總選舉的時候，政友會得絕對多數的議席，一時婦人公民權問題亦頗被重視，同時各地方婦女參政運動也很熱烈，到了昭和五年一月，六大都市婦女公民權付與案，內務省（內政部）已準備發表，而同年四月廿七日東京又舉行第一回全日本婦女選舉大會，出席人數有五百餘名之多；而婦人公民權案，衆議院雖予以可決，惟政府在同年七月發表關於公民權案的內容，仍然聲明反對的態度，自此次失敗之後，婦女參政運動竟爲之不振。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變突起，國內的法西斯勢力大爲抬頭，婦女運動也別開一生面；同年十二月在所謂無產婦人同盟指導下的婚選獲得同盟，婦人參政同盟，婦人參政權協會等四團體復再加改組，於是所謂婚選團體聯合委員會也就宣告成立，仍努力於公民權的取得，但經過多次的打擊，卒未能如願以償。昭和八年第三次婦女選

舉大會，其有力的份子曾提倡市政淨化的運動，當由六婦人團體協同組織「東京婦女市政淨化聯盟」，在東京新市長牛塚氏接任伊始，就直接提出關於東京市塵芥問題的意見書，此事與居住東京的主婦實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又可以激起一般婦女對於政治的興趣，此婦人公民權要求的妥當性也被顯明出來，故一向對此事最冷淡不過的也聞風興起，結果在一年之內，日本婦女對於地方自治的事件都極爲關心，而政治的重要性質，亦漸漸爲大多數的婦女所認識。

其在教育方面，日本因實行義務教育的結果，凡已達學齡的兒童即指六歲至十二歲而言，不論男女，差不多都是被強迫入學的，而且男女學生的程度也完全一樣，到了升入中學男女所受的教育就大異其趣，女學校則注重家政等學科。就一般的情形說來，日本女子往往在中學卒業之後，就算告一結束，其繼續升學的爲數比較很少。昭和四年。明治大學纔新設女子部，六年東京工業大學開始招收女生，九年即有第一次畢業的女生織原貞代，其學業成績已能駕男子而上之，故獲得女工學士的榮冠。昭和九年東北帝國大學亦許可女子入學，授與女法學士。又婦人授與博士學位者，以昭和二年五月理學博士保井子女史爲最早，至昭和九年已達數十人之多，可見日本女子教育程度的提高與其猛進的情形一斑。

三

以上兩節已將中日兩國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詳爲比較研究，但歸納起來，我們可得到一個相同的結論，即中日兩國的婦女都

曾經歷過一番「百折不撓」的奮鬥，始有現在雖還不能令人滿意而已較從前大有「不可同日而語」的開明氣象；在中國方面因有許多「先知先覺」的學者與政治家的鼓吹與援助，所以一帆風順的能在教育，社會，政治，經濟，和法律上都已取得平等的待遇；在日本方面，熱心贊助的人固然不少，但保守頑固者流也「大有人在」，所以直到現在，雖說女子在社會上的實力很是廣大，但仍未能達到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換句話說。即女子猶不能發展到「超良妻賢母」的階段。

返觀吾國，固然超羣出衆的婦女並非像鳳毛麟角那樣的少見，但一般的大衆仍然是「無知無識」，庸庸碌碌，做個良妻賢母的資格尚且不足，尤其居住於大都市的所謂時髦婦女，終日惟求享樂舒服，對於一己所應盡的責任既不知道，也不肯工作，彷彿成了「廢物」一樣，如此雖然獲得教育機會的均等與承繼遺產及使用或管理財產的權利，但因無健全的教育以培養其智力和能力，真是一樁危險到了萬分的事，所以中國婦女現在最急不容緩的事，即在「腳踏實地」的補救自己本身的種種缺點；而在日本婦女方面，就一般的情形觀察，其實際能力平均都比中國婦女來得高強，惟在教育，社會，政治，經濟，法律上的地位，仍不免比男子低下，故此後並須再接再厲。將來中日兩國的女同胞，若能達到完全平等的地位，那麼在東亞各國中自然要放一異彩了。

中日教育的比較（續）

王冶平

前一期大要：前一期的題目是論日本教育與日本精神。日本精神的內容是神道、儒教、佛敎三種精神混合而成的。其精神表現於外者有神道、武士道、古道、心學、國教、國民道德。此外因爲他受了歐美自由主義的思想，所以功利主義非常濃厚，而造成現在日本精神中的矛盾思想。

三 中國教育與儒家思想

中國教育，在三代時即具規模。據史冊所載，唐虞之際，便已經有了萌芽，尙書載：「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五教便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後日所說的「五倫」。就學校而論，虞舜之時，已有「上庠」與「下庠」，前者爲大學，後者爲小學。到了夏商兩代，仍沿用這種制度。孟子說：「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周朝雖稱中國上古文明曙光時期，文物制度，至此大備，故教育亦頗發達。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輩出，一時教育稱盛。

自孔孟出，以禮樂射御書數教弟子，以仁義禮智信爲人生之大道，於是儒家學說成。中國二千餘年來的教育思想，亦遂以儒家學說爲依歸。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支配我國社會二千多年，也正因爲他的思想是合於中國社會發展與需要。秦始皇雖一度焚詩書坑儒生，但他所行的政策還是以儒家思想爲其準則。夏會佑在他所著的中國歷史上說：「李斯之學，出於荀子，始皇父子，雅信韓非，韓非之學，亦出於荀。」荀子爲與孟子同尊孔子之學的一位健將，亦是儒家的一位導師；李斯爲秦始皇的廷尉，秦時一切政令

大多出於李氏之手，故秦代的政策還是根據儒家思想。夏會佑氏又在嚴譯社會通詮一書的序中說：「夫李斯學帝王之術於荀子，既知六藝之歸，相其君以王於天下，其爲術皆昔所聞之於荀子者也。」這亦可以證明李斯相秦之術皆出於荀子，而歸宿於儒家之六藝。魏晉以後，佛老思想非常盛行，而教育思想亦不能奪儒家之席。晉書載：「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何儒林。」近數十年來，我國社會生活變化甚劇，教育思想曾有一度的衝動轉變，可是儒家思想的領導地位仍然非常鞏固。孫中山先生集中國教育思想之大成，將以融合於三民主義之中。民族主義中的恢復固河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實等於儒家的中和思想。此外關於民權民生主義與儒家思想息息相關的地方很多，當於下節說明，這里不多說。

儒家思想既然影響於中國教育是這樣的重大，進一步我們來研究儒家思想的內容如何？要研究儒家思想的內容者不得不把各儒家的學說述其梗概。本文非是一部中國儒家思想史，所以只能擇其大要而言。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次爲孟子和荀子，其後歷代帝王，無不尊重儒學，因此儒學大師歷代都有。本文也只能從儒學思想中的要點綜合聲述，不一一介紹。茲先把孔孟荀三人教育思想分論如左：

（一）孔子 孔子本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到了晚年，始退而從事訓述的事業。他刪詩書，訂禮樂，傳易，作春秋，叫做六

論，又稱六經。孔子即以此六藝教授弟子。又論語二十篇，係孔門弟子所記孔子及孔門諸子的談話議論。這是一部很重要的書，孔子的教育思想，大多表示在這一部書中。孔子的一生事業，全在修己和治人二者，而就攝這二大事業的，就是一貫之道，而以「中庸」和「仁」爲骨幹，如論語孔子對子貢道：「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論語又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論中庸之道，發見在中庸一篇。如中庸引孔子語：「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說：「雍也，中庸之爲德也，其至已乎，民鮮久矣。」所謂中庸，論語的解釋最爲清楚。論語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爲庸，」故道德之最正當者，謂之中庸。至於「仁」，尤爲孔子的中心思想。孔子很注重人格教育。他所謂的「名」，便是人格的意思。他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一）而對於「仁」的內容，亦包含頗廣。論語中言仁處甚多。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二）又云：「剛毅木訥近仁。」（三）這里的仁，是指人性的真情而言。巧言令色矯飾以媚悅人，不是真性情的流露，故「鮮矣仁」。剛毅木訥是質樸的真性情，故「近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四）這仁又是指同情心而言。「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五）這仁又是指禮而言。「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六）這又是指忠而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七）這是指恕而言。卒予以三年之喪爲期已久，

孔子謂爲不仁，見仁可以包括孝。孔子謂令尹子文及陳文子：「未知焉得仁？」（八）是仁可包括智。「仁者必有勇。」（九）是仁可包括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敏，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十）是仁可以包括信五等。總之，孔子所謂仁，是全德的意思。這種人格教育的仁，不僅支配了中國二十多年的教育思想，就是現在還是普遍的爲一般學校教育所應用。現在教育部所頒的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國訓，實在還是仁的分化。

（二）孟子 孟子爲儒家之唯一承繼者，他據守孔子的學問而闡明之辯說之，如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他自己也說：「仍所願則學孔子也。」（十一）但是他的思想有其最大的特點，便是主張性善論。他所謂王道，仁政，都是從性善論而發。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十二）所謂不忍人之政，便是王政。所以中國政治主張和平，主張王道，實是孔孟以後二千多年的傳統思想。中國人之待人接物之所以能推己及人，也是受這思想的影響。我們再看他下面一段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十三）孟子所謂性善，只謂人皆有仁義禮智四「端」。他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十四）又說：「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性善論的原理，不僅應用於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即經濟方面亦以此為出發點。他主張「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而達到「在徒不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的社會，能做到這種「養生送死無憾」的結果，亦就是王道之始。

(三) 荀子 荀子與孟子同為尊孔之道兩大後起之儒家大師，但其思想多與孟子相反處，尤以論性，可說與孟子完全相反。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十一)又曰：「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十七)

荀子既主張人性惡，所以他對於人格之養成，十分重視。他的訓練人格，最重禮義，這一點又與孔孟大同小異。他認為除禮義以外，其餘的事與學問都沒有大關係。因為他注重禮義，所以他重視於內心之修養。他在儒效篇上說：「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精德於身而處之於遠道。」又在勸學篇上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于己，則道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生之遺言，不知學問之

大也。」又在修身篇上說：「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遺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所謂「內省」「修其內」「參省于己」，都是關於內心修養的話，可見荀子論學，是如何重視人格的修養呵！

荀子論的教育科目，也是六藝，其教材除採用詩書禮樂外，又加上春秋。他在勸學篇上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其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稍與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古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乎禮而止矣，夫是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從這一段，可以看到他對於「誦經」「讀禮」的推崇，對於詩書禮樂春秋的深刻認識。誠不愧是一位繼孔子而後的儒家大師。

我們研究了孔孟荀三大儒家思想以後，可以知道儒家思想的一個輪廓。現在為明瞭起見，再把儒家的教育思想，擷其要點如下：

第一，儒家都是以人文主義為本體，注重於身心的修養。如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都是屬於修養身心的方面的。

第二，儒家的思想，完全建築在宗法社會的基礎上，而宗法社會又以禮教及封建制度為骨幹。所以他注重「正名分」，「別上下」，「定貴賤」。

第三，儒家論教育目的在終於至善，亦即是達到「仁」的境界

地。不論從個人的立身處世也好，治國平天下也好，都以「仁」爲止境；如孝悌，忠恕，廉恥，王道，都是屬於「仁」的範圍以內。

第四，儒家講治人或教育的方法，都以感化爲主，所謂「以德服人」。孔子論禮治，孟子主張仁的政，荀子所謂的禮法，都是以禮德爲前提。論語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中國歷代儒家思想，其主體大概不出以上幾點。如漢朝之董仲舒，他不僅主張以仁義禮樂爲教育之工具，並且主張絕滅異學，抑黜百家，以統一國民思想。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於是儒教獨尊之局遂定，教育的領域遂亦被經學獨佔。并定小學生專習小學，中學生專修孝經論語，大學生專修六經。（十八）這亦都是聽了董仲舒的話而施行的教令，到隋唐時代，王通爲隋代大儒，他主張德禮教育，主張以仁義爲本之教育。他說：「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十九）自魏晉以至唐代，佛教盛行，一時知識份子頗多信者，儒家學說，幾乎被人摒棄。及韓愈出，竭力提倡儒學，排斥佛老，於是儒家思想乃中興。他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二十）非先王之教不敢道，他在原道上說：「夫所謂先王之教育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賢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數易行也。」「世人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實何止文」，其「道」亦如此。

其他詩聖杜甫，他的詩中也充滿着儒教思想。如奉贈韋左丞文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又如述古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是純粹儒家之言，嚴格地排斥法家的。

唐代佛教盛行，雖然有韓愈起而排斥，但終不能遏止佛教思想之流傳。故自唐以後，宋元明三代儒家思想，均融合有佛家及道家學說，所以後人稱宋明的儒家謂道學家，亦即所謂新儒學家。新儒學家以宋代人才爲最茂盛，周（敦頤）程（顥，頤兄弟）朱（熹）張（橫渠）四大派，各皆桃李門牆，弟子盈千，洵極一代之盛。元朝爲時很暫，加以漢族爲異族所統制，所以即新儒學亦無多大發揚。明朝爲漢人執政，新儒學又興起。王陽明爲一代之大宗，他是承繼宋儒陸象山之後，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說，後人別稱其學爲「王學」。

關於宋元明三代儒家思想，這里因篇幅所限，不克一一詳述，茲歸納各家思想插其要點如下：

第一，各家論教育目的，都主張變化氣質，養成「心如明鏡」的善人，其最終目的在達到聖賢的境地。

第二，各家論教育方法，都主張採用大學的「致知窮理」「正心誠意」，中庸的「中和」「誠明」「慎獨」以主一，敬靜爲其手段。

第三，三代中「知行」學說大盛，諸儒對於知與行的關係都有不同的說明。朱子主張「先知後行」，陳北溪主張「知行並進」，王陽明從唯心的立場主張「知行合一」。但大家有一共同點，即是注重身體力行。因之，力行哲學在理學家中最是最新的卓見。

第四，各家對於孔孟所主張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多有進步

的具體的新議論，如王安石的人格感化教育，齊一道德論，都是很有力的。

第五，對於孔子的「仁」說，更努力闡揚，如程頤的論仁，分成廣義的與狹義的兩方面。朱子論仁不但認爲是諸德之首，諸德亦必須包括於仁內。（以上可參閱任時先著中國教育思想史上卷一五六頁至二四〇頁）

清代學術思想，簡言之，是反對宋明的理學，而以治經考據爲職志的。梁任公先生說：「清代思想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即以「復古」爲其職志也者。」（二十一）首先反對理學最激烈的要算顧亭林，他根本否認理學的存在，他只認爲「經學即理學」。他主張「通經致用」「博文知恥」。他說：「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於此，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二十二）因爲他主張「窮經致用」，而行事又須有高尚的人格，他認爲要樹立高尚的人格，莫過於「知恥」。他提出「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他說：「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爲尤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無恥，謂之國恥。」（二十三）

有清一代的儒家思想，雖然都是主張「通經知用」，但是因爲時代的轉變，各儒家的思想也就各異。梁任公先生將清代學術思想分成啓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在蛻分時期，也便是西洋思想的傳入時期。

近代西洋思想傳入中國，可說和傳入日本是同一時期。在日本文學思想的影響，而發生明治維新，於是踏上了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道路。在中國受了西洋思想的影響以後，當然也發生

了許多反應。可是因爲清政府的腐敗，大部分士大夫的守舊，帝國主義者接一連二的侵略與壓迫，以致不能像日本那樣徹底的改革內政，樹立一個現代國家。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政體改變，一切政治法律都爲之一變，對於外來思想，遂自由地盡量吸收。所謂近代教育，也就是從民國成立以後才開始孕育。二千多年來整個支配中國教育的儒家思想，至此才「退避賢路」。雖然，因爲儒家思想支配中國社會的時期，實在太悠久，所以現代中國教育思想中的細胞，仍然還有多量的儒家思想在着。這是研究中國教育者不可忽略的。

（註）（一）論語子路（二）同上學而（三）同上子路（四）同上顏淵（五）同上（六）同上雅也（七）同上答子貢問（八）同上公治長（九）同上憲問（十）同上陽貨（十一）公孫丑上（十二）同上（十三）梁憲王上（十四）告子上（十五）公孫丑上（十六）荀子卷十七頁（十七）同上（十八）觀堂集卷四漢魏博士攷（十九）王通中說禮手稿（二十）韓愈答李翊書（二十一）梁著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三）日知錄

四 中國新教育思想的演變

中國新教育思想的產生，當然有其社會背景。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舊教育，只配適用在宗法社會和封建制度中。可是自從鴉片戰爭中國門戶被打開以後，西洋社會主義的思想，產業革命的因索，也趁着洋槍大砲衝入到中國來。因而漸漸促成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等到一旦政治權轉移到革命黨人手裏，不消說，一切舊制度都要被揚棄，而新思想亦得能自由地發揚出來。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亦是不能例外。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第一任教育總長。當時他曾發表一重要意見書，題目「新教育意見」。其中提出目標五項：即：一、軍國民教育，二、實利主義教育，三、公民道德教育，四、世界觀教育，

五，美感教育。不久，教育部召集臨時教育會議，徵求全國教育者的意見，結果遂於該年九月由教育部本着蔡氏上述的主張，頒布了以下的教育宗旨：

「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我們一察上項教育宗旨的產生，很可以明白當時的社會背景。當時因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已經侵入到中國，洋槍大砲已擊死許多東亞病夫。所以民國肇興，就非得先實施實利教育以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實施軍國民教育以抵抗西洋的洋槍大砲。至於美感教育，實為蔡元培先生所獨倡。蔡氏於清末在德國留學，深受德國美育思想的薰染，相信美感教育為實現世界主義教育的唯一方法。因此要明瞭美感教育，必先知道蔡氏的世界觀教育。他對於世界觀教育，曾有下面一段話：

「提斯實體觀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極方面，使對於現象世界，無厭棄而亦無執着；積極方面，使對於實體世界，非常渴慕而漸近於領悟，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育程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

然則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麗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此為康德所創造，而嗣後哲學家未有反對之者也。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美術則以此等現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既脫離一切現象，相對之感情，而為渾然之美感，則即所謂與造物相友，而已接觸

於實體世界之觀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現實世界而引以到達於實體世界之觀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一）

蔡氏既認定美感教育是人生生命之一重要部分，故提倡甚力，他認為美感教育可以陶冶感情，養成高尚純潔的習慣，消滅自私自利的個人思想，後來先進的學校，就把美育列入訓練學生目標之一，與智德體三育並重，其對於現代教育上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

至民國四年，時當袁世凱為大總統，彼乃重申民國元年所定教育宗旨，頒定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奢爭，戒躁進七項為教育宗旨。惟自八月籌安會成立，舉國擾擾，於是對於袁氏所頒定之教育宗旨，遂視為具文。從此以後至民國十七年，中國遂無一正式的教育宗旨。僅於國民十一年，公佈新學制系統改革令中，定有七項標準，即：（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二）發展平民教育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於普及，（七）多留各地方紳縮餘地。其中以發展平民教育精神一項為最有意義。蓋所謂平民教育，實受自西洋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思想而來。民國八年，美國教育家杜威（Dewey）博士來華演講平民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因而此種思想盛極一時。而胡適之博士更根據其教育哲學竭力加以推演。自此以後，平民主義教育思想影響於我國者至大。上項「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一標準，亦即此思想所收的效果。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力量，暗中實有助長中國革命力量的擴大。因為這種思想是反封建的，是反階層的，是科學的，是大衆的，這正與中國革命的目的相符合。所以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凡是教育發達的地方，影響的力量也最大。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一切政治均以三民主義爲依歸，教育自然也不能例外。十七年大專院召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於南京，即提出三民主義教育一名詞詳加討論，並通過實施原則十五條：（一）發揚民族精神。（二）提高國民道德。（三）注重國民體力的鍛鍊。（四）提倡科學精神，推廣科學的應用。（五）勵行普及教育。（六）男子教育機會均等。（七）注重滿蒙苗回藏苗等教育的發展。（八）注重華僑教育的發展。（九）推廣職業教育，（十）注重農業教育。（十一）闡明自由界限，養成服從紀律的習慣。（十二）灌輸政治知識。（十三）培養組織能力，養成團體協作的精神。（十四）注重生產合作消費及其他的訓練。（十五）提倡人生正軌的生活（衛生的，經濟的，秩序的，優美的）培養努力生產的訓練。（二）國民政府根據以上原則，遂於同年九月正式通過全國教育宗旨如下：

「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建國，應以三民主義施教，從前所頒布之教育宗旨，自不適用，今特仰遵，總理遺教，根據教育原理，訂定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如左：

一、恢復民族精神，發揚固有文化，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普及科學知識，培養藝術興趣，以實現民族主義。二、灌輸政治知識，養成運用四權之能力，闡明自由界限，養成服從法律之習慣，宣傳平等精義，增進服務社會之道德。訓練組織能力，增進團體協作之精神，以實現民權主義。三、養成勞動習慣，增高生產能力，推廣科學之應用，提倡經濟利益之調和，以實現民生主義。四、提倡國際正義，涵養人類同情，期由民族自決，進於世界大同。」

十八年三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行議定教育宗旨，並經教育部通令全國各級教育機關，切實遵行。其宗旨

如下：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於大同。」

中國教育宗旨，至此始歸統一。我們從三民主義的立場上來看，這種教育宗旨實在是宏大而實際。詢足與日本明治教育勅語相媲美。所不同者，兩國因國體不同，目標亦稍異。至於提高道德，增進智能，爲國家服務，則具同一態度。不幸近十年來，中日兩國，情感日惡。「九一八」以後，雙方更趨於極端。於是在中國有所謂「國難教育」，「非常時期教育」。「救國教育」等產生。此等教育之一目標，即爲復興民族。其實施方案，不外注重體格訓練，改進精神訓練，增加國防有關學科及技能之研習。如廖世承所擬的非常時期教育方案，在意義方面有下列四點。

（一）灌輸軍事常識。（二）激發愛國熱忱。（三）訓練國防技能。（四）培養集團意識。（三）訓練國防技

「九一八」以後的中國教育，確是針對着日本的侵略政策而實施的。這樣地各走極端，所以釀成這次中日戰爭的空前大慘劇。使東亞的兩大民族互相殘殺，這實在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情。在前一節（見本刊第二期）敘述日本教育與日本精神以後，作者曾提出一些意見，謂日本人民思想在唯心唯物兩方面矛盾着，希望日本教育家要放開眼界，爲世界求和平，爲人類謀幸福。現在，敘述中國教育思想以後，作者亦提出以上兩句話——爲世界求和平，爲人類謀幸福——奉告我中國教育家們。尤其在這次戰爭的教訓中，告訴我們中日兩國是共依則存，互殘則傷。何況中日兩國教育精神，有一共同點在。此共同點爲何？即儒家思想是也。作者在前面曾經提及：現代中國教育思想中的細胞，仍然還有多

量的儒家思想存在着。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中所講的恢復固有道
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實在就是儒家的中和思想。我們不能
否認在過去實施三民主義教育中有許多錯誤的地方，但我們對於
思想的本身確毫無疑慮。在日本方面也得承認三民主義是中國復
興的一個指南針而加以諒解，同樣，中國對於日本精神也得加以
認識。今後兩國應秉着「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精神

中華民族反英運動史的回顧

陳仁傑

每一次民衆運動高潮的澎湃，必有他社會的內在的原因，爲
這一民衆運動發動的支柱。衡諸歷史，無分中外古今，如同一般
。即以我國過去發生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而論，亦無例外
。有社會的內在的原因；換句話說，有歷史的必然性存在。乃一
般淺見者流，認爲反英運動，出於某黨某派的指使；持這種論調
的人，非有意曲解，蒙蔽大衆，也就是隔靴搔癢，不切實際了。
筆者不揣愚魯，爲這一運動——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作
一史的追溯，指出這一運動的內在原因，與必然性，正確性，諒
不是浪費筆墨的舉動吧！

中國爲世界上有數的大國，有悠久的文化；幅員的廣袤，物
產的豐饒，人口的衆多，氣候的適宜，都是得天獨厚。可是自然
環境的優良，並沒有培植她成頭等的強國。到現在陷於半殖民地
的狀態，岌岌有亡國之危。所以有這樣的危機，有二個原因；其
一是內在的社會經濟的落伍；其二是外來民族的侵略。其實也是
互爲因果的，由於社會經濟的落伍，而誘導着外來民族的侵略；

，加緊合作。所謂要建設東亞新秩序；也得須先從建設兩國國民
心理着手。否則，如各走極端，即使現在勉強合作，還是貌合
神離，決非東亞和平的百年大計。這是希望兩國當局深思熟慮
的。

(註) (一) 蔡元培民言行錄第一冊 (二) 全國教育會議報告 (三) 教育雜誌二十六卷
二號

由於外來民族的侵略，而限制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國成爲被
有高級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尾閘，而無法解脫半殖民地經濟的不自
由不平等的弱小地位。

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秦漢以迄十九世紀的清葉，其間雖
經過若干政治的經濟的演變，但政治上的專利主義，與經濟上亞
西亞生產方式，限制着社會經濟的向前邁進。每一次朝代的更換
，開始是導源於農村經濟的崩潰，與農民暴動的爆發，以求上層
機構政治組織的改革。但新興的執政者秉政以後，給予革命羣衆
的（主要的革命羣衆便是農民），不是社會經濟的改造，而是施
政政策的某一時期的優惠。（如歷代帝王的重農抑商詔令）專制
主義政治的政策，都出於帝皇的詔令，毫無持久性質，當然無法
阻止政治上官僚主義特權階級的跋扈，與經濟上商業資本主義的
潛生暗滋。積若干年後，使社會的主要生產，農村經濟崩潰，貧
困農民無法生活，於是再爆發第二次的政治變革，但第二次的結
果比第一次並沒有什麼進步。這樣週而復始，「治久必亂，亂久
必治」的歷史循環，形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性。這停滯性

到十九世紀清代還是不改故態？社會經濟依然停滯在農村自給自給的手工業時代。

可是歐洲的社會經濟，在十八世紀的末紀資本主義已經發生，至十九世紀，正是突飛猛進的全盛時代，尤其是資本主義發源祖國，大英帝國伯列顛，正挾其龐大的機器生產的巨額商品，東進找尋目的地。那時英國已略得印度，極目東顧，老大的中國，人口衆多，物資豐饒，正是她推廣商品的極好市場與原料吸收地。於是毫不躊躇，得有機會，而向老大的中國進攻。鴉片戰爭一役，終於把閉關自守的中國打得門戶洞開，而中國的社會經濟，也自農村經濟的自給自足的手工業方式，每况愈下，更深一層的墮入半殖民地經濟陷阱而不克自拔，推本窮源，都因鴉片戰爭的一役而來。

二

一部世界的歷史，每一頁煊染着鬪爭的痕跡，不是和平的經濟戰爭，便是刀兵相接的武裝戰爭。資本主義興起後的世界舞臺，每一次武裝衝突的刀兵戰，可說是都起因於和平的經濟戰不得解決而來。並且歷史有一極其正確的法則，高級的生產國，必能戰勝低級的生產國，以此衡量，百不失一。英國的進攻中國，動機自然也起因於覬覦經濟利益。人口衆多，可以銷納帝國的大量商品；物產富饒，可以吸收廉價原料。所以她用盡心機，最後乘間蹈隙，不惜一戰，來達到她的目的。以生產落後的農業國，與生產進步的工業國交接，結果自然不出於失敗之途。

英人來中土銷售商品，遠在明崇禎八年——一六三七年——當時有英吉利商人威代爾率艦隊至澳門求通商，被葡萄牙人所阻，乃以武力衝入虎門，至廣州盡售其貨而去，所以國人對於英商的印象，開始就很惡劣。一六六四年（清康熙三年），一六七四

年（康熙十三年），英商船再至澳門，中國人民因對之有反感，無法銷售而去。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政府允商人之請，乃派遣馬甘尼大使，要求中國政府締約通商，為清政府拒絕而去。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又派亞墨爾斯為大使，向中政府重申前請，清廷要他跪拜，亞不充，斥其無禮而逐出國境。後來東印度公司成立，英人在遠東確立商務根據地，乃有組織的向中國圖謀發展。先至廣東，地方官雖予束縛。但畢竟允彼通商，在前英商在廣東的商業，都為東印度公司所壟斷，一八三三年，英政府廢止該公司專利。東印度公司乃不惜喪心害理，以鴉片烟土，大量輸入中國，以彌補商業上的不足。其後粵督威靈雅片流毒越來越是厲害，中國因買鴉片的現銀流出，一年多一年，遂嚴行禁止。英國那瑟對華通商總監督，以保護商人為辭，令軍艦二艘入虎門，為虎門砲台發砲擊退。一八三四年，那瑟鬱鬱而死澳門。其後英政府以大衛，魯濱孫繼任，粵督以商人大班視之，不予接交，交涉無門，毫無辦法而去職。迨一八三六年英政府廢通商總督制，派義律為領事。謂此來職權在約束英商，一切均遵中國成例，粵督始許之入廣州。而此義律，即為西歐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的急先鋒。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鴉片的輸入中國，已逾二萬七千餘箱，流出現銀，有二千萬兩。祇廣東一省，已有此數，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尚不在內；合計不下一萬萬兩。巨量的現銀流出，與鴉片烟毒害人民生命的普遍深刻，引起了人民的反對，與清政府的注意。清政府遂下令禁止；而執行政令最嚴厲的，是中國歷史上光耀百世的兩廣總督林則徐。道光十七年，他在廣東嚴禁鴉片，首於英商館前，偵獲出入密販烟土之奸商，捕而殺於英商館前示威，再命士卒襲入英商館，迫令交出所藏烟

士，竟獲二萬一千五百餘箱之多，被林焚毀於虎門。林更下令詔告外人：「凡洋人以鴉片入口者，分別首從。處絞斬。」「凡商航入口者皆須具結，如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經林雷厲風行的結果，烟毒為之稍殺。洋商中葡美等國商人，都望而生畏，獨英國商人頑強反抗，因鴉片為英國對華推銷之主要商品，今生計被絕，是忍無可忍也。英領義律，遂將中國禁煙情形，報告英廷，請求派遣軍艦，對中國宣戰，英政府在議會中討論三日三夜，最後竟決意對華進兵，因強買鴉片而對華宣戰，這真是有史以來恥辱的宣戰。那時英廷維多利亞女皇朝下，雖不乏公正之士，但議會操於資本家的掌握，資本家為本身利益着想，決不甘願放棄像中國一般巨大市場，每日在找機會打開中國的門戶，時機既至，遂不顧理由的曲直，曲在英國而直在中國，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對華進兵了。

英國派遣進攻的海陸軍，計有一萬五千名，軍艦三十六艘，大砲一百四十門，由加至義律，伯麥二人統率，於道光二十年五月（一八四〇年）至澳門。惟時林則徐早有準備，虎門江防工事堅固異常，英艦試探結果無利，乃移兵進攻浙江沿海，定海、舟山、乍浦，等地都無準備，接連被佔。後知非其要地，自動退出，移兵北指，向渤海灣進攻，打通白河，直逼天津，津沽與舊都北平相去甚近，清廷聞之大懼，遂令直隸總督琦善與英談判，英國提出和議六條：一、償還貨值；二、開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商埠；三、兩國際用平等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密買鴉片累及無辜英商；六、盡裁洋商浮費。清廷因懼於英兵的堅兵利砲的淫威，不知在實力上自衛，外交上抗爭，只求苟安無事，虎狼似的英軍早離京畿，為見好英人起見，反將精明強悍的兩廣總督林則徐免職，以向英人謝罪，而令庸碌無能的琦善，繼

林之任。告英領義律，返廣東與兩廣新督琦善議和。英人乃撤天津之兵回澳門，琦善既至廣東，於談判尚未結束之前，盡撤前督林則徐之守備，撤水師壯丁，以媚英人。英人見廣東之易進也，遂變本加厲，除強迫中國履行六條款外，更向我強索香港為割讓地，琦善表示稍有難色，英兵遂率艦進攻虎門，砲台被陷，琦善見事不可為，前防盡撤，攻守兩難，反向英求和，倍償煙土損失七百萬，開放廣州，割讓香港。於時清廷忽覺和議失策，命皇姪奕山為靖逆將軍，將軍四萬馳廣東。英軍得報，遂先發制人，進珠江、逼廣州，清軍大敗，主將奕山遁走。時英國又從印度調來大批戰艦來華，七月率軍北上，占廈門定海鎮海甯波。繼又進攻長江以扼中國南北交通，於翌年一八四二年五月，占吳淞，陷上海，溯江攻福山江陰，閩山諸江防要塞，六月陷鎮江，直襲南京，於時長江沿岸諸省乃大震驚，清政府更為危懼，驚恐之際，道光帝且欲遷避熱河。英人見和議之有利時機已至，遂提款清廷，清廷求之不得，命耆英、伊里布、牛繼三人為全權大使，至南京媾和，會英大使撲鼎查，七月十四日於英艦訂休戰約，二十四日簽署媾和條約，即中國對外史上第一次喪權辱國之南京條約是也。

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中國政府納賠償銀二千一百萬元於英政府。內：一千二百萬元償軍費；三百萬元償債務；六百萬元償焚燬鴉片損失。款分四年交清。

又：英佔長江一帶地方，於第一年賠款交清後撤兵。舟山鼓浪嶼二處，須俟賠款完全清償，五港開放以後，英國始行撤兵交還中國。

二、中國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於英國。

三、中國政府將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開放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居住，並准英國商家屬自由往來。英商貨物進口稅，應秉公議定，以便按例交納；照例完納進口稅後，准由中國商人販運內地各處，所過稅關不得加重課稅。

四、自後中英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

五、放還英國俘虜；凡戰役中爲英軍服務之華人，中國政府不得懲治其罪。

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的損失；是賠巨額款項，割地；（香港島雖彈丸小地，但地位衝要，扼珠江之口，無異大門之外即爲強盜窟穴，使中國廣東無法反抗，英帝國主義可以密切監視着。）默許英國推銷毒害中國大衆的鴉片；英商進出口貨物稅，應秉公議定，中國稅關不能自由課稅，關稅自主權也遭侵害，五口通商，中國市場門戶洞開，英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南大埠確立了經濟侵略的根據地。戰役中爲英服役之漢奸，中國政府不得治罪，爲英國干涉中國內政的開端。總之，南京條約是中國割地賠款喪害中國主權，束縛國家自由的辱國條約。英帝國主義以南京條約爲鎖鏈，緊緊的縛住了東亞龐大古國，吸血敲髓，使中國動彈不得。這真是中國喪失生存權的賣身契約，帝國主義屠宰中國的利刃。

三

鴉片戰爭的失敗，主要原因是政治腐敗，庸懦怯弱的滿清官吏，對付不了狡狴的英人。其次是國防軍器的陳腐，農業國的陳舊軍火，老式兵制，對抗不了帝國主義的堅兵利刃快艦重砲。這也是農業國與工業國抗爭所最爲吃虧的地方。

鴉片戰爭，英國是勝利了。可是中國對英國的仇恨，也從此埋伏了種子，逢春即發。卽就當時廣州三元里民衆反抗英軍的「

平英國」事件而論，已表現國人對於英國的仇恨。這事件發生是這樣的。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一八四一年），清將靖逆將軍奕山被敗於英軍，英軍攻入廣州，姦淫擄掠，大發獸性，居民恨之刺骨，於是有人何玉成者，振臂一呼，集衆萬餘，出護廣州西北郊三元里，樹「平英國」旗幟，猛撲英軍，陷英軍主將義律於重圍，此事夷氛紀聞——清累廷柅著——記之甚詳：

「伯麥——英將——身體肥健，首大如斗，自恃臂力，率領餘衆，自臺下闖至泥城，西村，蕭崗，諸村落，大肆淫掠，姦及老婦，村民大譁。舉人何玉成，卽東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諸村，各備壯丁，出護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餘鄉，率先齊出拒堵。對岸之三山等村，亦聞聲而起，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夷目畢霞領其兵與村民戰，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欄崗，所近居民大至，轉瞬民多夷少，急匿叢薄間，放槍自衛，村民但遙圍之。入夜，則脫衣懸樹杪，迎風搖颯，作疑民，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搜殺幾盡，逃者不識途徑，亦多被截擊，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麥畢霞同時殞命。收其調兵符券，防身小鐵劍，小槍之屬，夷兵方舍命突圍出。無奈人如山積，圍開復合，各棄其鳥鎗，徒手延頸待戮，乞命之聲震山谷，村民以其困不復逞，亦卽不殺。其留着定台餘夷尙衆，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環立山麓，相約聽其餓斃。圍既久，越日義律馳至，亦被圍，密遣人間道求救於保純，聞報請於額，或勸出福建新至生力軍，助村民活縛義律，監而勿殺，挾悉其船出外洋，還我漢好，以是痛懲之。機不可失，當時相顧，無敢任者。事經兩日，官爲調停其間，頓令南海合梁星源，番禺張熙宇，隨保純出，步向三元里紳民拊勸，代夷乞免，越數

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復誰何。遂親翼義律下，羣夷繼之。衆口喧嘩，笑聲聞十里。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之。

這是中華民衆反英運動的第一聲。雖然這運動不久就平息，但中國的反英心理，也就隨着英帝國主義的侵入而一天天加強起來。鴉片戰役結束，中國開五口通商，但廣州人民堅決拒絕英領事入廣州城，英人無之如何，只得與粵吏訂不入城條約。後來英使包冷 (Bowring) 要想推翻不入城條約，以推廣鴉片貿易，乃設法令華人以小艇向英國登記，懸英旗運鴉片，咸豐六年有水師千總巡視粵江，遇着懸掛英旗的划艇亞羅號 (Arrow)，知道是販煙的划船，乃上前拘捕奸商十三人，並撤除艇上的英旗。英使

研究

東亞的第三陣線(續)

吳信中

便借題發揮，照會總督葉名琛，提出強硬抗議，一面報告英政府，派兵來華，當時廣州民衆聞訊，即羣起報復，燒英商館十餘家，並燬法國領事館，以致引起英法聯軍。這又是一件反英運動的事實。

反英運動是有其歷史性與必然性的。我們不能說反甲是受了乙的指使，假使僅僅受了別人的指使而去反對某一方面，這是沒有靈魂的工作。沒有靈魂的工作，是受人愚弄，遲早還是自己吃虧。準於此，我們不反對反英運動，但是我們主張反英運動要自己做主體，要站在民族自立國家自主的立場來進行。同時我們要有計劃的，有步驟的去進行。如此做去，方可達到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而使民族可以真正自由，國家可以真正獨立。

二、

歐洲國家間，民族種族的複雜，遠過於東亞。其強大國家間，民族勢力的爭奪戰，遠勝於東亞。巴爾幹半島與中東歐的各小國家，俱在凡爾賽和約中得了獨立自主的地位，去維持「有」的國家的和平機構；非洲的殖民地則完全處於英法二大強國的均勢控制下，以爲其商業資本的尾閘。所以歐洲局勢中的意德，所隱窒在凡爾賽和約的樊籠中；不能自強更生，便得窒息而亡。同時，歐戰以還，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已不能支持戰後的殘破局面；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亦以戰後的經濟破產而呈崩潰之象；於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舊秩序的頹勢中，國際共產主義遂乘機而

入；尤其在戰後殘破局面的德意國家，赤色的恐怖尤形猖獗，使會意國家不但在外部受「有」的國家對其民族生存加以限制，并在內部有國家傾覆的危機。德意處此二重壓力之下，遂奮起了民族自救的途徑，開闢了時代構造上一條光明的路線。然而這是實際需要上的行動，不是思想理論上的革命。

先拿意大利來看：「第一、是意大利參戰的失敗，與意大利同樣參戰的各協約國雖然都得到了勝利，而意大利因爲國內的腐敗，對戰爭除犧牲了巨大的生命財產外，幾一無所得。第二、是當時意大利社會的擾亂，戰後的意大利本來已經混亂不堪，社會黨不但不恢復秩序，維持意大利民族的生命，反而利用一階級鬥

爭」來破壞意大利的社會。第三、是意大利承着大戰和社會黨的擾亂後，經濟狀況已到了最衰落的地步，國家財政，人民生活計，都同陷於無法維持的狀態，意大利如再不穩定秩序，發展生產，整個的意大利就有崩潰滅亡的可能。」在此意大利本身的需要中，創造出墨索里尼的智慧與毅力，締造了法西斯黨的組織。所以墨索里尼「確實地感覺到他那時的理論絕對沒有固定的具體的表現，祇不過是些格言，預期和宏願罷了。這種格言，預期和宏願自始便受時代的洗禮或改進，所以能夠逐漸發展，在若干年代以後自然變成一種合理的理論，這就是法西斯政治理論的形成，和古今一切其他理論確乎不同的。」（以上俱見墨索里尼著法西斯主義的哲學基礎一文中）。

自一九二二年以來，意大利是採取了這社會上實質需要的革新，於經濟衰落社會騷動的惡環境中，從縱的方面團結起意大利民衆中各階級，去維持民族國家的安全，與繁榮。這一個反動，既丟棄了民主主義，同時也否定了共產主義。於是法西斯主義當時在歐洲就成了廢棄資本主義而對共產主義的一種意大利式的政治試驗品，而具有獨特的性能，使意大利人民能在某種新的期望中跳躍。這種試驗雖然成功尚遠，然而現在意大利已在使其一部分期望能實現，而啓示了世界「無」的國家自身掙扎的途徑；雖然這種啓示是霸道的，獨裁的；然而却是現實的，精神的。

歐戰後的德國，是束縛在凡爾賽條約下，剝奪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然而「德意志的潛能力，依然在歐洲大陸的列強中居於第一位」。「德意志的國家政策是動態的，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亦復如此。德國人民因爲本國在歐洲有強鄰逼處，海外殖民地又微乎其微，工商業之發展處處受了這類限制不能突飛猛進，於

是就存了一種急切的心理，常常躍躍欲試。縱然沒有凡爾賽和約加於他們的種種待遇，其國家政策在一九一九年以後也必依然是動態的。」（見 Frank, H. Simonds & Brooks The price of peace ch. III 中）。固然，德國社會上實際需要，也使德國政策不得不採取動態；可是德國過去的國家精神，已經是失敗了；以後的精神動向，雖也在這基礎裏爆發出來，然而必得沈澱與刷新。自一九二五年初以來，斯特拉斯曼的和平運用，成立洛加諾條約，加入國際聯盟，避免了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保障了民主主義；這可說是德國的國民精神在沈澱期中渡過。在這幾年中，即在一九二六年以後的數年中，德國似重見繁榮，似在中和他戰敗的屈辱與魯爾喪失後的憤恨與失望；可是這種繁榮是寄生在美國與英國的借款上，既要向外國購買所需的原料，復要把生產品或其代價直接的間接的去支付賠款，這顯然是一種虛幻的繁榮。所以至一九二九年，大不景氣的黑影突然籠罩到世界，英美同時突然停止了貸款，保障德意志繁榮的基礎條件，亦因以喪失，加之悲慘的債務清償，遂演成德國生產崩潰的現象，全國經濟生活就從此瓦解，而使赤色恐怖有一觸即發之勢；於是又洩起了對凡爾賽條約這鎖鍊的憤恨心理，對過去合理的和平條件之化仇爲友的辦法，已深知其必亡德意志，不得不以「力」來抵抗解脫，因此，沈澱的德國國民精神，就在這戰爭失敗，和平屈伏，赤色恐怖的歷年艱苦訓練中，造成了他的刷新反動作用，同時意大利又在標示了這種反動的現實的有效性。於是赤色恐怖與民族自救就成爲「引起德意志反動的主因，至少也是一種先導，這種反動，是完全仿效意大利的反動而行的，而希特勒之於德意志反動居於主宰地位，也恰如墨索里尼之意大利反動一樣。」

（見 Introduction 中）

現在德國的國社黨與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已在歐洲中成立了一種民族陣線，向其所謂的民主陣線進攻，去淹沒巴黎和會所締造的組織，來解放他們經濟需要的逼迫。然而這種事實上的反動，祇表現了他們行動上的「可能」，而不能決定他們行動上的「必然」。民主陣線裏的英美法蘇祇顧慮了集團行動上的安全保障，使法蘇不得不追隨英美而抵抗德意，英美亦在利用法蘇，維持其「有」的地位；然而「維持」祇在強大國家現有局面下着想，是在德意法蘇四強在歐洲的均勢局面下着想；在此局面下，德意的動態政策，對英美資本主義的民主陣線，決無直接侵犯的必要，而亦無使其崩潰的必然，祇可以拿他們的精神效力向着主要工業比較落後的小國家猛烈傾注，控制原料與食品的資源，以爲其國民生存決心的表現；這在「有」的國家必犧牲弱小投其所需有容其行動的可能。所以現在巴爾幹半島中東歐以至非洲殖民地的弱小國家，已成爲這動態中動向的目標，世界和平的是否能維持？德意陣線是否能堅固？一視此間政治的或說國際的均勢程度以爲斷；可是蘇聯則羽翼於民主陣線下而隱藏其目標，制止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矛盾性。而煽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陣線爲對德意民族陣線的堅強壁壘；然而民主陣線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在現狀的和平維持下，優容動態國家行動的可能，使民族陣線爲反共產主義的前鋒。所以現在歐洲的三大陣線的對立，依然是帝國主義間利益均衡的問題，而不是思想間或說文化間對立的問題。這裏的主要關鍵，是因爲動態的行動，祇是環境需要的衝動，不是歷史進程上文化論理的反映；所以在德意的政策上是國家的，其行動是霸道的，而其文化是在將來。民主國家也就在利用這點，撐持了他們頹廢的矛盾局面。

所以德意的動向「不是事前有了一個思想體系，主義信念和

政綱政策，爲着實現這些理想而發生的運動；他是因爲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實際情勢的要求而引起的新政治傾向。」（見張克林著法西斯主義研究二九五頁）。因此「他對於一切事件或問題所持的態度，都是隨機應變的，若果經驗上或事實上證明原有目標不適當時，立刻可以把他廢棄，另探新的道路和新的方法……他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迭次宣傳改革，常時發布命令或釐定法律，以適應此改革的要求，他們認爲這種改革是調適政治上的措施和經濟上的建設，而不是常以其實行爲義務。」（見前著八頁至九頁）。所以根蒂萊（Gentile）謂法西斯化的文化，「不是文化透入法西斯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透入文化」。換句話說，理論是無價值的，行動是在付理論以價值。固然，科學的方法，必得將材料放在實驗室中，真理是從實驗中歸納出。然而實驗祇是一種導出真理的手段，其本身不含有目的。如果拿實驗手段作爲一種文化的評價，這就冤屈了法西斯的運動，法西斯的文化體系，是在未來的。

可是在法西斯運動下的德意行動中，每在避免去他們實驗的失敗，而歪曲了材料本質的「質」「量」，加以己意的修補。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形成，德國國社黨的成立；是因其能攫住當時意、德社會核心的小中產階級的需要；這些小中產階級是介於資本主義社會裏勞資兩階級中間的一些社會層，這社會層是社會文化的創造者，但是在現在社會裏是處於前後受敵的境地而日趨頹衰的一羣，都市上中小企業者已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勞動改善的運動下面破產而失業，中小地主與自耕農已因資本的榨取與組織訓練的缺乏而沒落而萎縮，智識階級則更徬徨歧路，而俸給生活者，小官吏，學校教師等更以資本主義的發達，而益增加其數量，復以生存的競爭，經濟的逼迫而益趨惡化。希特拉莫索里尼洞

察了這種實際，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相反的作用外，攫住了這些許多次要的力量與作用，以爲民族復興的根本動力；而爲其行動的骨幹。然而這種實驗，易爲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即國家經濟的商業化(Kommerzialisern)與個人資本的政治化(Politisiern)的觀念所動搖。於是在法西斯主義演進的階段上，也就與資產階級的大企業家大地主等結了不解之緣，祇在倫理國家的觀念上，維護了這統制的體系。然而國際的資本主義是不容其有這倫理觀念的個別存在的。修正資本主義，也必得復興資本主義；在其國家經濟的發達上，即不能脫離國際經濟關係。所以說：「意大利在法西斯蒂獨裁的發展中，曾大量地吸收美國資本，以建設國家事業，斷非絕對保守孤立地位；同時，意大利之所以併吞阿比西尼亞向亞得里亞海岸發展，是爲資本的發展，而非爲民族的解放。戰後，德國喪失殖民地，爲謀經濟的恢復，故亦不得不吸收美國資本。」同時亦不得不向國外有所企圖，絕非爲民族解放的單純作用。(以上見張克林著法西斯主義的研究八十三頁)

他又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美國是首當其衝，以無產階級運動的擴大，美國政治也就在轉向到法西斯政治的途程上，希打破此難關；可是「美國法西斯運動，則係在世界關係上所顯呈的資本主義有力的政治動向，因此美國主義一方面要擴大美國經濟勢力範圍，以保障本國資本主義不斷地進展，一方面因爲世界經濟關係，影響本國甚大，故主張扶助國際資本主義。前者是資本主義國家間對立激化和國際戰爭發生的主因，後者是國際協調的傾向——財政上的援助、資本的投下、金融的調劑、戰債的讓步等，都是美國想維持國際間和平的表現。這就是資本主義國際化和國家化或個別化間，所存在着的相互依存的性質，同時也就是矛盾對立的性質。」(見前著八十七——八十

八頁)。所以德、意的動態，在國民精神上雖得着刷新的機緣，然在國際上，則仍在撐持資本主義；在內包上雖能扶持中產階級復興民族精神，然在外延上，則仍未脫離資本主義的窠臼而向帝國主義的途程上邁進。因此，德意的動向，是在實驗上加了主觀的成分，變更了原有的材料的「質」「量」，於是以經濟的衝動以爲政治的發展，并未以政治的直觀去謀民族的協同，經濟的互助。那末，現代社會機構的原理，就不能由德、意的動向指導出，而其行動的價值，也就不不得不以其本身事實中或說其個別化的精神刷新中所孕育出的理論去給付了！

所以我們認識到：德意的動態，是在國家化個別化上，或已進到現代社會機構的新階段，而在其國際化上，則尙未能脫去帝國主義的民族一元化的侵略作用，而進入於民族多元化的民族自決互助的新社會機構的途程。所以現在德國國社黨對國際則力唱民族一元化的亞利安人種論，其政治上的理念，固在爲同一血統下的德意志民族謀大德意志的國家的建設，而於其世界觀上，以民族爲第一；然其民族的概念，乃生物學的，種族的概念，希特拉在其「余之鬥爭」中，謂國家非目的，乃手段，乃爲人類較高文化的生成之前提條件，這就是因爲有生成文化的能力之種族的存在的原故(見該著一九三三年版四三一頁)。國家乃爲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在維持助長身體上精神上同種的生物共同體(見四三三頁)。一切動物傳播同種，有爲其種之純粹性的自然本能，高者強者拒與弱者相結。種的混交是在使使者變劣。文化的保持祇由保持創造文化的最高種族始可能。但今日之人類文化的悉爲亞利安人所創造。種族是不平等的，優強的種族應支配劣弱的種族，將來唯一的種族乃作爲支配的種族而稱尊於人類；而此制霸的核心，乃日耳曼種族，此種民族一元的種族制論點，初

雖爲意大利法西斯的國家至上論所輕視，但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以來，意大利亦積極排斥猶人，并在文化工作上公佈公認意大利種族政策之科學的根據。其主張是於法西斯政權的意大利所行的一切上，是以種族論爲根據；意大利的種族問題，非哲學的宗教的，乃純生物學的；其種族概念本質上是意大利的，是由其純歐羅巴的特徵，以意大利人故，去維持與一切非歐羅巴種族完全區別的種族之身體上并心理上的典型。此種生物學的種族論支配了德意的對外動向，威脅弱小民族，加強國際對立。歐洲的國際局面遂仍故態復萌，連橫合縱，以弱小國家爲折衝，以外交手段爲探試，和平其表，戰爭其實，而人類的慘禍，遂有朝發夕至之勢，而德意的文化亦祇爲德意的文化而已；其對世界的作用，必有待於將來，但這就決定了德意社會在此時代構造中另一途程上所努力之運命。

中日「和戰問題」的總檢討

從世界近代的歷史講來，此民族與彼民族，或此國家與彼國家最常陷於「糾紛而不可理」，且大有「不共戴天」「仇深似海」的趨勢的，我們在歐洲可以尋覓到德意志與法蘭西的實例，在亞洲也可以尋覓到中國與日本的實例，真是好像「東西輝映」，「無獨有偶」！固然，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若追溯到一百年以前，那時所謂「民族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均未完全發展成熟，德意志之與法蘭西，中國之與日本，絕對沒有構成有「誓不兩立」的條件，所以我們想起這個世紀的劇烈變化與前此的情形，

不過現時代社會文化的轉變，已在指示着現社會機構中的正確途徑；國家個別化的國家至上論，決不能違背民族自決的民族至上論；民族一元的民族國家運動，決不能阻止民族多元的國際協同運動。在此個別的民族自決與個個的民族協同的原則下，東亞第三陣線的本質始明；所以東亞的第三陣線，是在反國際資本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的二面下，求新民族主義的實現，進於東亞民族的協同，而建至民族平等的大同世界。這自與歐西所謂之「民族障線」不同，亦自與近世的民族主義迥異。其特質是在順應近代文化的轉變，其特徵是在適合於東亞的現狀，其作用是在謀東亞各民族之自主的連環互助，以爲東亞文化的向上與經濟物質的發展，藉達世界和平新機構的完成。其評當另編述之。

——完——

方崇儒

實在不能懷疑到人類的歷史，到底是「進步」？還是「退化」？我們知道所謂現在操縱歐洲甚至全世界的「和平」與「戰爭」的關鍵而舉足有重輕之勢的德意志，在從前就根本算不得個什麼了不得的國家！其國內的四分五裂，政治的腐敗，人民的墮落，並都不見得比被一般人稱爲「一盤散沙」的中國好得了許多！惟因她從在耶那「Tona」被拿破崙打得個大敗，蹂躪得個不堪，受了這個絕大刺激，纔「咬牙切齒」「埋頭苦幹」的發憤圖強；那般政治家如斯堪因Stein哈敦格格Hardenburg 沙恩錫爾斯Belan Von 等人都起來「排除萬難」，從事改革；在學者裏頭如非希、

Witt's 恩特 Anbt 一些人看了本國方位的危險，他們就相繼提倡國家主義；同時赫格爾 Hegel 又專門利用歷史來達這個目的，他本來是中了唯心論大毒的人，他完成了那一派「玄而又玄」的歷史哲學，一變就變就一種「玄學的歷史觀」。他在「歷史的哲學」講義上說明歷史是顯示歷史的民族的「世界的精神」；（文爲 Weisheit 英文的翻譯是 Universe spirit）他所謂的「歷史的民族」，係指波斯、希臘、羅馬和當時的日耳曼族。「歷史的民族」都是能夠駕馭全世界，統制全人類，所以他們都具有「世界的精神」；因此之故，赫格爾一派的歷史家就都流於一種主觀的，國家主義的，狂妄的，騷恣的歷史觀；後來德國的歷史學者都沾染了他的思想，如推池克 Feitschke 可以說是他的「高足弟子」，於是所謂「普魯士史學派」也就成立了。這樣，德國在勵精圖治的政府領導之下，且得忠君愛國的學說的激勵鼓吹，民族精神自然發達，結果就能在很短的時期以內奏了奇效！如拿破崙侵犯俄國大敗而退的「剎那」，就膽敢首揭「援俄抗法」的旗幟，爲天下倡！在萊比錫 Leipzig 一役，普魯士軍隊確實很能夠于法軍以重創，使「蓋世英雄」拿破崙一蹶不振！後來在滑鐵盧 Waterloo 一戰，又能「衝枚急進」，趕來援救英將威林敦 Wellington 於苦戰之中，博得最後的勝利！接着驅逐奧大利的勢力，圍攻法京巴黎，完成德意志帝國的統一，會幾何時，竟雄飛活躍於世界？在歐洲大戰以前，德皇威廉第二 Wilhelm II 且曾說過「氣衝萬丈」的話。「國際政局上的任何重大問題，都不能不和德國商量！」他並不是「外強中乾」，胡亂吹牛，事實上確係如此，試看他在「一九零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三月會遊歷到摩洛哥 Morocco 的丹吉爾 Tangier 地方，他在那裏隨便發表一信宣言，就使得法、英、義大利、西班牙嚇得「屁滾屎流」一魂

不附體！而這些所謂「列強」從前曾經締結關於摩洛哥問題的各種條約協定，也爲之根本動搖！像這樣德國的一言一動，都足以影響於全世界，德國人民自然不約而同的感覺到「德國德國高於一切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ben alles」了。有一匿名英國婦人所著「我發見的什麼 What I found out」一書，即中文譯本的「德皇外委自述記」，裏邊有如下的記載說：「吾德人地占優勢帶有神之使命，其能達征服歐洲全土之目的與否，皆天運也，自佛勒特利大王蒙吾國基以來，吾人所懷抱之世界的大精神，每博勝利之榮冠日進無已，今日吾人活躍之狀，方諸往昔，未嘗稍讓，故國日益強盛，則殖民地當日益增加，如南美者，實爲我國力發展最重要之寶庫也，美國唱道「門羅主義」，於吾人行動，或不免有所掣肘，然其國之實力微弱，海陸兩軍難操勝算，一旦時機到達，揮我戈矛，則彼恫喝之虛聲，胡能阻我耶？」「世界各國中，德爲最優越之國家；德之海陸軍人，惟坐待好機，一朝有事，德軍即可蹂躪法國，又海陸並進而覆俄軍，雖無奧國之援，亦不難平定歐洲全土。至對於英國，則用最新式「徐伯林飛行船（原註——英國之頑冥發明家決未嘗試爲模造）與克魯伯秘密戰，亦可立操勝算，是德國固將冠榮譽之冠，以君臨他國，爲世界之霸主也。」（註一）

德國如此，我們東鄰日本的情形又怎麼樣？說也奇怪！一般人都叫日本做「東亞的德意志」！在明治維新以前，歐美帝國主義者看待日本真彷彿比中國還差很多遠的一個「既小且弱」尚停滯於野蠻與半開化的狀態的東亞國家，所以他們膽敢恃勢前來欺凌日本，強迫開港通商，文學博士重野安釋氏所著「日本維新史」有說：

「……歐美艦時來窺邊，文政八年（仁孝天皇年號——即道

光五年）幕府令沿海諸國、外艦近海者，不問事情，砲擊之。至天保中，（亦爲仁孝天皇年號，並在道光初年）改令船艙漂到，乞薪水食料者與之，若有懷禍心，拒諭示不去者，當應機砲擊。後二年，荷蘭使節坐軍艦來長崎，呈國書，陳歐洲之情形，勸解鎖港禁，與各國交通，幕府以祖法不可變答之。嘉永二年，（孝明天皇年號——即道光二十九年）英船巡偵浦賀，（相模國）下田（伊豆國）諸港去，美船亦到長崎，幕府不能禁，於是荷蘭密告曰：「美國將發軍艦求通商，宜許之；六年（按爲孝明天皇弘化六年——即咸豐三年）六月，美利堅合衆國水師提督彼理，率軍艦四隻來浦賀，呈大統領美書於幕府曰：「我國西界，正對日本，火輪船十八晝夜乃達，其地出黃金四千萬兩，銀汞寶玉亦多，而日本富澤，其人明曉多藝，請通交貿易，共享其利。……我船駛支那甚衆，當過貴國近海，若遭風漂到，宜賜恩待，貴國富煤炭，尤饒食物，我船闕乏，請許買之。」七月，俄羅斯水師提督布恬廷亦以軍艦四隻來長崎，乞定樺太境界，且爲貿易，幕府各遣人接之，乃去。會將軍德川家慶薨，子家定嗣爲將軍，明年安政元年（咸豐四年）正月，彼理再來浦賀，幕府准於下田（伊豆國）箱間（蝦夷）二港，給薪水食料等，俄英法三國使亦繼至，並結約如前；尋美人波兒利士齋國書來，申請通交貿易事，往復辯論，幕府不能拒，請旨朝廷未允，諸外邦催督益急，五年（咸豐八年），幕府與美俄英法荷五國，權締條約，許開長崎，箱館（蝦夷島），橫濱（武藏國），兵庫（攝津國），新瀉（越後國）五港爲貿易；時家定竟無子，同宗家茂自紀伊藩（紀伊國和歌山城主）入，嗣爲將軍；彥根（近江國）藩主井伊真柄任「大老」，（

幕府執政首座職名）決意訂定條約，不待勸准至。文久（亦爲孝明天皇年號——約在咸豐末年同治初年）中，遣信使於五國，交換條約，請延兵庫新瀉開港之期。五國修好以來，葡萄牙，普魯士，瑞西，白耳時，意大利，丁抹相繼乞通商，幕府並許之，締約如五國例，遂至十一國。初，建久（後鳥羽天皇年號——即南宋光宗紹熙三年間）源賴朝拜征夷大將軍，始開幕府於鎌倉，（相模國）握兵馬之權，政柄皆歸之，歷尼利氏，豐臣氏，德川氏，或爲大臣，或爲將軍，以武臣相踵執政，王綱解紐，朝廷衰頹，徒擁虛器而已，志士常慨之，至是邊海不穩，先帝（孝明天皇）深憂慮之，而幕府措置，不能協聖旨，諸大藩及士民，亦不惟其事，於是尊王之說，攘夷之論，囂然而起；諸國之士，脫藩去國，湊集京都（山城國），闢說公卿，或東西奔走，互通謀議，勸朝廷，以鎖港絕夷責幕府，乃詔大將軍德川家茂至京都議之，家茂入朝奉詔，詢之各國公使，皆不肯；幕府更欲存長崎，箱館，鎖橫濱，與各公使議之，又不諧，因請勸准三港互市，廷議不得已，從之。……十二月，先帝崩，今上（明治天皇）踐祚。……當是時，諸大藩皆知幕府不能負荷大政，前土佐藩主（土佐國高知城）山內豐信遣德川慶喜，遣其臣後藤象次郎等，勸以納政柄於朝廷，薩摩藩臣小松清廉，大久保利通等與安藝備前諸藩士謀，並慫恿之，慶喜從其言，遂上表還政，朝廷聽之。……（註二）

老實的講，此事實是在使日本「變弱爲強」，「由小成大」的再重要不過的一個大轉機。德富蘇峯氏雖曾說：「假定沒有美人波理Part，率兵船四隻入浦賀強求開港通商，俄人相繼來長崎以求貿易，外國關係僅限於常來長崎的荷蘭的商船及中國的商船的

話，外國的關係對於我等日本人不引起內政上的何等影響，那麼德川幕府會不會依然存續着呢？抑將土崩瓦解呢？這是不可知之謎的「假定」。我等即或沒有外國的關係，幕府也不能存續下去，何以故呢？因當時的幕府有二大勢力使其懷備：第一為尊皇思想，第二為水戶義公及山鹿素行的時代，僅為一種理想論，不過其後山縣大貳，竹內式部，高山彥九郎的時代的推移，實行的勢力逐漸增進，此種思想雖在抑壓下，可說在相當的機會定然爆發的。第二幕府最感困難的是財政上的困苦，世界漸漸的進步，政務的煩屑與複雜，八百萬石的歲入。到底不足應付一切開支，同時富的分配漸次移於商人階級的手中，政權已經陷於不能維持的狀態。即幕府的頭重腳輕，支持自己的力量漸次消失，非趨於顛覆的一途不可。在精神上一方面與尊皇論勢不兩立，在物質上的一方面，自己困於窮乏的苦境中，雖沒有一種大打擊，幕府自家到底不能不跌下去。但氏也承認「明治中興的改革，繼續突破一切艱難的首尾經過，畢竟是當前橫着的對外問題，在這一點上把一切恩怨忘去，嫉妬心概行剷去，個人的感情置之度外；利害得失，屏之而不顧，舉國一致的態度以邁力方能達到。雖然對此事國民間不免有多少的異論起來，但是在精神上總是一致的趨向。」又說：「日本人對於外敵是感覺威脅着生存，非力追去之是不安心的，中國的對外思想則恰與此相異，中國的外交概為得過且過的苟安外交，即當時聊可以粉飾得下面子的話就認為可以安心無事，可是在日本人這樣的祇是裝飾門面是不能安心的。」又說：「尊皇者。以皇室為中心之謂，全國民皆奉職皇室，即以天皇為中心，完成日本統一之目的，今日所行的一君萬民政治，這個目的，亦即我等所謂皇室中心主義。攘夷決不是殘殺外人，燒燬外國使館，祇是不許外人蹂躪我國的國權，損傷我

國的國體。……」（註三）這話說的還不失當時的真象，所以日本在這位「曠代罕見」的聖主明治大帝領導之下，竟能在很短促的六七十年中，發生日本自有歷史以來兩千多年空前所未見過的「山河飛躍，電光石火，應接不暇」的劇烈變化，這種偉大的成績真是不但成為日本民族無上的光榮，而且根本沒有疑惑的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椿「靈蹟」。無論什麼人讀過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歷史，大概都是無不感覺驚嘆興奮的。就中如在東亞各國中最能得風氣之先的事，實在不勝一一枚舉，如在明治四年（同治十年）明治天皇即於紫宸殿率公卿諸侯，誓天神地祇，約五事如下：

「曰，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曰，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

曰，求智識於世界，大振起皇基。」（註四）

這事比宣統三年清廷頒發的「十九信條」（註五）不是要早得四十年嗎？中國處處落後，那裏還有不吃虧的道理？此外如在「教育」方面，明治五年（同治十一年）日本政府即頒布「學制」，那時為培養人民的愛國心的歷史課程裏，還殘缺不全，只有號稱「東洋史」的「中國」及「中國史」及「西洋史」而已，後來纔接受那位由德意志聘請而來的歷史教員尊重本國歷史的建議，（註五）於是一般學術界，教育界與政界的人纔注重在發揚日本本國「萬世一系」的國體的完善，國民性的優美，如志士的愛國，忠臣的盡忠。武士的俠義等等方面，舉個實例來說，白井規氏在所著「歷史教授諸問題」一書裏就拿中國和歐洲來與日本一一比較：

「……中國建國之初，就有部落並立，沒有君臣本末的關係

，所以「民爲本，君爲末」，君主不過受天命而救國，這種道
德規定，不過只是一種政策罷了。歐洲的歷史總離不開放奪
殺伐，最奇怪的是驅逐了己國的君主，而去歡迎他國的會頭
，這分明是「大道不道」，偏美其名叫做「名譽革命」！他們
和我們日本「萬世一系」的皇朝比較，你看，我們光榮到了
什麼地步！

這話在日本人看來，雖然是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自
中國人或歐洲人看來，却免不了「誇張自己，毀謗他人」的嫌疑。
又如日本的「國定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據松下芳男氏所著「戰爭
思想的研究」一書說是很帶着濃厚的「軍國主義」的色彩：第一
，各戰目該戰爭的事件很多，目的在使學生愛好戰爭。讚美戰爭
，崇拜大將；第二，全書所選擇的材料性質也很慘酷，如從鎌
倉權五郎的眼睛裏拔出被射進去的箭桿等事；第三，特別獎勵愛國
和忠義等戰時的道德；第四，蔑視外國的主義異常顯露，這是因
爲尊重本國就不免看自己是偉大而別國都是卑下，故日本歷史所
記外征的事實大概完全是絕大勇武的侵略行動，其戰爭的原因
只是「不來朝貢」，或有「非禮舉動」，措辭非常曖昧，這些都
明明白白的「排他的」，「偏帝國主義的」。又引法學博士泉
哲氏在「國定教科書之國際的解說」一書的「序文」，以日本的
國民教育從來實在太過於偏重「國家主義」，而且太把「尚武的
精神」，鼓吹得厲害！大島正德氏所作的「自治及修身教育批評
」一文也說日本的「修身教科書」着重忠君愛國的思想，固無可
非議，惟不幸墮於極端偏狹的國家思想，而教師們使用這種教科
書的結果，竟堂堂以倡道排外主義自居，實可驚異。（註五）以上
所述，還是就高級的學校的教本而言，最可怕的是在「天真爛漫
」的尋常小學裏即培養侵略他國的思想，如小學一二年級裏所使

用「文部省」編纂的「國語讀本」即有所謂「桃太郎的故事」，
其大意可轉譯如下：

「從前，在某處地方，有一個老公公和一個老婆婆住着。每
天，老公公到山上去砍柴，老婆婆到河邊去洗衣服。

有一天，老婆婆正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河面上有個很大的
桃子，正在漂來；老婆婆歡歡喜喜的把牠拾了起來，帶回家
去，老公公就把牠剖成兩半，那知突然之間，有一個很可愛
的男孩子，伸開手臂，從桃子裏跳了出來。……

桃太郎漸漸的長大起來，他的力氣也跟着長大；大人們以拿
不起的大石塊，他卻能很輕易的把牠舉起；和別人相撲，無
論怎樣強健的人，都不能打敗他。

那時，桃太郎想到鬼島去討伐那些鬼，老公公說：「這是英
勇的事呵，你去吧！」又和老太婆一起做黍糰子，在做好了
的時候，恰巧桃太郎也準備好了，他腰間掛着刀，背着滿裝
黍糰子的口袋，手裏執着扇子。他在路上，有狗和猴子，野
雞做了伴侶，大家就乘船到了鬼島。

經過一場惡戰，鬼大將就從寶庫裏拿山隱身衣和打手的小槌
，與珊瑚等財寶來送給桃太郎，於是他就把這些寶物帶回家
裏來。」（註六）

據一位生在東京的前輩說，日本的小學教師講到這一課都特
別解釋給兒童說：「桃太郎就是日本人的代表，鬼島即中國，鬼
及鬼大將都指的中國人！」這種教育真比德國還要「變本加厲」
的猖狂！而所收的效果也大有「後來居上」的趨勢，德富蘇峯氏
曾說：「日本在東洋的立場，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即光緒二十及
二十一年）對中國的戰爭已經確定；至於日本在世界上的立場，
則在明治三十七八年（即光緒三十及三十一年）的日俄戰爭後，

方纔確定。這兩個事件，含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使短短的明治七十年間的歷史遠勝於長長過去三千年來的歷史，我等愈考察而愈劃切的認識。先是，條約改正的企圖，用盡了一切方策與手段，尚不能達到法權回復與關稅自主之目的，不意明治二十七年之役到三十八年之役間，對外的一切欲求，皆若「駕輕車，就熟道」一樣的即行達到。「百言不如一行」的古語，正切合此事。更從世界的歷史。以觀察日本，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的結果，是把亞細亞的老大的中國的真相暴露於世界。其結果遂誘亞細亞分割的時代出現。英國以揚子江沿岸爲目的物，德國以山東省爲目的物，法蘭西義大利以中國西南爲目的物，俄羅斯以中國北部爲目的物。單是這樣的話，日俄戰爭還不是十分能引起戰爭，不意俄方更伸其魔手於朝鮮，其結果即有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此次戰爭把歐洲諸國所恐怖的「北方之熊」的俄國大半空虛的內臟，極容易的暴露出來。」（註七）這樣看來，在晚近世界的國家裏有長足的進步而能一躍爲「頭等國」的只有德意志和日本兩個新興的國家，都是「食戰爭之賜」；再就兩國的國情而說，「通國皆兵」，「勇敢輕生」以及「質素簡樸」，「堅實勤勉」，在政治上均採取「中央集權主義」，婦女們都崇尚「良妻賢母主義」等等皆非常相似，（註八）故日本爲「東亞的德意志」一句話，真「名符其實」！

二
惟天下事常是「兩大不能相容」，德意志既以「世界的霸主」自命，又出來個日本與之「問鼎的輕重」於國際間，自然照「武力主義」的推演是不會有好感的，德皇威廉第二就深恨這個「自命爲世界將來霸者之日本」，會對他的海陸軍將校說過：

「朕所恐懼憂虞之諸事中，其列爲重大之一者，則日本人是

也。我歐洲鄰近左右，如俄法奧匈等國，亦傲然自命爲強大國，然以實際論，日本則更在彼等以上，其國民亦未可輕視，觀日本人之現在，推日本人之將來，當令人起憂慮之心警戒之心焉。其國土遠在極東，領域狹小，由數個島嶼而成，東西甚狹，南北甚長，雖自軍事上言之，倘一朝爲他國優勢之艦隊所襲擊，則八面受敵，防禦非常困難，然彼等日本人有明快之頭腦，有卓越之手腕，種種均不劣於歐洲人，彼曾攷察其國土之地位形狀，充實其陸海軍備，孳孳焉爲完全防護之計畫，採用我德國之「軍國主義」，以爲國是，起而與世界各國相頡頏；其國民亦如我德國國民然，好勇鬥狠，以軍國主義之國民自誇，彼猶以現在之軍備，尙未足奏防護全國之效，期於將來建設一大軍國，以試其世界的大飛躍，朝夕準備，不遺餘力，朕方欲擴張領土於極東，而著手之計畫，均因日本之理想與實行，頓起重大之障害，朕思之熟矣，朕與日本將來之衝突，終有不可避之一日，朕深望我德國國民，勿忘日本人爲極可恐懼極可憂虞之國民也。抑彼等日本人者，真乃不可思議之國民也，以彼之國於極東，與歐洲距離甚遠，一次往還非航行海上數十晝夜不爲功，乃距離雖遠，時間雖長，而日本人毫不介意，惟以吸收歐羅巴之文明爲務，不倦不息，不憚不滯，進步之速，令人可驚！凡人類所能思能行之事，彼等日本人亦思之行之，模倣而應用之，研究而發明之，其結果遂完全有速成的頭腦與手腕焉。自彼之脫離封建，改造君憲以來，不過五十年之短時間，而彼此短時間內，吸收歐羅巴之凡百文明，與彼等之固有文明相融和，而製造一種適宜之獨特文明，遂成爲日本的新興文明焉。夫歐羅巴人冒非常之危險，受極大之困難，需五百年之長時

間，悉心經營，始有今日，彼僅僅五十年間，而軍事經濟學術種種方面，以及其他凡百文明的事物，無論外形，無論實質，已均有駁駁焉凌駕歐洲之氣象，則再繼以五十年之經過，其進步尚堪設想也耶？其爲患尚堪設想也耶？（註九）

這樣，他的態度顯然不是所謂「日本的親友」，且很露骨的憎惡日本；他在中日戰爭之後，即提倡有名於時的「黃禍論」，（註十），也會變動過世界的聽聞，但後來他的論調似乎又有改變，如說：

「日本者可憂可懼之國，而實不足憂不足懼之國也。朕自中日戰爭時以至日俄戰爭時止，其間頗憂懼日本之強盛，或以外交手段，或以軍備擴張，常對於日本而威嚇之，牽制之，壓抑之焉，然自日俄戰爭告終，朕乃恍然於日本之爲日本，而憂懼之念頓釋，朕實感激神，朕實深謝神，神使日本與俄開戰，使朕得知俄國陸軍之真價，而同時又與朕以研究日本真相之機會，使朕憂懼日本之念，蕩然一掃而空也。朕當日本與俄宣戰之時，以爲日本誤算俄國之國力，恐不免爲俄國所敗，而孰料俄國之轉爲日本所敗也？朕以爲日本真爲可畏，而益信黃禍落於白人頭上之真不遠矣，既而思之，朕真杞憂也！朕之軍國主義，若固執而始終不變，則無論現在，無論將來，日本終不能偏強，何則？日本雖戰勝於曠場，而最後終歸敗北，蓋於此一役，日本已暴露其兵強國弱之真相於列國之眼矣！不觀夫美國總統盧斯福之斡旋，而議和於樸脫毛斯乎？俄國全權大使維脫與羅森之言動，何其傲慢？而日本全權大使小村與高平之態度，何其戰戰而就兢乎？俄國爲戰敗國乎？抑日本爲戰敗國乎？何其態度之不明瞭乎？日本之態度，與其曰溫柔，何如曰懦怯乎？縱不爲哮虎，何乃

爲馴羊乎？其談判之經過，與和議之結果，日本所欲得之價金，何以不名一錢乎？渺小之薩哈連島全部，何以欲割讓而不得乎？戰勝之日本，何以對於戰敗之俄國，絕無戰勝國之主張，遂巡退步以繕結條約乎？朕乃恍然於日本之所以爲日本矣！日本者，兵強而國弱者也，始如脫兔而終如處女者也，前爲虎頭而後爲蛇尾者也；以日本之兵強，誠爲可怖之勁敵；以日本之國論，則一易服之弱國也，朕何憂乎？朕何懼乎？……」

又說：

「朕決心必與日本一戰，朕深知日本之實力，朕深知日本不能送百萬之兵於戰線，爲有效之活動；就財政狀況而論，日本決無一等國資格，若戰爭繼續至二年以上，則日本之軍隊雖精銳勇敢，而因財政之窮乏，終不得不屈服；日俄一戰，日本所受經濟上之打擊，其恢復之難，遠過於俄國，俄國十年可得恢復者，日本須十五年，或二十年之長時間而後能恢復；日俄一役，以不滿二年之短期戰爭，日本之軍事財政已陷於極度困難之狀態，俄國若再耐忍半年，繼續戰爭，則必收降服日本之好結果矣。故朕已決心，早晚與日本一戰，但今後十年二十年間，日本不敢言戰耳，何則？彼有鑒於與俄戰爭所受之重傷，醫療如此其不易故也。彼將欲與外國開戰，彼之設想必綿密，而用意必周到，彼非若俄國人之過信自己而誤算敵國者也；夫以我德國之爲世界第一大軍國，又以經濟上軍事上及一切學術商工業上，彼日本均不如此，常有一二級之大距離，彼日本豈不知之，而敢輕易與我挑戰乎？彼不得已而與英國結同盟，朕毫不介懷，朕毫不因此而息其極東經營之念，無他，以英國之不足論，更在日本下也，彼

英國妄自誇爲世界第一海軍國，世界第一商業國，此特如紙糊之大砲，使人遠望而威嚇之耳，若真至接戰，則殊令人失望噴飯也。朕深知日本之不足懼，朕又深知英國之不足懼，彼等若果妨害朕之極東經營，侮辱我德國之權利及名譽，則朕已決心，惟有迎頭痛擊之一法耳。朕以此決心經營極東，彼區區之日本，何足爲患哉？……」（註十一）

他這樣的「好大喜功」，以「日本通自命，他似乎忘記了他的「大德意志帝國」在幾十年前還不過是些「分崩離析」的蕞爾三百餘個小邦，人民也只是像我們中國各自私其鄉里，不知「國家」為何物的一樣散漫無組織，惟因有了「羣君賢相」，纔想得種種「救亡絕續法」以「起死復生」，成爲一世之雄！曾幾何時？他因迷信武力萬能，甘爲歐洲大戰的「罪魁」「戎首」，於是不惟在極東的日本因「英日同盟」的關係就在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舉兵進攻青島及德國在南洋的殖民地，這還是「自作聰明」的威廉第二的「始料之所能及」？並且在歐洲方面，德國方面支持了好幾年的苦戰，其全國人民受着飢餓封鎖的痛苦，簡直不能以言語文字來形容，勝利時信念早已經消失，許多人甯願「恐怖」的終止，不願無終止的恐怖，魯登多夫與興登堡等「手握兵柄」的人亦以爲軍隊無望的掙扎，與國內政治的紛亂，同盟國的崩潰，都使德國只有講和爲唯一的出路；這時法國竟得出了一肚皮的污氣，報復了多年的「夙怨深仇」，當德國政府所派遣的休戰委員會到達福煦元帥的大本營的時候，福煦將軍要求德軍在十五天之內退出法國北都及比利時與亞爾薩斯洛林，又要求德國交出完好的五千尊大砲，二萬五千枝機關槍，三千尊迫擊砲，一千五百架飛機，五千個火車頭，十五萬鐵道車輛，五千載貨汽車；馬上交出所有的潛水艇及六隻新式裝甲巡洋艦，十隻戰艦，八隻小

巡洋艦和五十隻小雷艇，德國的委員最後只得在福煦元帥的花車裏簽訂了「停戰協定」，（註十二）這真是古書上說的「強梁者必遇其敵，善戰者服上刑」了！那時「人心怨戰」，不只德國爲然，英美法等「協約國」也屢次聲明他們所打倒的並不是德意志的人民，乃是所謂「普魯士主義的」「軍國民主主義」，假如德國人民能夠自動的放棄這種主義，或打倒這種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制度，協約國就很願意與德國訂立平等的條約，共立國際聯盟，以圖建設一個更光明的世界。這裏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德意志的「衛瑪爾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 果然把所謂「普魯士主義」的「軍國民主主義」全都一掃而空，同時並把世界上最進步的平等自由的學說也全都攔進去了，但德國代表在巴黎凡爾賽宮被逼簽字在那本結束歐戰的「和平條約」，其殘酷的條件並不見得減輕，德國人應該怎樣的灰心失望？加以這次大戰，德國境內始終並未遭蒙浩劫，所以德國人民就是到了現在，也仍然是「好戰而不畏戰」，又得怪傑希特勒振臂一呼，自然如風行草偃，淒厲無前，日日都在「兼弱攻昧」，「取威定霸」，使英法諸強，無一夕之安！真所謂「彼此相報」，「後忿深前」，將來還要互相殘殺破壞到什麼程度，實在是「匪夷所思」了。

至於日本，向來就祇受到「戰爭」的利益，從未嘗過「流離失所」的痛苦滋味；如在甲午一役，擊敗清廷的北洋海陸軍，就得到「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列島」的土地，又得到庫平銀二萬萬兩，真不只是「名利雙收」。日俄戰爭一役所損失的雖稍多一點，但在外國的境內，也是「眼不見，心不煩」，何況又在就謂的滿洲打下「牢不可拔」「根深蒂固」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基礎。某外國人曾說：「明治末年確是日本內政的黃金時代，但歐戰一起，軍人政治家就將國軍無目的的濫用。最初就是獲取青島，繼之對西比利

亞出兵，後來又是兩度的山東出兵，這都不是國家的運命關頭，而軍人隨便運用牠的武力以求獲得一部分利益。……關東軍的任務，本在維持沿鐵路附近的地方治安，而軍官們卻在那裏創造牠的政治外交行動，兩個師團每兩年調換一次，於是滿洲這個區域，就變了軍人自由活動的養成所。關東軍之外，又加了天津駐屯軍，更子軍人以一個自由活動的機會。……」（註十三）本來這也是難得的，日本關東軍在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三四天以內就能夠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造成一個佔領東三省南部的「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 其計劃的周密與行動的敏捷，使帝國主義的「老手」「前輩」望而驚嘆，「自愧弗如！」（註十四）而日本民間仇視中國與世界的一般愛國情緒也繼續增高，異常囂張，秘密的組織紛紛成立，暗殺「老成穩健派」的事就層出不窮。如民國二十一年井上準之助藏相即遭毒手，銀行家團琢磨亦步後塵，犬養毅首相並因阻止「滿洲國」成立而喪失生命，某評論家曾記載日本當時情形如下：

「吾人今苟將最近日本之報紙雜誌走馬一觀，則日本國內，似已在戰時狀態，毫無容疑。按好戰論充斥全國現象，吾人除於德國見之外，殆無一國如日本之顯露無餘。」

從中日民族性上的異同來推測兩國的前途

李仲鈞

上期筆者已將兩派雖承認中日民族性有許多差異而將來總有一天提攜合作的可能，與及悲觀的或膚淺的論者以為中日永無「變仇為友」的意見都略加述敘，但所謂中日民族性的不同，究竟在那些地方？從來關心東亞大局的人，似乎都不曾對於這個根本

日本全國之報紙，無論何國，不為軍隊演習之照片所充滿，即為少女練習射擊之像片所佔據，大部評論，不云某國為日本之威脅，即曰某國為日本之阻礙，求一放大眼光，為世界人類幸福計而下樂觀的判斷者，非渺乎不可得，亦寥寥若晨星。

目前之日本，正與「神的信念」結不解緣，而此種「神的信念」則始自一九〇五年日本獨自以其兵力戰勝白人國之一之帝俄，自是以後，日本某有名大學教授嘗謂：「日本民族已居於現實神化之生活之地位，且負有神之使命。」按某大學教授之言，蓋不僅為其個人之信仰表現，即日本人中之信仰，亦莫不如是。且正唯日本人之信仰，俱與某教授相同，故今日之日本，方呈現其狂亂好戰的態度。

前任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將軍嘗謂：「苟有妨我進擊者，我即毫不假借，予以致命之打擊，使無求助之可能。」……海軍中某將軍亦謂：「苟有不利於國本者，則日本不問其為何國，均於征討防礙和平及剷除生命線威脅之名義下，予以一擊，使之崩潰」……」（註十五）

的問題下過一番精細縝密的深刻工夫，筆者兩年來因「國難」家難「交相煎迫，弄得「孑然一身」，平常所搜集關於此方面的種種資料，都獻給於「戰神」的「祭壇」之前，現在勉強憑記憶及思慮所及之處擬出個「大綱節目」，將來若竟引起專門家的注意

，作更進一步的探索，那麼此文自然只有拿去「覆醬飯」的價值。而筆者「拋磚引玉」的一點希望，也就實現。

在着比較中日兩民族性同異之點以前，首先應該知道的事即爲：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日本人？這都是很難解答的兩個問題；有位著名的作家會說，在論述一個國家的時候，我們不能忽視了普通人。個別的說，普通人雖然算不得什麼，可是集體的說，他們對於國家大事及世界的大勢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和影響。這樣看來，那麼誰是中國的普通人呢？除了文化上的聯繫和影響之外，中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在性情上，體格上及習慣上所表現的差異，就如同歐洲的地中海人與北歐民族的人所表現的一樣。北方人是思想簡單，生活刻苦，體格高大，樂天知命，喜歡吃蔥蒜，愛說笑話。但在揚子江的南部，我們遇到的人就不相同了，他們習於安樂，善於詭辯；男子短小，女子瘦弱，會經商，富有文才，但是胆小如鼠，別人的拳頭還未打來，就會嚇倒在地上，哭着叫爺叫娘。在珠江流域的廣西人却又不如此，他們的多數是精力豐富，會吃會做，無憂無慮，揮霍無度，性躁好鬥，同時富於冒險性，進取心以及創業的精神。這些話或許太過於「庸俗隨便」，若從人種學家的專門立場看來，所謂「中國人」都是屬於「蒙古利亞種的南系」(Pacori, Southern Mongoloid) 根本沒有什麼非常顯著的區別存在，不過以舉北人民的體質一加比較，北方的體格當然高大一些，頭形也長了一些，臉面也很是不短而且膚色較白，這種差異的原因，「環境說」還不能解釋得很圓滿，大約是由兩方都攙混得有外族的成分吧，如北方的人民自然和突厥蒙古通古斯等族有些血統上的瓜葛淵源，南方的人民則又受西藏人安南人日本人以及古代的先住民族的影響，或者還與馬來人發生過關係。讀者諸公，你們試想所謂「中國人」這個名詞，其含義是怎

樣的複雜？而要一一列舉其民族的特點而不至「掛一漏萬」，真不是一樁很安易的事呢。

至於所謂「日本的普通人」，在中國一般老百姓的眼光看來，那就是長生在西洋大海裏「區區三島」的黃色侏儒，他們有的穿着與和尚的「圓領大袖」差不多一樣的衣服或穿着短小的西裝來華經商遊歷，又或背槍帶劍，耀武揚威，使任何人都要「退避三舍」。其實日本人口的總數雖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除掉把朝鮮台灣不計算在內，日本人來源，據學者的研究：一部分是屬於所謂「滿洲高麗型的」，這些人多見於上流階級裏邊，其膚色較白，軀幹較高而瘦。面長，顴骨不高，鼻極彎，胸部較狹。此外的一部分是屬於「蒙古型」的，軀幹較爲厚碩，面闊，顴骨高，眼睛很斜，鼻子既扁，且有一張大嘴；又有一部分是屬於「馬來型」的，身體矮小，臉盤很圓，鼻子短，顎及頰常常突出。他們的進入日本，大約滿洲高麗人是來自西方，蒙古人是來自南方，馬來則自東方；演進到了現在，他們已有一致的特徵，即除少數的例外，日本人的平均身長一·五八至一·三九米之間，而體特別短，額平，兩眉距離大，鼻小，鼻孔向上，體格活潑而強韌，眼不甚斜。有的人說，從日本人的習慣，諸如洗澡，衣服，飲食，居住來看，日本人種無疑的是從南方移去的，其間當然也有一部份從北方——中國的東北與高麗的移民，但這並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風格，在日本是看不見的。事實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能接受。北海道爲日本國土，經過五十年的開拓；滿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來她可以自由移民，但統計數字的雄辯，確實告訴他們，日本這種移民企圖已經怎樣的失敗，日本人怎樣的不願到北方去！這樣看來，日本人的民性豈不完全和中國南方人沒有兩樣嗎？筆者敢答覆道，話雖不能這樣肯定

，但也許是「大同而小異」吧。

提起「民族性」來，我們又必得把「民族」和「種族」的區別弄得清清楚楚；按「民族」的型成之基礎是兼「政治」與「文化」等方面而有之；「種族」的型成之基礎則只限於「生物」方面。例如幾個不同的「種族」，因發生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關係即可構成爲一個「民族」，歐洲所謂的「德意志民族」，不是包括着許多「北歐種族」，「斐爾種族」與「東歐種族」嗎？「中國民族」不是包括着漢，滿，蒙，回，藏苗等種族嗎？「日本民族」不是包括着「大和種族」與「高加索種族」的「蝦夷」等嗎？再詳細的講，型成一個「民族」的最重要的基礎總不外是些「地理的」，「生理的」，「政治的」與「文化的」因素；地理的方面，如一國的領土，最好是有「自然的疆界」；中國的面積約佔亞細亞洲的四分之一，而大於歐洲的全洲；全世界陸地面積五千二百萬英方里，中國就佔了百分之八，故以版圖的大小而論，中國已穩坐着第三把交椅，那頭把交椅當然是讓着「船堅砲利」的大不列顛帝國去享受，第二把交椅就是以「貪得無厭」「巧取豪奪」著名於青史的「北極熊國」的俄羅斯爲其主人；不過，大英帝國所統轄的各部分都極爲散漫，僅賴強大的海軍以資維繫，近年歐洲出了德義兩個獨裁國家和她「問鼎於海上」，她的「世界第一大國」的榮冠，不是已經「岌岌可危」嗎？我們真替她時時都在担心；至於俄國在黑龍江下游的領土與其歐洲的本部雖賴鐵路和航空利器以資交通，但相隔實在非常遼遠，不像中國是集中在完整的大陸之上，且其西南有喜馬拉雅山爲界，西北有阿爾泰山爲界，北有黑龍江爲界，東有東海，南有南海，這些差不多是「天造地設」再好沒有的界限；又自上海到美國的紐約或英國的倫敦的程也大略相等，即各爲一萬餘海里，真是在世界地

圖上都佔着最優美，最理想的位置。日本的領土包括日本列島（計三大島與一個半島及將近四千的小島）和朝鮮台灣等地方，總面積約爲四萬三千六百方里，（日里每一里合華里六里），所以只等於中國的總面積的百分之六；若就日本的本部來說，也不過只有其總面積的三分之一而強，惟地勢狹長，好像亞洲的防波堤一般，因其形勢險要，故日本人都以從來沒給人征服過自誇，可惜平地絕少，生產不多，火山脈遍於全國，地震時所恆有，在世界各國裏惟義大利國可與她「東西輝映」，真是「得天獨薄」，惟氣候很是溫和，風景又稱奇麗，經六十年來的經營奮鬥，竟由蕞爾的小邦一躍而成爲東亞的頭等強國，且因獨得西太平洋的「形勢地利」的原故，其海軍的實力竟爲烈強所懼，故在研究構成中日兩大民族的基礎上面，「地理的因素」實在是再重要沒有的了。

其次，「生理的因素」即所謂「血統須最好相同，相同的程度愈大，則凝固力愈強。」上面已略爲提及中日兩民族體質上的特點，現在還可以補充上幾句。中國雖有漢、滿、蒙、回、藏、苗的六族不同的名稱，但在生理上或血統上並無很爲顯著的差異存在。林惠祥氏所著中國民族史曾列舉公例數條如下：

一、中國民族之成分甚繁雜，黃種中之各大族大牛有之，白種黑種亦有一小部分。

二、中國之民族雖多，然有日趨混合而成一族之勢。

三、中國諸民族係以一系列爲主幹而其他諸系以次加入之，加入後其名稱即銷滅而祇用主幹系之名。

四、中國民族之同化次序如波瀾狀，一起一落。初兩民族以上相接觸時，戰征會盟，擾攘一時，終於混合同化而歸化於平靜。迨舊民族同化方畢，新民族又來臨，於是又

擴張一時，復歸同化。如此一波一瀾，繼續無已。

五、中國之主幹系即華夏系，其初亦非大族，由屢次加入異系之成分而逐次擴大其內容。

六、華夏系每擴大一次即改變其原質一次，故後代與前代名同而實異，今日之華夏系非復明代之華夏系，明代之華夏系亦非唐代之華夏系，唐代之華夏系亦非漢代之華夏系，漢代之華夏系亦非太古之華夏系。

七、今日之漢族所含成分盡有匈奴肅慎東胡突厥等，故今日之漢族為各族所共同構成。

八、其他各族亦皆含有別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華夏系所含之複雜。

九、中國諸民族除特別情形者外，今後之大勢，似日趨於漢化一途。〔註一〕

這些話都是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研究我國民族歷史的「衆所公認」的結論。至於日本方面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日本的本部大概可以說已經沒有種族的問題了，從前在北海道還有二十多萬的蝦夷種族經日本淘汰和同化的結果，現在僅剩下一萬六千餘人；這個種族在日本古書上寫作「毛人」或「蝦夷」，他們屬於人類的何種何系，起源於何朝何時，因無文字記載，所以大家都不能明瞭。據現代百科全書說他們的體質與澳洲的土人相近似，也許還是白種人的另一支派，此時都無定論。他們賦性固執，又極端的迷信，所以「振古如斯」，毫無進步。以生活而論，除掉一部分尚能保持原來的習俗而外，大多數便全都接受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文化而論，現在的蝦夷兒童都須送入日人所辦的小學裏去，成人也得懂得日本的語言文字，這樣的結果，即是從前的蝦夷固然沒有文字，現在却有日本的文字；年紀較大一點的人

尚能說些蝦夷舊有的話，至於少年小孩只知道講日本話。這樣，在日本的「大和種族」與在中國內「漢族」的情形有些彷彿，換句話說，就是差不多完全成了「清一色」。中國民族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在血統上是相同的，世界上固然沒有一個偉大的民族，能有如此純淨的血統，而日本民族的百分比比例也許比這個數目還就來得高一點，但人口的總數却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在這些事實的上面，都和兩國的「民族性」的型成上有極爲密切的關係。

第三、「政治的因素」，即所謂在歷史上須有悠久的統一的政治組織。一般古代史籍都記載說，大禹曾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時仍有三千國，到了周武王伐紂，雖經兼併，仍有「千八百國」之多！還幸好周公能想出一種所謂的「封建制度」，然後始稍收統一的政治組織的實效。後來在「六王畢，四海一」的時候，秦始皇帝就建立起空前的世界大帝國，即從那時算起，直到現在，中國統一的政治組織的歷史，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在環球上也尋覓不出第二國家能有如此悠久的統一政治組織的歷史。所以在明末清初的西洋傳教士的著作裏竟發現一篇序文，大意是說：「我們歐洲分做這許多國家，天天預備打戰，不是這國打那國，就是那國打這國；但是，看看中國的地方，其面積剛剛和歐洲一樣的大小，但是他們只有一個統一的政治組織，——即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所出的命令，沒有一處地方膽敢抗不奉行的。故其全國都很太平，足見他們的政治組織一定有一個特別的道理，我們西洋人早就應該做效而現在也還沒有學到。」這話說了好幾百年，但今日旅行歐洲的中國人，除了驚嘆西洋人的「萬能科學」與「物質建設」而外，同時也必感覺：這塊地方，竟分成這許多國家，說這要多少不同的話，用這要多少不同的錢，差

不多時時刻刻都要把護照放在大衣袋裏，不到幾天，錢包裏便也鈎舉行一個小小的貨幣展覽會；讀者諸公！試想沒有統一的政治組織的痛否？該是怎樣？在日本方面，天照大神以「日出之國」委諸其子孫，因之「爾障孫等善治國家」的神話的宣言，至今歷時凡二千餘年，尚爲上至大臣，下至與夫皂隸所崇信而未嘗或疑，故日本的統治權一向即在「萬世一系」的皇室手裏，政權的爭奪只限於「大將軍」爲止，除了妖僧引削道鏡河過「非分之望」而外，根本就沒有人覬覦皇位，惟自後曰河天皇保元（即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以降，「乾坤解紐，武士專權，爲政惟行苛法，刀鋸之下，冤恕忠厚之風，遂掃地以盡！」到了明治元年（前清同治六年）將軍德川慶喜因外受美英法荷的威迫通商，內又有薩士強藩的抗不奉命，威信喪失，懸付艱難，迫不得已，纔奉還大政，從此日本就恢復了統一的政治組織，日本的國運也發生一大轉機，這樣在「民族性」上有直接的影響，自不待言。

第四，「文化的因素」，誰都知道中國民族的精神生活，歷來即爲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學術所支配，其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儒道兩家，儒家對於上流階級武士的階級表面上是影響最大，至於道家可說竟和民衆生活打成一片。還有的人說，儒家的學術思想在治世的影響較大，道家的學術思想在亂世的影響較大；此外如墨家法家的主張，雖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在戰國時代以後，就不曾爲社會所普遍接受，影響自然很微。說也奇怪，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自來也援用儒佛兩家，從隋唐時起直到明治初年，政府仍明示國民道德的要領爲：孝行，忠節，和順，友愛，信義，誠實，仁慈，禮讓，剛勇，公平等二十個，同時並使儒臣詳加解釋。現在相隔三四十年，日本仍舊沒有失掉「儒教國」的氣象，她雖已升入世界列強之林而成爲遠東第一工業化的國

家，但社會上的風氣與習慣，處處均在一親親「一貴貴」「一尊尊」「一尚尚」，與中國「新舊衝突」「青黃不接」的混亂情形相反對，所以有些外國人很在懷疑，以爲日本的儒教來自中國，型成日本的「急公好義」的良好民族性，爲什麼中國人也奉行儒教，但却極端的「自私自利」，毫無一點做國民的責任心。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性質，大多數都是「外儒內道」，這就是說，在表面上好像儒家，實際受老莊的影響很大：例如說：「凡事不爲天下先」，這即是無責任心的滑頭們的一句「口頭禪」！况且又喜歡放浪形骸，不守禮法，如晉朝的竹林七賢，好弄玄虛，蔑棄典文，所過的生活，即完全是道家的思想表現。在他們的意思，以爲禮法是拘束普通人的工具，他們是不能受禮法的拘束的。到了近代，則以「使酒罵座」「盛氣凌人」爲斗方名士了。其實，從國家方面看來，「不爲天下之先」，就是巧於趨避，不負責任；放浪形骸，就是不守紀律；這類思想是萬不能流行於現在的。我們試一看看儒家的主張怎麼？孔子所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話，確是富有奮鬥進取的精神；又如一般真實的儒家都肯「以天下爲己任」，義務心也是很重。這樣就可見中日兩國因崇奉儒家學說的誠意的程度各有不同，而所影響於民族性的優劣，也就不能「一概而論」了。

從以上所論看來，本文所謂「中日兩大民族」。即是指那些國特殊的地理的，生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而構成東亞的兩大人羣而言；這樣故「凡中日兩民族各自比較固有的特性，與情操，信仰及習慣的總和」，即爲「中日兩國的民族性」。

（註）中國民族史上册第三十九及四十五頁

藝文

旅日印象記

(續)

東西南北人

五二

五、衣食問題

到東京後住房子的困難與麻煩，在上一段已經說過算是解除的了，但別的事情的問題還是很多，衣和食不過是比較的重要急切一些，所以應該先提出來說一說。記得在明朝初年，日本的使臣嗜哩嘛哈親見中國皇帝曾吟詩一首道：「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這樣看起來，日本人還穿戴着唐朝式樣的衣冠，那麼我們中國人去了豈不太方便嗎？事實上却大大的不然！假若你到了日本還照舊穿裳子和馬褂，或則你是個女性的話，穿上旗袍，困處斗室，還不礙事，一出大門，便有許多男女小孩，追隨左右，寸步不離的信口亂罵着：「馬鹿的（即愚蠢的）支那人！」「支那搶各羅」（Changso 譯音——據說是中日在甲午戰爭時縫製出以詬罵中國人的名詞，所以大有仇敵的意味。）「即平常彬彬有禮的人民要看見你這樣的裝束打扮，他們臉上當時也就流露出一副鄙棄厭惡的令人不能忍耐片刻的神情；就是一向非常自尊而儀表也極莊重的海陸軍人，只要在街市或車站等公衆場所，有你這一個穿着華服的人出現，他的炯炯的兩眼就對你表示一些輕薄之意！」——尤其是身穿旗袍，腳踏高跟鞋的時髦姑娘們，更不免受辱。原來日本從明治四年（同治十年）政府頒行過「散髮脫刀」的命令，朝野上下都已改穿西裝為原則，所以「衣冠唐制度」的國家已搖身一變，成為東亞的「洋人」了，怎麼還看得起你這個老腐敗的中國？記得周作人氏道

憶清朝末年他去日本留學時候的光景說：「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裏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爲了這個理由，我們覺得和服（即日本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馬褂在民國以前都作胡服看待，在東京穿這種衣服即是奴隸的表示，弘文書院照片裏（裏邊也有黃軫胡衍鴻）前排靠邊有楊哲子的袍子馬褂在焉，這在當時大家是很爲駭然的。我們不喜歡被稱爲清國留學生，寄信時必寫支那，因爲認定這摩阿貳那，「至那」以至「支那」皆是印度對中國的美稱，又佛爾雅八釋木第十二云：「桃曰至那，漢持來也。」覺得很有意思，因此對於支那的名稱一點都沒有反感，至於現時那可憐的三上老頭子要替中國正名曰支那，這是着了法西斯的悶香，神識昏迷了，是另外一件笑話。」按世界上過度蔑視所謂「馬褂」「長衫」「旗袍」的不只日本人爲然，歐美又何嘗不是如此？那位在咸豐同治年間鑪錘雄奇好遊的王韜氏在最初到了英國因穿着支那服就被人誤猜爲是中國的一小姐」「太太」！他所作的漫遊隨錄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西人率短褶窄袖，余獨以博帶寬袍行於市，英國北境重稱未觀華人者，輒指目之曰：「此戴尼禮地也。」「否！或曰：詹五威孚耳。」呼中國曰「戴尼」，其曰「禮地」者，華言「婦人」也；其曰「威孚」者，華言「妻」也，時詹五（按爲安徽人，身絕長，爲英僑挾去，供人觀覽）未去，故有

是說。嗚呼！余本一雄奇男子，今託足異邦，甘爲雌服，聽此宣言，詎非終身之讖語哉？……」

這種可笑的，弄得「陰陽顛倒」，「撲朔迷離」的錯誤，幸虧在僅隔「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鄰邦日本還不曾發現過；惟筆者很佩服在光緒初年清廷所派遣駐劄歐美日本各國的那些出使大臣和參贊隨員們竟不怕西人的侮辱，穿着西人所謂爲「女性的衣服」出洋！他們在表面上是享受國際公法上的「治外法權」，在事實上却是「一肚子兩肋巴」的污氣！試看劉錫鴻的英報日記有說：「隨員張斯枸之跟役入市採買，路遇本土醉人以戲戲擊其額落帽。」崔國因出使美日記也有說：「紐約華人竟不是徒步出門，出門即必有環而噪者，甚至拋鞭，故紐約領事署人員皆深居簡出。」說也奇怪，直到近年，在交通利器已逐漸改良，且時時有新發明的進步極爲神速的期間，那號稱「世界樂園」，「寶至如歸」的瑞士國還有一椿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件，如宋春舫氏所不勝憤懣的敘述他在日內瓦的遭遇說：「瑞士的狗，本來不多，所以村犬亂吠，倒也罷了，可是接着便來了四五百個小孩子。那羣小孩，越聚越多，起初遠遠地站着，指手畫腳，有時扮一個鬼臉，口裏不住的喊道：「你們快來看中國人！」一頭喊，一頭便跟在後邊走，唱道：「請！請！請！中國人到東京……」（據說是法兵在安南唱的行軍歌。）最近第十五期論語載有倫敦竹枝詞

「一隊兒童拍手嬉，高呼『請請萊尼斯』；童謠自古皆天意，要『請』天兵靖島夷！」（原註：英人呼中國人曰「萊尼斯」，凡中國人上街，遇一羣小兒，必皆拍掌高唱曰：「請請萊尼斯」，不知其何謂也。）

倫敦竹枝詞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出版的，作者亦有同樣

的經驗和感慨，可以證明我道不孤了。……我當時穿的面裝，回想中國人拖着辮子的時候，當然更容易惹人注目，更爲難堪。可是辮子去了，中國人却依舊是中國人。在歐洲各國，外國人見了我們，總當作動物院中的猩猩拂拂和南非洲班馬一般的看待，這究竟是什麼緣故？有的說，中國人穿了西裝，沐猴而冠，太自然了，所以……有的以爲中國人日本人一樣，身材矮小，臉色黃，滿臉的病容，所以容易使人注意。我却以爲最大的原因，是中國人和西洋人面部上五官的位置，太相懸殊了。記得我有一位姑母，那老太太向來不大出門，有一天，我忽然問她對於西洋婦人的容貌，有何批評？她說：「外國人麼？他們的面孔，沒有一個不像一只叭兒狗！」西洋人隆準平額，黃碧碧眼，中國人呢？額角平削，鼻子是又低又塌，兩額突出，唇高於鼻。現在美國姑置不論，我們中國人的五官位置，和歐洲人平日所習見的，相差太遠，有時竟背道而馳，如何不惹注目呢？況且中國人，到歐洲去的，比較到美國去的少，少見多怪，事理之常，尤其是小孩子，好奇心更重，他們斷不肯輕易放過我們！」在日本就算有些很荒唐的人羞與華人爲伍，既否認和華人同屬一族，甚且更進一步主張日本民族與蒙古種亦無關係，但這些都不過是在某一時期爲某種國際政治上的方便纔出此「違心之論」，事實上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一樣的是額角平削，鼻子又低又塌，身材矮小，臉色黃黃的；中國旅日的人，不論是男是女，只要穿上「西服」或「和服」，便可冒充一下東洋人，隨便到了什麼地方，絕對不會有人注意，但要強迫中國人易服，實在有許多最容易感覺不方便之處，——尤其是在女性方面，伍廷芳博士曾痛論「西服」的種種缺點與所謂「支那服」的不可一筆抹殺的優點，他說：

「……人類之有衣服也果何居乎？以余思之，遊藝煥爲第一義

，求安適爲第二義，合儀式爲第三義，形式美觀爲第四義。今美人之服式，其果合於以上諸義耶？第一，以氣候言，美國女子之服，爲能避寒氣耶？受寒而致疾者，日不知其凡幾？因亦有致疑其衣服之不良者。全身所被，厚薄不勻，時俗所向，上部恆若裸體，即有所服，其薄已甚，微風乍起，或天氣驟更，苟非體質健全，足抵禦外界之危險者，鮮有不足以缺乏衣服之故而感冒寒疾，是非特不能保護，且并足傷害其身體焉。下所引倫敦太陽報之說載，實足爲女界之警鐘：「勃羅特福特之暴風，其結果乃致一女郎暴死，女郎名馬利倍雷，爲某電機師之女，年十六歲，肄業於漢孫中學，當暴風起時，適在校外場上，狂飈捲地，吹衣裙作兩傘形，因舉入空隙，離地約二十尺，始行下墜，受傷甚重，半小時後，即行斃命云。」設此不幸女子而服中國衣者，可決其免此危險而不致虛擲其生命於無爲也。由第二義言之，服時行之衣者，又未見其能安適也，普通婦女所御不衷之服，姑不置論，即以束腰之腰圍言之，束縛腰支，氣逼不舒，甯特去安適之義甚遠，且至不便，簡言之實不殊爲永久之桎梏，而致害身體之健康，故荷腰圍及束縛腰支之具除，則美國婦女死亡之率，必可大減，世之醫學家，當不河漢斯言。且余嘗聞跳舞室中有因束腰過緊而致孕婦於死亡者，是則尤束腰直接之害矣。以言第三義，美之時服又未能雅合乎儀式也。「此言美國，實已合歐洲各國，蓋歐美固同式也。」此或係於教育之故，若自東方人觀之，則女子衣服，以寬爲上，庶形狀不致高聳可異。……以言第四義，衣服爲美觀也，然美觀要以無害爲主，不獨求服之者己身之無害，必亦求無害於他人，然由下引日報之文觀之，則美之服式又未必然也，五月初

七倫敦日報，昨日浙歇埃省某股票商之女，因帽針穿入鼻管，傳染血毒而亡……夫戴項圈，佩寶石，珠飾滿頭，綉帶結髮，此誠足爲適觀之美飾，若長裙曳地，則美於何有，然歐美婦女，別有見解，其美麗之觀念，恆若以裙之長短爲比者，跳舞宴會之時欲不觸及婦女之長裙，蓋大屬難事，若衣禮服時，尤須以二侍者夾持衣裙，此誠爲東方人所大惑不解者也。……吾國留美女學生某某，當其在美國時，亦易美服，追一回国，即衣本國之衣，其評論西方之文明曰：「吾人服中國之衣，並非膠守陳見，以中國衣服與歐西各國較，於理自有較勝之點，譬如吾國女子所服之襖，開其一邊，肢體皆可自由行動，毫無束縛之病，較之巴黎時行之裙其安適便利，自不可同日語，故設歐西服式而有便於吾人者，吾人亦不難舍己之短以從人之長也。……女子之服，固如此矣，而男子之服，亦不能較高於婦女：式樣狹小，緊縛身體，使服之者受過分之熱氣，暑熱之症，大率因之而起。……由余之經驗言之，當余初至英國學律時，亦因英國友人之敦促，棄華服而易西裝，然未幾即覺其不便，冬日過薄而不暖。夏日過緊而太熱，所穿草履，困余尤甚，足指磨而既疣生，迨至回国，易余故服，既疣盡去，寒疾亦不作。余非謂中國服制完全無缺，特以余之見，較之美國時行之式，不獨安適且更美觀，即於世界各國衣服中亦當首屈一指，若有疑余言者，苟一試服，當信余言之非謬也。……」

又說：
「文明之人，無不有衣服者，故言文化，不可不及衣服，然余於前章已專論之，故此僅引英女士尼古拉斯夫人之說。以實之。尼古拉斯夫人評男子之服爲不美觀，而其精神之所在

，則專注於女子之衣。……然西方男子之服，其弊病又不亞於女子之衣也；領高且硬，衣狹而小，終年束縛，不聞寒暑，其不安適為何如？四季之衣幾爲一律，寒溫帶所行之式，在東方酷熱之暑時，亦不知變，斯誠大可異也。暑時所服之衣，余實未見其大變易處，寒暑表溫度在八十至九十度間時，余見其所服之衣爲襯衫一，背心一，外罩一，外罩之厚，雖不如冬季所服，然仍爲羊絨呢絨等不合宜之物質，無論熱度如何，市衢行人，鮮有不衣外罩者？此所以中暑猝亡等事，時有所聞，而中國，則幾乎並病名而不知也。（原註——中國工人操作烈日下因中暑熱者雖聞有之，然亦甚少）。中國衣服隨天時而變更，自重裘以至單葛；嚴冬之際，有重裘棉衣，入春則易輕裘薄棉，至夏季則有絳葛絲羅之屬，以天時之寒暖而迭相更易，式制亦因時而變。……歐美各國，每年因衣服不適而致疾病以至死亡者，爲數必甚巨，特醫生於病狀上，斷不敢謂死者之病，乃造因於衣服之不宜也。二十世紀爲強權之世界，強權即公理，世人亦已盡知之，即於服制上，其現狀亦如此也。以公正不偏之眼光觀之，男子之衣詭譎，而女子之衣拙陋，然以歐美各國皆同此衣，強權展其勢力，東方人民因亦有舍其國服而習歐美之陋習者；設歐美之制，即不能較勝而可同於吾之古制，則其改之也，猶曰爲一軌故，今利害相反，彰彰若此，而猶盲從，此何故耶？抑世界何故必取此卑下之制爲共同之式耶？吾國人又何所取而必自消其優美之國服耶？在昔留學生之返自歐美者，一履國土，即易本服，蓋苟仍西服，國人且習爲半夷鬼也。自一千九百十一年共和肇建以來，此風頓變，陋觀之西裝，不以爲可鄙，而以爲時尚，不獨通商大埠，外人居留之所，奉

爲時行，即內地僻邑，始終未見異服者，亦靡然有從風之勢。……自多年以來即被外人輕視侮蔑的「支那服」，經伍氏一加開揚，其真正的價值當爲一般人所承認。我們非常痛恨在歐美日本各國現在還有很多以穿服青布長衫，大呢馬褂的照像，圖書，模型等等方法來侮辱中國的人，所以我們在本國尙未恢復「平等地位」以前，出洋遊歷或留學，不論到所謂西洋的歐美或東洋的日本，暫時都以穿着「西裝」比較適宜一點，即伍氏的主張也並非趨於極端的守舊者，如說：

「……余意外交人員出使異國，及遊歷外國之人，爲免惹外人指目及歸於一律故，可易西裝；國內人民其有願爲此鄙陋之變更者，亦任其自由，惟不能強迫願於冬季受寒夏季中暑之人使遵之爲國服。……中國衣服之較於泰西文明各國也，爲舉世所皆知，其晚近服制之改革，亦爲多數久居中國之西方人所深惜，下文所引，爲旅華某西人所著，載諸上海日報者，實足表示一般有識西人對於問題之公意：「中國近時諸大改革中，服制亦爲其一，毅然棄去其寬博之國服，而採用西式，實足引起全世界之歡呼，街談巷議僉云中國真文明矣，各國人民亦莫不佩服少年中國之毅力，謂以欲列入文明世界故，不惜採用不安適不衛生之服制。……中國服制將來當然與高加索人同式，然余則甚爲中國人惜，服寬博之古制，何等安適美觀，堂皇合度，而忍遽令絕跡，且以余觀之，中國之所重於改革者，要在服制一端也。……」這些話說的都很對，所以我們中國人當敬告全世界各國家，尤其是日本，所謂「支那服」並非即是腐敗，文弱，貧窮，污穢的象徵代表物，其自身的優點，實有非「西裝」與「和服」所能趕得上的。在此事未得歐美日本普遍承認以前，我們出洋遊

歷或留學，自以穿着「西裝」較為方便。說起在日本穿西裝根本就沒有什麼困難，隨便在什麼城市鄉村都看得見「洋服店」或其他家庭定做洋服的商標廣告，尤其是規模較大一點的百貨公司，已經做好各色各樣的西服，真是「堆積如山」！而「高帽長套」的大禮服與白衫燕尾的交際服在中流以上的人家都應有盡有，甚至極普通的小商人們在舉行結婚儀式的時節也略備一二套，所以每逢新春拜年的期間，滿街往來的都是些穿禮服的人，不能不令人感到日本人摩倣西洋的普遍徹底。據多數人的意見，日本做洋服的裁縫的技術遠不及中國人，所以東京最繁華的銀座與橫濱的山下町等處都聚集不少的專以洋服謀生的華僑，他們不惟包辦本國人的生意，且已取得歐美人的信用。他們的衣服不惟在樣式方面要比日本技師做的好看，其材料的採用又以道地的英國輸入的呢絨為主，這樣在實施「保護關稅政策」的日本，其代價自然非常昂貴。我們這般自費遊歷或留學的人，時時都在打算盤，節儉得一文是一文，這樣就只有去百貨公司買已經做好的西服來穿，但日本人的體格與中國的南方人還有些相似，若北方大塊頭要買一套現成合身的西服，便有「踏破鐵鞋無覓處」的苦悶了。至於女性們的洋服，問題更多，且不講究什麼「晨服」「晚服」「夜會服」和那些什麼「乘馬」「登山」「遊海」「行獵」的「運動服」，即花幾十元買了一套普通的洋服穿上，而帽子的顏色式樣既成問題，手套高跟鞋也都得「備辦齊全」，以肢體比較瘠削，兩足又有纏裹的痕跡的中國女子穿着普通一般都是壯健粗肥的日本女子的洋服，當然不免有醜陋難看的毛病，何況戴帽脫帽另有種種的麻煩，因此之故，中國旅日的女同胞們，雖萬不得已而穿上一些「不倫不類」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究竟是歸入那一種的西服，但大多數都不喜歡戴頂「翻新出奇」「飄洒出塵」的帽

子，所以在日本的公共場所，若看見有穿洋服而不戴帽子的太太小姐，十有八九定是我們本國的諸姑姊妹，這與日本夢想學「時髦」的大姑娘們，雖穿上西裝而與高跟鞋壓根兒就沒有緣法，只見她們在公園裏的大路上走得很苦累的時候，就脫下高跟鞋在路旁站着休息一樣的令人好笑。伍廷芳氏曾說：「中國婦女亦如日本然，無傾向新服之意，此足表其普通知識，有優越男子之處，願余亦嘗見有二三愚蠢無知之少女，改作西方婦人裝者。」但旅日的中國人，若不改穿西裝，則一出大門就「逢人白眼」，可惡的頑童們又在大聲的喊着：「馬鹿的支那人！」「支那搶各羅！」若穿上洋服，麻煩固不用說，而因「經濟」及「知識」與「習慣」的關係，常常弄得「不東不西」，「非驢非馬」，真是件討厭的事呵！

「西裝」既不很便當，「和服」又怎麼樣呢？所謂「和服」大抵是根據中國而逐漸有所變革，成為今日中國人都知道的那種「圓領大袖」與和尚的衣服有些相像的衣服；女子的服裝也和男子們同一式樣，不過腰裏束着一條尺來寬的長帶，在背上打成一個大結。惟在事實上「和服」並不如此的簡單，張伯倫氏 *Robert Hall*

Chamberlain 就說過要對日本種種的服制一一都加以精細的敘述，那就得要有精巧的圖畫來幫助，這樣就可以成為龐然的一大鉅冊。日本某作家也曾很傲然自誇的說，英國人民平均只有四五套衣服，美國人民稍多一點，也僅有五、六套，惟日本人民却有十多套，可算是世界上最講究穿戴的民族。不錯！日本人「愛美成性」，衣服的綺麗漂亮，是非文字語言所能形容的，尤其如新娘子（日語謂之爲花嫁娘）與未嫁的大姑娘們，每當大地回春，櫻花遍野的時候，看見她們穿紅着綠，結隊遊行，簡直是些蝴蝶小鳥，令人目眩神搖。「和服」雖好，實用上却有種種的缺點，冬季

禦寒的力量且不及西裝，更不能和支那式的「重要棉衣」相比擬；夏季酷暑的時候，「和服」自比「西裝」來得輕鬆，但無論何時都得要束上那樣很長的腰帶就不免「熱不可耐」，使人想起此時若在國內披上一件稀薄絲羅的衣服，真是舒服自在像「義皇上人」一樣。此外如日本人兩足所穿的「足袋」，即是一種其深淺止於腳踝的「短統襪子」，不過因「大腳指頭」須插入「木屐」的絲繩帶子的關係

，所以和其餘四個腳指頭分開，據日本某「足袋收藏專家」所說，日本的兩隻大腳的自然發展，在世界上可穩坐頭一把交椅，筆者幾年試穿的結果，在冷天時却很溫暖，惟當體溫因「烤火」或「飲食」的關係而增加得很快，足趾間就發生汗液，一兩天不加洗滌即有臭氣，若向來就害得有很頑固的濕疹癬疥，因四個腳指頭緊緊磨擦的緣故，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幾乎癢得要命！雖有如「阿木靈」「妙特靈」等那樣的皮膚聖藥，也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至於那雙和「足袋」不能相離的木屐，即南史虞玩之傳所說「一履着三十年，莫斷以芒接之」的「屐」，也即是和古樂府「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完全是一樣的東西，惟現在的日本人都叫做「下駄」，拖着走了起來，不免有些聲響，所以日本的公共機關如衙門學校等雖然都是西式的建築，但也強迫穿着「下駄」人在大門口即須換穿拖鞋，以免吵得別人「耳根不靈」。又在「下駄」頭上的那根絲繩帶子不論拴繫得多麼結實，但日子一多，就不免在中途有脫斷的麻煩，那時真是「進退失據」「寸步難移」，大有「行不得也哥哥」的苦況。總而言之，穿慣了「支那服」的中國人對於「和服」所感覺的不方便實在爲伍廷芳氏所攻擊的「西裝」之上！尤其是女性方面，如果打算購置一套像個樣子的「和服」，最少也得要四五十元，何況還有那些以藍甲珊瑚製成的袴袴等也非買不可，這樣一來，一個華婦要從頭到腳，弄得活像一個「假東洋

婆」，其代價至少要在二百元以上；花了這麼多的錢，走起路來，衣裾還是包圍得很緊，使步行不能自由痛快，完全缺乏翩翩的佳趣，（男性的和服也是如此，）這豈不是「自尋苦吃」？嗚呼！中國人雖有「安適的支那服」可穿，但一出國門，即受盡烏氣，豈不大可痛哭流涕也哉？

中國人旅居日本「服裝」既成問題，那麼「飲食方面」又是怎麼一個情形呢？拿歷史的眼光來講，中日兩國的關係真是既深遠，又廣大，政治學術方面固然是這個樣子，宗教產業方面也是這個樣子，細微到一飲一食也是這個樣子，中村久四郎博士所著日華飲食物的關係與桃谷文治氏的從食品上所見中日文化的交流等文都在說：

「日本皇朝，公家的饗宴，一部分是採取中國的食品的，這事大概可溯自佛教輸入不久的時代。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二年（唐德宗貞元十九年），遣唐大使高野野磨，賜錢，設宴之事，一依漢法。嵯峨天皇弘仁四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宴皇太帝於清涼殿，具物用漢法。可以說在一千一百餘年以前，中國的烹飪法與烹飪用具，都已經在日本流行了。至足利氏的末期，日本和明朝的貿易交通，都非常繁盛。那時不但中國風的飲食隨處受着歡迎，中國的語言也流傳於民間。據海外交通史話所徵引的大內義隆記，某年派遣明船回國的一段記事謂：「遣唐船歸來日本之時，比諸天文八年八月中旬（按爲後奈良天皇年號，即明世宗嘉靖十八年）尤爲熱鬧，正副使慈眼院諸人用唐之茶飯酒宴，整夜娛樂，酒席之間，專用唐語。」至於餽頭食品之製法，傳開始自延元六年南北朝時代，那時由建仁寺第二世龍山禪師，元人名林淨因者，隨伴東渡日本，往奈良，改稱鹽潮，始作饅頭。（按延元爲後醍醐天皇

年號，六年適當元順帝至元七年）而豆腐之類，在應永年間，（按爲後小松天皇年號，約在明太祖晚年及惠文帝至成祖初年）已爲宮中膳食，名曰「卡俾」，有史的記載，在西歷十四世紀以前，日本採取中國食品之種類，已比今日所想像爲多了。

「從中國傳來的飲食，有以葷爲主的普茶和以素爲主的桌袱兩種，都是自長崎一直流行到大阪江戶來的，現在還遺留下似是而非的鹹饅頭，鴨南蠻等稱的食物。南蠻不消說是指茫然的異國風物的稱呼，即是南中國之意罷。「普茶料理」（「料理」即「烹飪」的意思）傳爲宇治黃蘗山萬福寺的開祖隱元禪師渡來長崎以後，爲禪師各種傳授當中的一種，不過那時隱元來日，始於承應年間。（按爲後光明天皇年號，約當明永歷帝時。）在宇治建立萬福寺，則在明萬曆年間，即三百八十年前之事。雖然，普茶料理流行於長崎，宇治的寺料理，亦始於此時；然長崎與中國之交通，當較早於此。如福建風的料理——南中國式的蔬菜料理，難以說是始自隱元，其必在隱元以前已經流行無疑。這種料理，禁酒用茶，所以叫做普茶，料理依年代而有變遷，所用茶點，有太平糖和梅干肉片，蒸點心爲豆沙小麥粉餛飩。其次重要的食物「羹菜」。又「羹盤」即大皿，裝黃飯，牛蒡，長薯，冰豆腐，小皿盛菜天（石花粉），葡萄果。「羹菜」盛薯菜，糖豆等。最後「蕎麥」（即麵），用做藥用的唐辛（即辣椒），菜頭，海苔，柚子陳皮及紫蘇果等，是最普遍的，現在宇治還有這種專門的菜館。

「莫荻料理爲不用肉類（？）之通俗的中國料理，叫做菓子或八仙桌。這種料理也因時代而發生大變遷，——即不免有

所日本化。在長崎本地，或在唐人或與唐人有關係的宴席，和普通日本人料理亭所辦的是不免有很大的差異的，不過後來多用中國式的和中國的材料。明和八年（爲後町天皇年號，即當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七日，鹿兒島的島津重豪公，在「唐通事」平野氏別邸受宴之時，熨斗及台點心之外，凡象牙箸，黃金匙，銀爵等均用中國式的，所以一切材料也都用中國產的了。長崎名勝圖繪中有三張極詳細的唐人宴會圖，列有得以窺知桌袱料理所用材料的品目。原文注「舶來字樣，及出產地與料理方法，由此時以知道距今百二三十年前從中國輸入的食品之種類了，下面所列，即其大概。桌袱料理的應用器物爲箸，碗，鐘，匙，小碟，各依人數排於坐位桌前。隨菜碗，小菜，餐味之多寡，有二十碗，十碗，八碗，六碗不等。而小菜有四碟六碟之別，外設蒸點心一大海碗。菜碗有豚，雞，野，牛，羊，鹿肉，鹿筋，鹿腳，鱈，煎海鼠，海粉，風干雞，燕窩，鳥類，魚，野菜之類，相和雜用；小菜爲鹽辛，鹽醃之類，及豬臘干，鹹蛋，雞肝腸等。

「長崎當劃定中國人居住之時，於延寶八年（按爲靈元天皇年號，即清聖祖康熙十九年）唐人開小島藥園，——面積凡八千七百坪，種植舶來之藥草類；至文化六年（按爲光格天皇年號，即清仁宗嘉慶十四年）遷移四川鄉，有肉桂，橄欖，以及南方珍樹，且亦可嘗其果實美味罷。試看文化十一年（嘉慶十九年）所留在園的植物名稱，一半以上均爲中國所產的草藥等類。

「中國式料理及藥用植物之傳入，非常普遍，同時所謂唐

點心，也從長崎流傳到江戶民間來。長崎古老荒木周道的幕府時代之長崎，列舉唐點心及唐人所傳點心，其名稱有：香餅，大胡麻餅，砂糖島，羅保衣，火繩餅，胡麻牛皮，玉露糕，賀儀頭，凍羊糕，雙稱，芝鹿片，太史餅，糖漿，糕干，蛋糕，唐餅，密長糕，砂仁片，蓮糖，連環糖等等，又有月餅，牛皮糖，雪片糕，香沙餅，善哉餅等等，若精確數來，恐有數倍於此，例如外郎，落雁等等。

「越後高田之名產『越雪』，本是白雪糕的模製。淺草雷門外的川口屋三官館，即學明人陳三官的製法。鶴見的米饅頭，也是從長崎傳來的。深川船橋屋的羊羹，為自中國唐三益及唐雪——砂糖物之祕傳煉法而得名，這不過僅舉一例，總之，都是從交通孔道長崎傳入的中國所產的東西。」

這樣看來，現在所謂的日本式的飲食，不知攪雜了多少的中國成分在裏面，以一般的道理推論，去日本的中國人，就等於在那裏吃自己的家鄉菜，「口腹之慾豈不很容易就得到滿足？不錯！中國的地方實在太大了，南北各省的風俗習慣雖大部分相同，而彼此互相差異的地方，也就不在少數，以飲食為例，我們知道在北方有「北平菜」「天津菜」「山東菜」「山西菜」「河南菜」等等的分別；在南方有「江浙菜」「福建菜」「湖南菜」「四川菜」「廣東菜」的分別；據說生長在江浙的人對日本菜就比其他省分的人要接近一些，周作人氏自述：「我是生長於東南水鄉的人，那裏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醃菜也是很鹹的醃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住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又說：「吾鄉窮苦，人民努力吃三頓飯，惟以醃菜臭豆腐蠅蚶當菜，故不怕鹹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麼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有

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麼，這樣一想也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干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略鹽」，「原註——略鹽豬骨菜，此言醬大頭菜也。」「牛蒡湯」與「蘆筍」，「鹽鮭」與「鰻魚」，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鹹豆鼓」，「澤庵漬」即「福建的黃土蘿蔔」，「弱弱」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Sashimi)」即「廣東的魚生」，「壽司(Sushi)」即古昔的「魚鮓」，其製法見於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筵集日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蔬魚介為主，雞豚在所不廢，惟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谷崎氏文章中很批評東京的食物，他舉出鯽魚的雀燒（小鯽魚破背裹酥，色黑，形如飛雀，故名）與鼻網（小魚晒干，實非沙丁魚也）來做代表，以為顯出虛薄，貧弱，寒乞相，毫無腴潤風盛的氣象，這是東京人的缺點，其影響於現今以東京為中心的文學美術之產生者甚大。他所說的話自然也有理，但是我覺得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這地方，換句話可以說是清淡質素，他沒有富家廚房的多油多團粉，其用鹽與清淡處與吾鄉尋常民家相近，在我個人是很以為好的。假如有請吃酒，無論魚翅燕窩以至熊掌我都會吃，正像大蔥那蒜我也會吃一樣，但沒得吃時決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餓，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點還是白登湯一類，其次是鱉（鄉俗讀若米）魚鯨湯，還有一種用擠了蝦仁的大蝦殼，碾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頭」，（老頭者，近根的硬的部分，如甘蔗老頭等。）再加干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麼的湯，這實在是寒吃相極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這寒乞即清淡質素之中，殆可勉強稱之曰俳味也。」周氏這樣把「日本菜」講得「津津有味」，大概周氏一方面固然因為他的故鄉的嗜好有些接近日本，而他的尊夫人又是位「東洋婆」，所以積幾十年的習慣

，當然成爲第二的天性了。若就一般的中國人來講，日本菜雖自有其「清淡」的妙味，但樣樣放糖，有的又過鹹過臭，或完全生食，冷食，都難以下咽，（聞西洋人旅居日本的也有此同感，）所以在東京常看見帶着厨子出洋的公子哥兒，即不算在國內最爲有錢有勢，也往往迫於不得已從吉祥寺狹窄那麼遠處的地方坐急行的高架電車到早稻田神保町一帶的中國館子去滿足「口腹之慾」，故「吃」的問題在留日的期間實在像有點非常嚴重的樣子。筆者的日本朋友有時也有這樣的話說：「歐美菜是通於鼻子去嗅，日本菜是通於眼睛去看，只有中國菜纔適於口舌。這三種菜雖然各有不同，但比較下來還是中國菜有普通的性質，日本菜固然有其不可抹殺的妙味郵惟不能餽略的人就難以入口，故非有一「國本通」的資格的人就怎麼說得天花亂墜，也難使頑石點頭。中國菜則無論日本人也吧，歐美人也吧，不管他們喜歡的程度怎麼樣，總之是能得到衆日的交贊。」筆者聽他的口氣，還不算像那些「敷衍面子」的「外交辭令」一樣。那位幽默大師林語堂氏曾說：「中國人最精於生活的藝術。……外國人常問中國人吃什麼？其實凡可吃的東西，中國人都吃。中國人所真正關心的不是宗教，不是學術，而是飲食。我們公開地承認吃是人生幾種少有的樂趣之一。我們談起吃來，毫無怕難爲情的樣子，所以我們能使烹調成爲一種國民藝術。在中國有所謂「蘇東坡肉」和「江氏豆腐」，可是在英國說什麼「華夫渥斯豬排」或「高爾斯華綏肉餅」不把人笑話死了麼？」又說：「在盛宴中，中國人是多麼的精神煥發呵！當他的肚腸填滿的時候，他多麼會喊出人生是美妙的呵！從飽滿的肚子裏洋溢着，並發射出一種精神上的快樂。中國人是靠着本能的，他的本能告訴他說，當肚子美滿的時候，一切都美滿了。所以有一位中國詩人說：「腸滿誠好事，餘皆皆奢侈。」這樣在相反

方面，就可以推想中國人若不得好好的吃一頓，精神上是多麼鬱悶呵！好在日本像東京那樣繁華的地方，中國菜與西洋菜都漸漸流行，向來以「簡單清淡」爲其特色的日本菜也時時的在改變爲「複雜多趣」，不過所謂「和製的中日菜」，多少有些日本化，我們吃了難於過癮，而出於中國庖人之手的「純粹華菜」，其代價的昂貴比中國內地要高出四五倍，即與北平上海相比較，最少也在一倍以上，窮措大到了那裏，真不免有「三月不知肉味」和「面有菜色」的感憾。筆者旅日多年，幸虧家眷同去，所以對於吃的一事並不感覺多大困難，日本吃的是米，尤其是所謂「胚芽米」，既無害脚氣病的危險，對人的身體又很能滋補，在中國真是就有錢也難得購買得到。日本使用的碗筷，和中日根本就沒有兩樣，而且還比較乾淨衛生。至於廚房的設備，大概家家都有充分的「自來水」與煤電氣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回到香港，受第三期制水的時節，纔知道以前在東京所過的日子，實在是「方便之至」。還有日本的食料也是「色色俱全」，品質尤稱佳良，惟價錢稍高，若善能利用環境，簡直沒有「獨身異域」的感覺，要怎麼樣做就怎樣做，要怎樣吃就怎樣吃。小孩子們最愛的是「炒腰花」，差不多「每飯不忘」，在日本每個只值三分錢，回到中國起碼就要一二角，所以他們現在頗有些「尊羹臠膾」的鄉愁，這種鄉愁，豈非可笑？說來說去，仍然是「錢作怪」罷了。

恭等最後勝利降臨

周文

這一篇紀實小說，是從重慶中國文藝社所出版的文藝月刊轉載而來的——編者

我在成都一年多，到了今天，不曉得咱們的，忽然得到一個結論了。這結論就是：我們這兒的人們都很有股「等」的勁兒。

這「等」的勁兒真是廣泛得很，隨便唸子地方都在露出它的頭角，幾乎成爲人們生活的法則。你不信，你試到公園裏頭的茶館，或者口子上的茶館去看看。無論哪一家茶館，——成都的茶館恐怕不止幾百家吧？——總是時時，刻刻，天天，年年，都是像攪攪在沙糖高上的蒼蠅似的，擠得滿滿地，你舉目一望，盡是黑壓壓的頭，有的慢條斯理的吃紙烟，有的咕嚕嚕的吃水烟，烟霧瀰漫在人們的頭頂上。有的紙烟水煙都不吃。單是交頭接耳擺龍門陣，從天氣擺到女人，從女人擺到鬼，無窮無盡地，有的自然不擺龍門陣，單是坐着，翹起一條腿，把脊梁靠在椅背上，張着瞇瞇的眼睛望來望去，時不時又抱起茶盤喝一口。總之，吃烟也好，不吃烟也好，擺龍門陣也好，不擺龍門陣也好，結果總是一樣，把一壺大黃水似的茶吃到雪白，雖然吃到雪白，還沒有走的意思，大概要到堂信提起掃帚來，把椅子四脚朝天的翻在桌上的時候，也就是說，掌櫃恐怕他的電點得太多了的時候，人才把椅子兩抖，身上兩拍，站起來伸一個懶腰道：「噢，又去了一天了！」這些人成天登在茶館裏頭，究竟在等些唸子？等看女人麼？或者是等女人看麼？自然這是說不一定的。如果你一定要問：

等唸子？勉強回答起來，恐怕是：等天黑，等該回去睡覺的時候，這些些都是我的擅自揣測。我想要是你一定要去拉着一個人問：「喂！你究竟在這兒等些唸子呀？」

我恐怕他是只會莫明其妙的骨碌着一雙眼睛，張開嘴巴對着你發楞的吧？真的，哪個又曉得自己在等些唸子呢？然而這似乎祇從多少年以前的祖先就一直傳下來的生活法則：從幼年等到壯年，從壯年等到老年，從老年等到死。從茶館到墳墓的路，其實是不遠的，出了城就是，但也總得等呀！有啥法子呢？自然在這等的中途，生活並不像時光的飛逝那樣順利的，所以也不免要抱怨生活，你試在茶館裏頭聽聽吧：

「唉！等那一批壞老人死了，我們這一代年青人長大起來，生活大概總會好起來了！」

或者是：「等運氣來了！……」

或者是：「等兒子長大起來了……」等等，等等。

這是一種「等」，是一種頗帶了消極的樂天主義的「等」。另一種相反的，富有積極性的「等」，則盛行於官場裏頭。所謂「忍狼等」——就是要忍耐，要狠心，要等得——久矣夫已。經成爲做官的祕訣了，你看那辦公室裏頭，每張辦公桌邊的椅子上都各坐着一股「等」的勁兒。

平常只見他把到一劃，就坐下來看報，把報一看完，就擺龍門陣攻擊哪一個同事，把龍門陣一擺完，就張開嘴巴打瞌睡。遇到公事多的時候，就鋪開紙寫下去，「等因奉此」，「

等因奉此」，「等因奉此」……等到叮嚀叮嚀，「噢！又去了一天了！」這就把帽子一抓，皮包一夾，下辦公室了。真是如一位「詩人」說的：「國家事，管他媽；且去「打打麻將」，以便等第二天的到來。你試留心看看那每個屁股上的一幅吧，不管那是面裝是長衫，是旗袍，那兒都有一塌油光光的顏色，這就是「等」的標記。他究竟在等些什麼？這就需要更深一層的觀察了，你看，無論什麼樣的橫道一來，他都非常馴順的領受，決不露出一點不好看的臉色，這樣子「上頭」就喜歡；喜歡了之後，他就像一個老獵人似的等着，用炯炯的眼光窺伺着前面，等到那東西——就是那「機會」——出現了，他就狠心的來一下，不管他是哪個，只要是擋在前面或擋在旁邊的都老老實實不客氣的一掌推過去，把他所要的位子抓將過來。這「抓將過來」，似乎就是那等的目的；然而仔細查起來，似乎又並非終極目的，等到「抓將過來」之後，不是又坐下來，照老樣子「等」下去麼？這終極目的是啥子？我想也是問不得的。因為如果一定要拉出一個來問，恐怕也只有「一對骨條的眼睛，一張張開的嘴巴莫明其妙地對着你發楞的吧？」

然而這兩種「等」，——不管是積極的也好，消極的也好——其爲「等」總是一樣的。如像一些樂天家所說的：「人生不過是那們一回事呀。以這爲基礎，它支配一切社會生活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譬如開會或宴會吧，你都非有「等」的勁兒不可。假使約定的是兩點鐘，你頂好是等到四點鐘才到。不然你去也只有坐着等別人；而等別人，也就非有那種坐茶館或坐辦公室的「勁兒」不行。至於宴會，你就更應該有那股「勁兒」了。做主人固然要耐煩的坐在家裏頭等客，而做客的，就頂好是等衆人都到齊了你才到才好。不然，人家會疑心你是餓慌了呢！而餓，就是沒

有吃飯；把吃飯做得太露骨，那就是俗不堪耐的俗人。俗的反面就是雅。一個雅人，就非有「等」的勁兒不可！即使你的肚子哇哇的叫喚，也沒有關係。你只消從這城裏頭一家名叫「忙休來」的館子，就可以看出那端倪來了。它就是適應這個環境的要求出現的，真真實實標本地表現着「等」的勁兒所到的地方。

這種「等」的勁兒，在我們這城裏頭可以說是充斥乎天地之間了。抗戰以來，有兩句人人知道的口號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出力的自然都是俗人，他們就根本沒有「等」的勁兒，或者不配有「等」的勁兒，或者不敢有「等」的勁兒，所以都一隊一隊的開上前線去了。有錢的當然都是與俗人不同的人，所以那「等」的勁兒特別令人起敬。救國公債，七七獻金，寒衣募捐……別人只是空讓一陣，或者一些男女學生們被太陽晒得紅了臉，流一陣大汗就過去了。這些事，我們的可敬的先生們並不是沒有看見。他們是在「等」。火線離得那樣遠，有嘍子等不得？他們等的事情多得很呢！

抗戰以前等國聯出來防止日本的侵略，抗戰以後又等國聯出來干涉，雖然不見等出嘍子名堂來，大家究竟是在「等」呀！也等打勝仗，果然打勝仗了，大家就高興得跳起來只等前線的健兒們把敵人趕出去，自己就又舒舒服服的過太平年。大家等着，不曉得咱們的，忽然前線又撤退了，等得真是有些焦心：「咱個哪？」這還想着。終於等出和平空氣來了，大家又高興起來，大概就要過太平年了。但是又不曉得咱們的，忽然聽見說，那些和平空氣是漢奸親日派做的；而且過去了。大家又只得另外等了，等別的國家同日本打起來就好了。上海緊張的時候，就想：「這回大概英美不得不動手了！」「噢沒有影響，這下子等得有點抱怨起來：「唉！蘇聯！你爲嘍子還不出兵？」甚至於說：「喂！我

們中國是幫你打的呀！」等等。等了一陣，沒得法，只好去翻報紙：「呵！□國的經濟困難了！」呵！台鮮兵叛變了！」呵！日兵的反戰情緒高漲了！」於是大家就等敵人自己的崩潰。然而這一類的「等」，究竟是精心的事，為咪子？一等不來，二等不來，總不免要令人皺眉頭呀！現在，二期抗戰一來，這才好，放心了，因為前線的將士確確實實很進步，抵住敵人了，而且可以漸漸打走敵人的樣子了，自然也就大概不會打到我們這兒來了，真的可以過太平年了，這兩天人們不都是忙着在街上竄來竄去的辦過年貨了麼，而且有些人已經非常安心的坐在茶館或辦公室裏頭大談其「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以後的偉大計劃了呢！

「等到勝利以後，我在北門外買的那塊地皮，一定可以漲到幾十萬，因為那時的鐵路一定修好了！」一個說。

「等到勝利以後」另一個說：「國家一定要派我們到外國去考察學術，吃黃油麵包的！」

第三個呢！

「我的希望倒不大；等到勝利以後，國家一定建設起大大的服裝工廠，我那時一定要好好換它幾套漂亮的洋服來穿咧」。

還有最後一位則嘆一口氣道：

「我倒咪子都不想啊，只想着杭菊跟龍井；杭州失陷以來，簡直貴得買不起，弄得我都好久不出咪子茶味兒了！等到勝利以後，杭菊跟龍井，海海……」

真的，應該感謝抗戰，它把人們從空虛的等待引向實際的等待，從虛無主義引向了現實主義，人們現在等的不是國家大事了麼？我想要是這些人也寫文章，「與抗戰無關」的作品，大概還是不容易寫得出來的。不過，最後勝利大戰既然就要降臨，因此有些可救的先生們，已似乎覺得不再需要甚麼救亡工作，橫直

讓大家等着就是。如果你沒有「等」的勁兒，就應該練習練習。你看那在春熙路上憤慨了一通，拿刀子割自己喉嚨的青年多麼優！死了就要看不到最後勝利。真是活該！「誰叫你沒有「等」的勁兒！哼！」現在是大家都坐着恭等最後勝利降臨了，雖然又有人說，最近恐怕有敵機要來轟炸；但是人們都相信是沒有關係的。你想嘛，從天上掉下來的當然是最後勝利，哪裏會是炸彈！（完）

編後記

本雜誌第三期付梓之時，適遇印刷所突遭意外之變，遲延多日，至本月十日方與讀者諸君見面，因此第四期雖原定十六日出版，然匆促異常，弗克如願以償，不已，祇得與第五期合刊，出而問世，尚希讀者諸君原諒！

本雜誌原有半月大事記一欄，惟查本刊所記者，與時評頗相類似故暫時刪去而代以社論，社論乃本社同人之言論，聊思藉此貢獻芻蕘之見於讀者諸君之前，如蒙不棄鄙陋，進而教之，則同人等實覺光榮之至。

本社鑒於中日問題，實有研究之必要，因此特請斯道專家，担任各種作品，以為研究中日問題之優良參考資料，今後關於該項問題，讀者諸君如有質疑困難者，可逕函本社互相討論。

本利實為孤島上之孤軍，絕不屬於任何團體及任何黨派，所有言論，均係以公正的態度，作客觀的批評，近聞國際日報有妄指本利為某派之機關雜誌，實屬信口雌黃，如同鷄鳴狗吠，此種不符事實之記載，本社同人對之唯有置諸一笑而已。



本 刊 定 價 表

▲郵票十足通用▼	十半	廿全	期
	二期	四期	數
	年	年	國
	內	內	國
	外	外	香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港
	二元四角	四元八角	澳
	一元六角	三元二角	門
	角一	角一	另
	期	期	售

廣 告 價 目 表

△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	地	底	底	封	位
	位	封	封	面	全
	全	內	內	內	頁
	半	外	外	外	頁
	頁	元	元	元	頁
四	八	一	十	八	分
之	十	百	十	十	之
一	元	元	元	元	一
頁	元	元	元	元	頁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大眾言論半月刊

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

編輯者 大眾言論社

發行者 大眾言論社

印刷者 新中國同盟會

南京圖書館藏